

中國之春

70
3月1989



楊 巍

- 大陸留學生訪台紀實
- 戈爾巴喬夫：我們犯了錯誤！

● 專題報導 ●

爲什麼他們沒有 見到—楊巍!?



湯光中



黃 漢



黃 奔

來自海南島的報告

河 殤! 海 殤?

- 南京大學民主牆的興衰
- 森林大火：誰之罪？

車少莉：我們有過什麼權利？

楊巍被釋放的當天就被公安局通知說：「一年之內不受理護照申請。」《紐約時報》八九年一月十日關於楊巍釋放的報導給出的理由是：「剝奪政治權利開始於釋放之日，……在恢復政治權利前將不允許出國。」

為了弄明白什麼是「政治權利」，我找到了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該刑法第三章第七節第五十條規定：「剝奪政治權利是剝奪下列權利：（一）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二）憲法第四十五條規定的各種權利；（三）擔任國家機關職務的權利；（四）擔任企業、事業單位和人民團體領導職務的權利。」

因為讀的是「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六年第一版的註釋本，因此我又讀到了以下註釋：「本條第二項所說的憲法是指一九七八年憲法，……具體是指公民所享有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自由的權利和通信自由的權利。」

請原諒我這篇累牘地引用所讀到的有關條文。因為我不能理解，或者是難以相信我所讀到的條文。在我看來，楊巍只是被剝奪了他從來就沒有的權利。楊巍和我以至於每一個大陸中國人都從未享有過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自由的權利。如果楊巍曾有過這些權利，那他就不會因「宣傳煽動」而坐兩年牢。而如果當局對自己訂的「法」還有一點敬意，就不會理所當然地宣稱：「在他的政治權利恢復之前，將不允許出國。」

當局當然明白，楊巍申請出國的理由不外乎是「探親」或「求學」。家庭團聚與接受教育是天賦人權，而非所謂「政治權利」。這四十年前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問世時就已確認的事實，中國自己的法律並未否認。但直到今天，大陸中國人的家庭團聚仍是當局的「恩准」而非不言而喻的權利。在國內，多少人夫妻兩地，天各一方。

而到了海外，國內的親人更成了當局要挾、威脅海外學人的「人質」。教育也是如此。當局奉引「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方針。在政治上不被信任的人沒有接受教育的權利。我的許多海外學人在出國前經歷了屈辱的「政審」，而在一九八七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後，教育部更宣稱「有資產階級自由化者不得被高校錄取」。中國人不僅從來沒有過政治權利，也未有過基本人權。

如果大家有機會，可以去翻看一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節，「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就會發現，政府許諾的權利幾乎從未給過，相反地却用各種借口侵犯公民的權利。來美的海外學人恐怕均有體會，儘管我們是中國人，可中國政府給我們的麻煩比美國政府多得多。所謂「延長護照問題」、「向美國新聞總署遞交名單問題」、「限制留學期限問題」等等均為中國政府所為。與此同時，還大言不慚地指責我們「不愛國」。到底誰在有效地毀壞我們的祖國？是我們還是政府？

政府能發展到今天的這個無法無天的地步，是由於人民爭取權利的聲音從未大到能夠使政府收斂。如果說以前我們在國內更不得不盡可能地生存下來，那麼現在，是我們爭取的時候了。以前我們沒有爭取，我們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權利。如果我們現在還不爭取，將來我們也不會有做人的權利。請大家不要沉默，用各種方式，為楊巍爭取人權，為我們自己爭取人權！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辦的第一份中國海外民運刊物

中國之春

1982年11月17日創刊

China Spring

1989年3月號70期

《2月1日出版》

P.O.Box 701400 Trainsmeadow Station
Flushing, NY 11370-9998
Tel: (718) 429-6777 (718) 507-4739

"CHINA SPRING" (ISSN 0735-8237) is published monthly for \$24 per year by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74-14 Woodside Ave., Elmhurst, NY 11373
Second-class postage paid at Flushing, New York. POSTMASTER: Send address change to China Spring, 74-14 Woodside Ave., Elmhurst, NY 11373

觀察家

3 放了楊巍，還有魏京生……

路邊

讀·作·編

6 繁體字的新功能等

楊農

專題

9 他們為什麼沒有見到楊巍

于莎

特稿

12 大陸留學生訪台記實

肖純

民主牆

16 歷史的沉思和未來的選擇
25 略論自由派知識份子
30 從革命團體到民主團體的戰略轉變
33 南京大學民主牆的興衰

楊小凱
陳力
丁楚
王傑夫

大陸沉浮

35 森林大火：誰之罪？
39 河殤兮！海殤？——海南盛衰記實
44 大陸文化圈裡的自由職業者
48 今日中國，苛捐雜稅多
49 天堂的入口——美國大使館簽證處
52 大陸街頭騙局奇觀
56 「二進宮」：收容所今非昔比

熊能
楊天樹
星星
吳甦
蔦子
石磊
孫力
(日本)



放了楊巍，還有魏京生……

路邊

楊巍一案，把中共當局放在世界輿論的火頭上整整烤了兩年。現在楊巍被放出來了，可是中共當局並沒有得到解脫，人們仍舊沒有忘記魏京生。今年，是魏京生被捕十週年紀念。中共又要被放在火上烤了。

世界上常常有這樣的事情，一個人一旦犯了第一個錯誤，就不得不接二連三地犯一系列的錯誤去彌補它，結果是一步一步地走向絕境。當年的毛澤東如此，今天的鄧小平也是如此。

毛澤東心裡無不明白，他在大躍進中辦了蠢事，可爲了他的面子，他不得不發動文化大革命，用另一個更大的錯誤去掩蓋前一個錯誤，其結果是身敗名裂。今天鄧小平亦是在步毛澤東的後塵。他下令抓魏京生鑄下大錯，而這個錯誤早已被今天的現實所證明：魏京生提出的一系列主張，如第五個現代化，政治改革，反個人崇拜，反特權腐化等，今天在中共內部早就可以公開討論，可是鄧小平仍舊不肯釋放魏京生，非但如此，還公然向世界輿論挑戰，說：「我們抓了魏京生，又怎麼樣。」他想死硬撐着，證明自己正確，可沒想到把後退的台階給拆了。今後鄧小平若是被後人數落，魏京生一案將是他的頭一個罪狀。

其實，最聰明的辦法莫過於在犯了第一個

錯誤後就立即認錯。中國人愛面子，這無可非議。尤其是領袖人物，這面子就更爲重要，因爲不但涉及到對個人的評價，而且還牽涉到統治威信。事實可能與他們擔心的恰恰相反，承認錯誤，改正錯誤，不但不會降低人的威信，反而會提高其威信。在中國歷史上，勇於承認錯誤總是被當作美德的。廉頗負荆請罪促成將相和解；曹操削髮示衆以嚴軍紀；孔明失街亭自貶三級自責以謝天下……這些故事都成了千古美談。我們亦可以設想，如果當年毛澤東向彭德懷和全國人民認了錯，也不至於落到今日的下場。如果鄧小平當年在公開審判後放了魏京生，也不致於把自己放在火上烤到今天。不過即使到了今天這一步，也並非毫無台階可下。古代的賢明不提，就眼前而論，鄧小平不妨學一下自己的留蘇老同學蔣經國先生。蔣經國生前也抓過不少黨外人士，可是他過世之前開放黨禁一舉幹得極漂亮，傾刻之間反側自消，身後獲得一致好評。反對黨領袖撫棺痛哭，不記前嫌。智者，莫過於此，中共領導人不妨三思而效。

當然，政治上的轉彎並非那麼容易，一個世界上最大的黨的領袖不可能兒戲般地總是改變立場，不過，機會還是有的。

古今中外，每當新君登基，新總統繼位之

時，總要大赦囚犯。這實在是一個明智之舉。新的統治者知道，監獄裡積壓的都是對前任的不滿，他們沒有必要去爲前任背這黑鍋，不妨順手賣個乖，趁着大吉大利之日，管他三七二十一齊放了，還能收買民心，化消極因素爲積極因素。這一手用得多了，就成爲了慣例，最後變成很多個政權解決歷史問題的正常渠道。這個渠道，中共當局也不妨用。

不過，若要等到鄧小平死後才能實行大赦，不但對魏京生等人太過殘酷，就是對鄧小平本人身後的聲譽也極其不利。世界上也有很多老的統治者在生前實行大赦的。當然，自己抓的人又由自己親手放，這個彎畢竟不是很好轉。不過辦法終究是有的，轉機可以選在大喜的吉慶日。這一手，別人也用得很多了，也自然成爲慣例。隨慣例而行，不也可以掩蓋改正錯誤的尷尬嗎？這樣看來，鄧小平生前完全有機會挽回其犯的錯誤。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四十週年大慶，我們呼籲中共能趁此機會大赦包括魏京生在內的所有政治犯。這是鄧小平生前最後一個機會了。

過了這個村，可就沒這個店了。

編輯手記

民主牆陷落了，它永遠活在人們的心中。為了紀念民主牆誕生十週年，本刊特推出「民主牆」專欄，為持不同政見的凡人論政提供一個陣地。在本期民主牆專欄，楊小凱「歷史的沉思和未來的選擇」一文對中國政治的演化過程進行了精闢的分析，其獨到之處，會令人拍案叫絕。同時，丁楚在他的「戰略轉變」一文中對當代民主運動的策略問題提出了他的看法，值得民運人士參考。

這期與「民主牆」專欄同時推出的是「大陸沉浮」專欄。在這個專欄中，我們刊登了一批反映大陸社會問題的寫實報告。從不同層次、不同角度，為人們勾劃出一幅逼真的大陸現狀的畫面。其中有大興安嶺森林大火一案審判現場的報導；有海南島人才大潮派落的忠實記錄；有美國大（領事）使館簽證處的寫實，有北京市收容所的今昔對比……

楊巍出獄了。可是前去監獄門口迎接楊巍的民聯三位成員被中共驅逐出境了。為什麼他們沒有見到楊巍？最近新聞界的報導縱說紛云，而後來各種版本的故事撲朔迷離。本刊這次刊登的是到目前為止最詳盡的報導，其中每一個細節都沒有忽略，讀者可以根據事實看清中共的手法，並作出自己的判斷。同時，我們還刊登了胡平和車少莉的說明，以便大家更進一步瞭解事實真相。

五位大陸留學生訪台所颺起的旋風已漸平息。那麼他們在台灣進行了哪些活動呢？本刊給予追蹤報導，讓讀者有個全面的瞭解。

最後祝讀者們春節愉快！

思想論壇

59 新三民主義：一個歷史的彌天大謊
62 沒有流動就沒有現代化
63 不必要設政治局，權力鬭爭妨礙改革
——訪嚴家其

楊農
柳新
譯自「讀賣新聞」

爭鳴園地

64 該怪中國的知識份子——兼與胡平、丁楚商榷
65 聽聽洋先生的話

辛立林
錢達

國內參考

71 趙紫陽為方勵之出國承擔責任
72 王震為鄧樸方撐腰打氣

黎音

海峽兩岸

66 台灣問題之我見
68 為胡秋原中國之行說幾句話

高標
楊雲

譯文專欄

73 戈爾巴喬夫：我們犯了錯誤，受到懲罰
77 改革在重寫匈牙利歷史
80 早安，古巴

廖天祺譯
朱焱譯
錢輝怡譯

短評

55 廖主任：說話算數嗎？
31 歷史將會為勇敢的人作證
32 竊書之辯
81 李鵬訪澳觸暗礁

鄭源
蔡茅
佟雪
芸芸

文藝園地

38 沒有人經過這裡 毛毛，幫我畫一張像
58 孤獨

張真
白島
朱凌波

封二
封三

■ 車少莉：我們有過什麼權利？
■ 關於D W & C事務所廣告的聲明



讀者·作者·編者

繁體字的新功能

楊農

自倉頡造字以降，中國文字歷經幾千年的演化，在功能上不僅文以載道，傳之久遠，更且維繫中國境內不同種族的凝聚。自中共建政後推行文字現代化，除以自然演變的傳統簡體字外，並大量製造人為的簡體字，以取代繁體字。因為繁體字令人想了煩，看了煩，寫了煩。最近，筆者聽到一位台灣學生談到繁體字的新功能。

這位台灣學生認識一位大陸公費學生。後者欲把愛人申請來美陪讀，辛苦良久，單位仍不放入。這位大陸學生思妻心切，膽從心生，謀自腦出：偽裝他愛人有位阿姨在美國，是隨國民黨到台灣後移民來美，現在這位阿姨和姨丈經過千山萬水終於和故鄉親人聯繫上，並願把親人的女兒申請自費留美，一切經費由阿姨和姨丈負擔。因此，這位大陸學生開始偽造財力證明和各種書信。由於姨丈未學過人造簡體字，必需使用繁體字以免被識破。這位台灣學生就成爲這位假冒的姨丈，以台灣的繁體字寫了措辭中肯的信給大陸的單位，希望單位成全好事，爲國造就人材。他們就這樣那樣，如此這般，經過一番努力，終於把這位大陸學生的愛人搞出來，樂歪了。

據這位台灣學生說，有些繁體字寫起來確實煩，但助人爲快樂之本，他樂意寫。想不到中文演化到二十世紀的末葉，竟然產生幾千年來未曾有過的特異功能，聞者無不嘖嘖稱奇。

納悶之餘

于是味

最近從「人民日報」、「中國建設」上看到幾篇怪調文章，突然提起我國百年來的開放政策：清代某年留日學生萬餘，至今仍是最高紀錄；後來去歐美的，不少成爲新中國大人物和延安時期留蘇、文革中去越南、阿爾巴尼亞和非洲……。也許，青島啤酒廠等祖輩「外資企業」也是成果。從來沒有關門的。

這莫非是「理論」界準備重溫傳統課題，即要提醒國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的真理，閉不開放是次要的。

由此讓人聯想到慈禧「珍寶館」中引進的國外洋玩意和毛先生率先享受的空調舞廳。從某種意義上說，開門不等於開放，開門後引進什麼才真正重要。閉關自守的要害是：不吸收外部的先進思想、民主制度、科教管理體制，一切以維護只適應低級生產力水平的舊統治爲前提。「首先我要掌權，然後才讓百姓過日子。」李鴻章當年洋務中一再強調的「大清體統不可變」，以推翻明王朝的「優越性」來永遠反復地證明「老佛爺」爲中華利益的根本代表，即是現成的樣板。

國內正泛濫的貪污、黃毒等，在西方都少見！這是因爲我們仍停留在物質引進的低級水平上，在文化道德、法律水平上還沒有配套。所謂「官倒」、「軍倒」，說穿了，不就是制

「法」（政策）、執「法」者愚弄百姓造成的嗎？如果有法，不是什麼王子犯法要定罪，而且是「皇帝」違法也要殺，再看有幾個敢試的？把愚昧型犯罪說成是國外影響，要回過頭去講傳統政治思想，實在是找錯了原因。

一個建議

（紐約）劉前進

胡平先生：

我是中國大陸來美進修的訪問學者。出於對祖國大陸民主運動前途的關切，我對你個人及中國民聯的活動及處境十分關心。我認爲，若干年以來你的政治主張能在國內外獲得廣大知識界及一切有識之士的尊重，主要基於如下兩點：（一）始終站在理性的立場，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式不懈地宣傳民主思想，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二）一直爲之奮鬥的目標恰恰就是共產黨在黨章和憲法中從來就許諾要「給予」的言論、出版自由。正是這種坦蕩的作風使反對者常常痛心疾首、黔驢技窮，即使他們能以某種藉口吊銷你的護照，其結果也只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暴露了他們「輸不起」，不講理的眞面目。

如果我對你的上述評價基本正確的話，我建議你和你所領導的中國民聯能正式向中共及輿論界重申你們的政治主張，並聲明：一旦中國共產黨在將來某個時候願意真正實施政治民主，真正「准許」群眾有言論、出版等自由，你們將樂於返回祖國投身中國的振興大業。我認爲，這種聲明將會在歷史上留下一個碑記，它將有助於證明誰是民主政治的眞正擁護者，有助於最大限度地團結群眾。這在「五四運動」七十週年即將來臨的時刻更具有現實的意義。

遲來是好意

周韜

讀了「中國之春」總第六十八期遲來的第二封公開發信以及丁楚和他(她)的對話後，不僅感到他(她)是一位講道理的人，而且他(她)對於「中國之春」以及中國人民要求民主與自由的主張充滿了善意與同情。但我以為對民主自由的呼籲是必要的，關於一些基本概念也需「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才能讓新的讀者們入門。譬如國內最暢銷的「無綫電」雜誌中初學者園地一欄常談一些相同的問題。

「中春」的文章以其高度理念為特徵當然應該肯定，但在純理論之餘，讀上一兩篇高質量的文學佳作更使人賞心悅目。譬如像「河殤」這樣在文學、政治方面有雙重價值的作品就是一例。再如有些寓意深刻的魯迅雜文，具有現實意義的劉賓雁報告文學之類，不但無礙於宣傳民主自由理念，而且也能進一步勾引起遠離故土的讀者們對祖國的深沉情感。這類作品雖然是「舊」的，可在異國他鄉，却是稀有的珍品呢！

黑雲壓城城欲毀

汪盛霖

看到「世界日報」上登出「中共」查封中國民聯重慶支部、逮捕其負責人一則消息，非常氣憤！中共如此粗暴地對待一個民主團體，這說明他們專制的本性充分暴露出來了。他們的政權已快到螻蟻之窩，一點即破的地步。自從所謂中共的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的民運如雨後春筍，一浪高過一浪。從最開初的民

主牆，學生爭民主遊行，為民叫冤的報告文學，多黨制觀點的提出，自由選舉國家領袖……這些挖到了中共體制的病根，說得他們膽顫心驚，他們便拿出「無產階級專政」的王牌對所有民運人士加以嚴厲的制裁和迫害。逮捕、判刑，但這嚇不倒民主人士，反而更加激起大陸百姓的同情和支持，中國大陸百姓再也不是任人擺佈的順民了。他們要起來爭取做人的權利了。

執法者無法無天

林葱

前兩天收到一封國內來信，是我的一位中學同學寫的，他現在剛調到某公安局門工作。信中除了談到國內物價飛漲的情況外，還對他的新工作作了一番描述，字裡行間無不流露出得意之情。他舉了幾個例子來說明現在的公安幹部是如何有權有勢。看完信後，我心裡好一會不能平靜。

一例是在所謂「反精神污染」運動中，公安局沒收了大量色情錄像帶，這些錄像帶被封存在公安局裡，在公安局內部傳看和轉錄，並且公安局長也帶頭看。

另一例是公安幹部都配有槍枝，可以隨意掏槍嚇唬老百姓。有一次我同學家裡大請客，對門鄰居把門開個縫朝外看，他就掏出槍，對着鄰居說：「你再看看，我就開槍打死你。」嚇得那鄰居連忙把頭縮了回去。

再一例是我這位同學有個好朋友姓郭，是個體戶。郭某有天向我這位同學抱怨，說另一個體戶張某總是搶他的生意。我這位同學說：「這還不簡單，我幫你整整他。」第二天就與

另外兩個警察去張某家，對張說有人告他不法行為，將張逮捕拘留。關了兩個星期，打了幾次，然後說因證據不足，釋放回家。

「人民日報」經常談要健全法制。執法者首先無法無天，中國真正有法律的那一天看來還遙遙無期，真令人失望。

加大柏克萊「聯誼會」今昔華興

加大柏克萊是有較多大陸留學生、訪問學生的學校，讀一讀該校「聯誼會」八八年九月寄給每位中國大陸柏克萊留學生、訪問學者的一封信，是很有意義的。這裡摘錄的，是該信的開頭：

「親愛的同學、學者：

您好！新學期開始，也是「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簡稱「聯誼會」）委員每年一度的選舉之際。我們曾在八月初將「推舉候選人的通知」及初步的選舉辦法發給每一位同學，希望在九月五日以前將候選人名單報到聯誼會委員處。目前已是九月中、下旬，尚未推舉出願意競選聯誼會主席的候選人。因此，聯誼會面臨着解散的危險。……」

和其它聯誼會一樣，柏克萊聯誼會是當初在中國使、領館一手推動下，成立起來的組織。平心而論，也為留學生、學者做了一些事情。在八八年春季的留學生簽名運動（反對中國政府停止延長學生護照的條例）中，柏克萊聯誼會做了不少工作，現在却一度面臨「解散的危險」。原因何在，明眼人還不清楚嗎？

全世界民主派聯合起來！

——歡呼中國民聯與波蘭團結 工會的合作

(美國) 春雷

波蘭團結工會駐英國聯絡站寫信給中國民聯，希望相互合作與支持，中國民聯主席胡平復信波蘭團結工會，確定了雙方的合作關係，這一件事值得社會主義國家的被統治的勞動者歡欣鼓舞。

這是一件重大的歷史事件。這說明社會主義國家的勞動者在反對各自國家的專制統治的鬥爭中，開始了歐洲與亞洲的聯合與團結。大約一百五十年前，馬克思在分析批判十九世紀上半葉剛從封建專制社會脫胎過來的初級階段的資本主義社會，提出了共產主義的理論。歷史的發展令人可喜又可悲。被馬克思批判的那些資本主義社會，由於其自身獲得的民主制度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使得馬克思預言的列寧擴大的社會危機在這些資本主義國家沒有發生，恰恰這些國家的人民享有的民主、自由與富裕形成了地球上最發達的區域，而那些以馬克思共產主義理論為指南的國家，例如俄國、波蘭與中國等等，人民被不同程度地剝奪了民主、自由，陷於貧困之中。這正是馬克思播下了龍種，人民收穫的却是跳蚤。

想要超越歷史發展的思想與理論必然會受到歷史的懲罰。當一種思想與理論被宣佈為絕對正確千年正確萬年正確時，這種思想與理論就變成了謬論。當馬克思在英國寫資本論時，俄國還處在封建農奴制中，而中國是一塊大清皇帝專制的黃土地，小民還穿着長袍馬褂拖着辮子在向大清皇帝三跪九叩高喊我皇萬歲萬歲

萬萬歲。俄國人、波蘭人等東歐人民手捧共產主義的著作沒有進入天堂，而中國呢，人民被告知只能對毛澤東與共產黨唱頌歌喊萬歲，連言論自由也被剝奪殆盡。從東歐到亞洲的一大片土地，新的封建專制制度恰恰是用共產主義的理論按照各國的不同實際情況巧妙地復關的。

專制制度的同義語就是人民的反抗。一九五〇年的匈牙利人民起義，一九六八年的捷克布拉格之春，爾後的波蘭團結工會與中國的「四·五」運動、北京之春運動、中國民聯均是人民反抗新的專制制度（社會封建專制制度）的表現。東歐的人民由於地理環境的條件，他們早有自發的相互支援與合作。現在波蘭團結工會向中國民聯伸出了友誼之手，而中國民聯向波蘭團結工會也伸出了友誼之手，是否意味這些國家的人民在反抗各自國家的專制制度中出現了新的曙光：全世界民主派聯合起來！世人拭目以待。

作者來信

尊敬的編輯先生：

適閱貴刊第六十九期（八九年二月）刊出的拙作「駁悲觀論」一文，極為吃驚，短短數頁文章，其中錯漏誤植之處竟有十幾處之多，有的錯別字，只要排校時稍為留意就不至謬誤至此，特別不可思議的是拙文結尾一頁中整段文字錯位亂排的居然有五處，這種天書是任何讀者都無法看懂的。如果貴刊不作更正，讀者一定會把作者看作一個語無倫次，思維混亂的怪物。

我希望貴刊能出於尊重作者的立場，予以

訂正和補救。

順頌

撰安

倪育賢

一九八九年元月廿六日

編者說明

中國之春六十九期所刊倪育賢先生「駁悲觀論」一文有嚴重排版錯誤。從第四十九頁末尾到五十頁共有段落錯位五處。在此，我們特向倪先生鄭重道歉，並刊登他的來信。

編者

中國民聯總部人事變動

張俠辭去常委職務，已提名委員丁楚追補，獲准通過。王炳章被罷免常委及委員職務，已提名委員車少莉追補常委一職。

五十步笑百步

鄧小平支持南非人權運動！

主筆 倪育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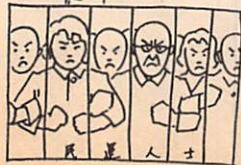


圖 順頌

爲什麼他們 沒有見到楊巍

于莎



迎接楊巍計劃

一月九日上午八時，爲民聯作出重大犧牲的楊巍，在被中共監禁兩年之後即將被釋放。民聯總部決定派人前往監獄門口迎接。

這個計劃由胡平、王炳章、丁楚三個策劃，最後每個細節都由胡平和王炳章確定的。大家一致認爲迎接楊巍的民聯成員應公開進入大陸，這將爲民聯合法進入大陸活動邁出第一步。

民聯成員紛紛報名回大陸見楊巍。總部選擇了湯光中，他既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的大陸留學生，同時又有一個台灣籍的太太，前一個身份可以鼓舞其他大陸留學生回國的勇氣，後一個條件又可以保證他的安全。爲了進一步保證湯光中的安全，總部又選擇了持加拿大護照的黃漢和持美國護照的黃奔一同前往，萬一湯出事，兩黃可以爲人證，並可回來報信。臨行前，湯光中打電話給中國駐美大使館通知此行，並自報了民聯成員身份。對方回答：「只要不搞宣傳、組織活動，中國民聯成員回國不成問題。」

上海之行

一月三日，湯光中和黃漢先坐日航班機抵達上海虹橋機場。

一下飛機，一切都還很平靜。不過這只是表面上而已，中共對於民聯成員還不致於放心到放任不理的地步。「關照」，總是少不了的。在湯、黃兩人即將離開機場時，有個人很

奇怪地用一張小紙片錄下了他們的名字和班機號。一個胖乎乎的青年緊緊盯梢在他們身旁，另一個着風衣的男子則在稍遠處跟着，一直「護送」他們乘上一輛出租汽車。

如果說「機場歡迎」這一幕有點草木皆兵的話，那麼金沙江大酒店服務台前的一幕，就有點過於誇張了。

當湯、黃二人拿出旅館預定單時，服務員竟說沒有接到任何預定的通知。正在他們愕然之際，一位自稱是經理的人滿臉陪笑地說了話：「你們是香港××先生介紹過來的吧？這事我知道。」說着，還上前握手表示歡迎。然而，這位經理所稱的香港××先生，他們從來未聽說過，而由美國旅行社代定的旅館房間，也不會是某個香港個人僅同一位經理打個招呼。

一月四日，兩個人來到楊巍父母家。家裡沒人，一位鄰居告訴他們楊巍母親外出，楊巍的父親正病重住院。於是，他們直奔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住院部。在那裡，他們見到了楊巍的父親楊爵先生。楊老先生見到他們很高興，告訴他們一些最近上海社會見聞以及楊巍在獄中的情況。他說：「楊巍在獄中很自在，獄中的人對他很尊重。」

第二天，他們又去看望楊巍的母親。顯然，她已接到楊父的通知了，一直等在家裡。一見面就擔心地說：「怎麼現在才來，我一直擔心你們會出事。」她看樣子很緊張，不知公安局是否給她施加了壓力。當湯、黃兩人告訴他們此行的目的是爲了迎接楊巍時，楊母顯出很擔心的神情，希望他們不要節外生枝，最好「沉默而來，沉默而去」。湯、黃兩人交給楊母王炳章轉交的一些材料，其中包括外電對楊巍事件的報導和「中國之春」登載的有關營救

楊巍的活動報導。他們還轉交了車少莉和王炳章托轉給楊巍的信和胡平的賀年卡，但楊母認為他們最好直接交給楊巍。

爲了消除楊母的擔心，湯黃提議是否在採取迎接楊巍行動之前徵求楊巍的律師李國基的意見。楊母表示贊同並立即打電話聯繫。於是，他們在離開楊家之後，驅車前往拜訪李國基。

李國基律師在和平飯店開設了他個人的律師事務所。自承辦楊巍案之後，李律師名蜚海外，生意興隆。很多涉外案件的當事人慕名而來，他的事務所天天門庭若市，每年收入達幾十萬元。

李律師見到湯光中和黃漢時，爽朗地大笑，幽默地說：「啊，反動組織的人嗎？」談到楊巍時，李律師認爲他會被準時釋放的，去監獄門口迎接他完全沒有問題。最後他長嘆一聲：「楊巍還很年輕，他是個學者，幹嘛要搞政治呢？政治是好玩的嗎？」

誰也不清楚李律師心裡是怎麼想的，是責怪？是惋惜？是同情？只有在專制制度下，才會聽到對搞政治有如此感嘆。但不管怎麼樣，楊巍事件的風波在中國並沒平息。不久前李國基律師到一所大學講演，還有人向他提有關楊巍案的問題。

李國基律師在談話中提到：「我們黨現在對反動組織裡的人還是區別對待的，王炳章也可以來考察嘛！」這不知是他個人的意見，還是中共當局通過他口頭傳達的信息。李國基律師是共產黨員。

李還希望有機會去台灣看看，湯光中趁機說：「你們希望台灣對共產黨開放，那共產黨也應該對我們民聯開放才對呀！」

當晚，當湯、黃二人回到旅館時，接到了

日本東京新聞社駐上海代表的電話，要求約見。原來，民聯總部王炳章、丁楚已在當地時間四日下午分別通知了美聯社、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和日本通訊社的有關記者有關民聯成員赴滬迎接楊巍的消息。日本記者反應迅速，捷足先登。

湯、黃二人與記者共進晚餐。談話間兩人重申了他們此行的目的。同時還談到了一些改善上海市政建設的設想和在大陸組建反對黨的願望。

該看的人都看了，回美簽證也辦好了。該輕鬆一下了。可是湯光中心裡總不能平靜，他看着上海被共產黨治理得這付亂糟糟的樣子心裡難受，他想到市政府去提點治理上海的建議。他給胡平通了電話，談了他對上海市政建設的一些想法，並提出想見一下王若望。胡平怕節外生枝，建議他們去逛逛街，到旅遊點玩一下。

六日，是他們此行最輕鬆的一天，他們去了城隍廟和豫園，參觀了上海市容。到此爲止，一切都還平靜。儘管他們無論上哪都有一「尾巴」盯着，可是中共官方還沒有任何正式的表示。

與此同時，另一位民聯成員黃奔經香港到達上海，臨行前王炳章也托他帶了一些涉及楊巍的「中國之春」雜誌。黃奔開始有點擔心。可是這個豁達的漢子又怕被人耻笑爲「膽小」，於是硬着頭皮帶着雜誌闖關進來了。事實證明他的擔心是多餘的，海關人員連他的包都沒有開就放行了。

黃奔的心放下來了，他打電話和湯、黃兩人取得聯繫，報了平安。一切看來都出奇地順利，黃奔心裡嘀咕：難道共產黨對民聯的防範真地放鬆了嗎？

拘留提審？

也許，人們都過於樂觀地估計了共產黨的善意和氣量了。一切緊張的幕後活動也許永遠也不得人知，可是後來發生的事證明，「放鬆」只是表面的，實際上是內緊外鬆。

七日，是整個事件的轉折點。下午三點，正當湯、黃二人在自己的房間裡商議明天去蘇州遊覽時，有人敲門。

「誰啊？」

「消防隊的，有火災。」

火災？旅館內外似乎很平靜，哪來的火災？湯、黃二人心中早有準備，答曰：「請等一下。」

「消防隊」在外面等了五分鐘，如果是火災，恐怕地板都燒穿了。不過他們終於等不及了，也許怕裡邊的人銷毀證據吧，於是強行打開門闖進來了。因此，湯光中一直堅持說，中共公安人員是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非法闖入私人住地的。」

在闖入的七八個人中，只有兩個人穿着警察制服，其中一個女警察對他們說：「誰是湯光中？」

「我是。」

於是錄影機對准了湯光中，近距，遠距，側面。接着那位女警察向湯光中宣佈了上海市公安局的決定，出示了「拘留提證」，要湯光中和黃漢在上面簽字。

湯立即要求對方出示身份證，可是那位女警察拒絕了，並且蠻橫地說：「你再不簽字，我們將使用強制手段。」

湯光中再次聲明，如果對方不出示證件，他就沒有理由承認他們有執行公務的權利。最後女警察讓步了，示意身後兩位便衣人員出示了公安局工作證。

湯光中拿起「拘提證」，發現上面稱自己是被告，於是問：「誰是原告？」

對方答非所問：「公安局是法人代表！」於是湯光中在「拘提證」上寫下了：「我因未被告知誰是原告，拒絕簽字。後被告知上海市公安局為法人代表，故同意簽字。」

簽完字，女警察又亮出搜查證。湯、黃二人隨身所帶的所有行李，以致身上都被搜查遍了。最後強行扣留了湯光中和黃漢的兩個私人筆記本、三張賀年卡、三卷膠卷以及一些私人信件。後來湯光中在記者招待會上再抗議，中共無理搜查和扣壓他的「私人財產」。

黃漢在搜查完畢前就被帶走了，經過大約兩個小時談話，第二天被送上飛機，驅逐出境。與此同時，黃奔在另一個旅館也遭到同樣的待遇，經過兩小時談話，即送往香港。兩黃分別是加拿大和美國公民，中共不想濕手沾面，免得羊肉沒償着，反惹一手騷。

而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的大陸留學生湯光中則頗受當局重視。從一月七日下午六點被押送至市公安局後，直到夜裡十二點才結束訊問。第二天也被送往前去東京的班機，逐出國境。據公安局的人說，湯光中儘管進行違法活動，但考慮到他要在十三日前回校參加論文答辯，故「寬大處理」。

在公安局

訊問被安排在一間大客廳裡，事前還招待了一頓豐富的晚餐，兩菜一湯，還有上海人最喜歡吃的炒鱸絲。

湯光中發現，審訊員最感興趣的是民聯總部內部的情况。對此湯光中自稱遠離總部，瞭解不多。最後審訊員也失去了對他的興趣，也

許這正是他被這麼快釋放的重要原因。對於這次迎楊巍的活動，湯光中並不想隱瞞什麼，包括胡平在編輯部給他開支票買機票的細節也供認不諱，他認為這次行動完全是合法的、光明正大的。

最使湯光中感到氣憤的是中共採用卑劣的手法來偽照證據。將「龍、虎、豹」三個化名強加於他們三個。事實是，龍、虎、豹三個化名是王炳章和湯光中商議行動計劃時隨手寫在一張保險單背後的，這張紙僅僅是個草擬計劃的草稿，沒有任何意義。而事實上，這三個化名也並沒有被採納，三個人在上海的所有活動、電話全部使用真名。可是這張廢紙被湯光中不慎帶入大陸，現在竟成爲中共用來定罪證據。中共還利用這一點在報紙上大作文章，以貶低民聯形象，可見其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霸道作風。

一位自稱是專門對付中國民聯的李姓審訊員講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你們這次來，只是時機沒有選對，我們現在還得把你們當作反動組織的成員來處理。」時機不對？那麼什麼時機才對呢？難道中共什麼時候也會不再把中國民聯當作反動組織嗎？湯光中心裡產生了疑問，他此行正是爲了試探這種可能性的。現在碰了釘子。

無獨有偶，黃漢受審的時候也聽到了同樣的話。這是公安人員無意的共識，還是暗示着什麼意圖？

李主審員自稱他對民聯內部的瞭解要遠遠超過湯光中，難怪在瞭解了他們三人此行的細節後，他就對湯光中失去了興趣。於是談話轉向了美國的生活狀況，湯光中介紹了大西洋賭城奉送賭本的生意經時，引起了在座所有審訊員的興趣。

遞解出境

第二天下午一時，湯光中被強解出境。他質問公安人員驅逐他的理由何在，對方拿出了「一九八七年底上海市公安局對記者談話，其中宣佈中國民聯是反動組織，中國之春是反動刊物。這就是證據？難道一個國家機關的新聞發言人也能代表國家法律？」

一月九日上午八時，楊巍的母親被通知楊巍將被推遲出獄。與此同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送了驅逐湯光中、黃漢、黃奔的消息，理由是他們代表反動組織進行了非法活動。而所有的非法活動的證據僅僅是黃奔所攜帶的「中國之春」雜誌和湯、黃轉交的有關楊巍報導的材料，以及湯光中攜帶的一封信。在這封信中，王炳章對湯光中敢於「踏上與赤龍搏鬥的征途」的大無畏精神表示敬意。黃漢在舊金山機場與湯光中會合後，將信交給湯。湯出於對王炳章的敬意，沒捨得將信銷毀，以便留作歷史文物。誰知這封純粹是私人的信件，竟被中共當作非法活動的證據。湯光中在記者招待會上憤怒質問：「扣壓私人信件等於侵犯隱私和個人財產，是誰違法？」

在湯光中即將被押解出境時，大群外國記者聚集在提籃橋監獄門口準備迎接楊巍。可是他們失望了。楊巍被推遲了兩個小時釋放，待記者散去後，公安局用專車將他直接送回家去。顯然，中共耍了個花招，推遲出獄僅僅是爲了閃過記者。

中國民聯的三個成員沒能見到楊巍，所有的記者都沒能見到楊巍。釋放一個普通學生還要鬼鬼祟祟，請問，是誰違法？

大陸留學生訪台紀實

肖純

首批應邀訪問台灣的五位大陸留學生——吳牟人、徐邦泰、錢穎一、徐成綱、裴敏欣——於十二月二十日中午抵達中正機場，這是台海兩岸交流過程中，民間往來的重要起點，富有深遠的政治意義，也可以給予相當的期待。

五位大陸留學生赴台的(一)天——即十二月十九日——中共駐東京大使館參贊黃辛和二等秘書馬佔印對他們表示，他們認為大陸留學生訪台是一件好事，並對稍早時，中共駐華盛頓大使館發表的聲明作了解釋和更正，該聲明曾宣稱首批大陸留學生訪台的主辦單位包括了三民主義大同盟，而訪台留學生都曾被要求作了書面性的政治交待。對於這一不實的指責，當然引起了訪台留學生的不快。

首批大陸留學生的訪台，給台灣社會帶來了無比的興奮和激盪，「中國時報」在十二月二十日的「社論」中說：「兩岸的分隔是歷史的悲劇。就老一代而言，無論省籍，不分彼此，對於過去兩岸的骨肉分隔、思鄉情苦，莫不感到極深的悲哀，自大陸開放探親以後……紛紛趕赴大陸，一解相思之情，一敘分離之苦，一償返鄉之願。這是兩岸老一代的情感，濃得化不開，烈得解不了。然而，就兩岸新一代而

言，由於在幾乎是完全隔絕的環境中成長，彼此間多了一份陌生之感，少了一份相思之情，加以兩岸政、經、社會體制不同，新一代對政治的認知，對社會的體驗，對經濟的觀察，也都有所不同。是以今天大陸新一代的留學生打前鋒，首先來台訪問參觀，從兩岸新一代交流觀點來看，其意義格外重大。」

台灣人民有着火一樣的热情

台灣——對這五位大陸留學生來說——是一片屬於自己「家裡的但又是那麼神秘和陌生的土地，在這塊陌生的土地上，他們所能看到和感受到的的是什麼呢？

在東京候機的時候，他們的心情就很激動，絕不放過機場裏任何一塊寫着「HOTEL PEI」(往台北)的告示牌，還拚命地照相，把「台北」兩個字與他們一起攝入。

當記者問他們：馬上就要到台灣了，你們可不可以用最簡單的言詞來形容你們想像中的台灣？他們沉思了一陣子，說出了一些含含糊糊的話來：「交通亂」、「摩托車多」、「

很有人情味」、「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的過渡」……

現在飛機終於在台灣的中正機場降落了，他們踏出機門的第一步，就面對着許許多多的閃個不停的鎂光燈，面對着台灣記者的熱情的包圍，他們以興奮的口吻描述了來台灣的第一個感覺：「很感動，但有點吃不消！」

當天，他們驅車抵達台北，繁華喧鬧的城市，留給了他們深刻的印象，請聽他們的談話：

錢穎一：台北很進步，霓虹燈很多，過去聽說摩托車很多，今天看果然名不虛傳。

裴敏欣：台北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城市，既有現代化的建築，也有中國的風味。

許成綱：感覺是一家人。「這才是中國！」

當晚，主辦單位——團結自強協會設晚宴招待他們，該會理事長陳寶川、紅十字會會長徐亨、中國人權協會理事長杭立武、台北市議員郁慕明等人作陪，氣氛十分融洽，賓主盡歡。飯後，五位大陸留學生前往某處量身，各訂製西裝一套，這五套西服是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女士所贈送，使他們更加感受到了台灣同胞的溫暖。

與此同時，台灣政府行政院院長俞國華也表示，他希望五位大陸留學生在訪台期間，能實際、客觀、自由在地到處觀察，比較台灣與大陸四十年來在不同的制度下，民衆的生活方式及各項建設的異同，俞國華認為，由他們自己觀察、判斷，得到的印象，要比政府機關告訴他們的方式好。

自二十一日起，五位留學生就開始了他們緊張的參觀，訪問和實地考察的活動。他們首先參觀了台大、政大等大專院校，



台灣報紙這樣描述了參觀的盛況：「五名大陸留學生乘坐的專車一到台大行政大樓，負責接待工作的台大研究生協會立即依計劃，『兩個幹部護一人』，與大群攝影機和記者展開了『保衛戰』。專車抵達學生生活動中心後，整棟二層樓擠滿要看『大陸人』的台大學生。」

二十三日，他們訪問了秀朗國小，受到了小學生的熱烈歡迎，當天的新聞有這樣一則活潑清新的報導：「……參觀教室時，裴敏欣一時興起，上台做了五分鐘的『代課老師』，教導學生簡體字與繁體字的差別，小朋友興趣盎然。」「錢穎一在課堂上也問小朋友：『一匹馬掉到十一尺的坑裡，牠每次可跳高二尺，幾次可跳出坑外？』小朋友齊聲答道：『永遠也跳不出來！』在場人士大笑，徐邦泰也豎起大拇指指說：台灣的小學生不是蓋的！」

另外一則新聞則更加有趣，十二月二十五日，五位留學生前往清大參觀。「他們來到台灣大學女生宿舍門前，不明白為何要掛『男賓止步』的牌子？錢穎一不解地說：『大陸是不掛男賓止步的』，而且男生還可隨時光臨，並未『設防』。在好奇心的趨使下，他要求參觀女生宿舍這一非預定行程，雖然一度令行程安排單位感到為難，但因他實在很想看看，終獲如願。當然，沒有事先通報，在交誼廳看電視的女生，見五個大男生，還有六十名記者直闖，此驚不小，慌忙驚怯問道：『你們是誰？』問明來意，女生們熱情自然流露，一聲聲『學長好』洋溢交誼廳，歡迎不速之客。輕扣門扉後，他們還欣賞了『閨房』，對宿舍中的繽紛多彩的晾衣場，分外感興趣，並掏出像機留影。」

像這樣的台灣人民對「大陸人」表現出的熱情洋溢的感情的場面，在他們十天的訪問日

程中，隨處可見。

徐邦泰在接受記者的採訪中說：「今天晚上我抽空第一次逛夜市，真正體會到了台灣民衆對我們的友好，這與台灣同胞到大陸受到優待的官方規定的情形不一樣。例如今天臨時逛夜市，我買了幾樣東西，商家不僅有的自動打折，有的還表示要免費贈送，他們的一片真情，我實在很感動。」「民衆的熱情太珍貴了！」

在台灣，民主正茁壯成長

還在美國留學期間，五位大陸留學生就聽到了台灣自「解禁」以後逐步進入民主化過程的消息，台灣是怎樣實行民主的？它能否達到目標？遇到了怎樣的困難和阻力？會給大陸社會的前進帶來什麼樣的借鑒，都是這些大陸留學生急於想看到和了解到的。

吳牟人說：「我們五人各為獨立的知識份子，以個人的身份到台灣訪問，我們深切盼望能看到真正的台灣，說出我們出自良知真正想說的話。」

按照這個目的，他們參觀和訪問了大專院校、研究所、農村、工廠、博物館、新聞學術機構，以至立法院，並和立法院高層人士以及民進黨人士都有所接觸。這次訪問雖說是時間短促，但可以說工、農、商、學、政，幾乎無所不包。

由於這五位留學生接觸到的最多的是台灣的記者群，所以他們對台灣的「新聞自由」有最深刻的感受。徐邦泰說：台灣的新聞界非常有活力，這就是有新聞自由社會的現象。」他還說：「台灣的記者真厲害，女記者尤其厲害！昨天在東京訪問『讀賣新聞』時，一千多位

記者中只有二十幾位女記者，今天在中正機場百來位記者中，竟有大半是女性，比日本還先進。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位女記者追蹤性特強，她一連問了二十幾個問題。我們都很肯定台灣記者的敬業精神。」

吳牟人說：「來台訪問這幾天，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台灣新聞界的競爭與活力，這應也是台灣民主政治推進的重要效力。在民主社會，新聞自由與民主政治被視為理所當然、相輔相成的兩個環節，然而在專制體制下，兩者的關係又是如何呢？基本上，大陸與台灣最大的不同是：台灣哪怕在政治嚴密控制下，仍維持着商品市場和私有制，在社會鬆動下，民營報紙即可適時發揮強大的影響力，而大陸，却透過國有制徹底控制。對於中共而言，槍桿子與筆桿子是維護政權的兩大工具，絕不會放。當然，像劉賓雁的批評文章，中共還能『個別』容忍，但若透過這種聲音獲得共鳴，進而組織起來，中共絕對不會坐視。另一種可能是，由於中共黨內多派，或因為派系鬥爭，或為了維護民主門面，而出現了民營報紙。不過無論如何，曾有人問我，大陸在什麼條件下會出現民營報紙？我的看法是比較悲觀的。」

他們在訪問了台灣的各大專院校後，都一致向記者說，他們通過了解學生社團發展現況，充分感到了校園的民主氣息，徐邦泰說：「台大給我的印象是社團活動相當活潑，我還收集了好幾張學生編印的報紙，也看到了許多『大字報』，在參加一項座談會時，與學生、研究生及教授進行全面的溝通，大家意見並不一致，甚至在客人面前爭辯起來，更令我印象深刻。大致而言，台大學生給我的感覺是很有自信，充滿着民主氣息。」

他們在台灣農村訪問時，對台灣土地改革

模式作了詳細的調查，他們說：「大陸土地改革是耕者『種』其田，台灣則是耕者『有』其田，一字之差，結果截然不同。土地問題在中國一直是根本問題，台灣在這方面的成功經驗，可作大陸的借鏡」。徐邦泰、裴敏欣對於台灣進行土地改革能夠平和而不流血，甚表驚訝，他們問：改革之初是否有地主的阻力？如何解決的？土地改革館教務組長謝智榮表示：「早期台灣搞政治的人都是有錢的大地主，必須以身作則配合政府政策。同時，台灣吸收了日本補償地主發放現金的辦法，改採七成實物債券，搭配三四成大公司股票的方式，使地主所獲補償不受通貨膨脹影響，無形中也化解了不少阻力。」五位大陸留學生均感嘆地道：「這麼好的制度，為什麼以前不在大陸實施？」在談到大陸土地改革時，徐邦泰認為：相當失敗。他指出：若說國民黨當年因土地問題丟了大陸，却也因土地改革而創造了台灣奇蹟。共產黨以「打土豪、分田地」的號召取得政權，却也因土地改革的失敗，而產生很多問題。

對於台灣四十年來所創造出來的經濟奇蹟，五位大陸留學生都深為佩服，他們說：「台灣創造的經濟奇蹟是中華民族的驕傲！四十年來，台灣的國民所得整整成長了一百二十倍，這些非常難得可貴的。」台灣的經濟為什麼這麼繁榮？而繁榮的原因又在哪裡？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台灣自由市場的經濟是創造奇蹟的主要原因。

最為值得一提的是，五位大陸留學生還拜訪了立法院，並和台灣的民進黨人士進行了接觸，對於台灣的民主運作方式有了較深層次的了解。

五位大陸留學生二十三日至立法院參觀，出乎意料的，遭到了一些人的「流彈襲擊」，

民進黨某立委出語指罵五位大陸留學生是被執政黨「當成猴耍」，進而引起執政黨立委的不滿，紛紛上台發言，不同意民進黨某立委的譴詞用句。五位大陸留學生在現場旁聽了二十五分鐘，隨後他們參加了一個簡單座談，五人對剛才的指責提出了說明。裴敏欣稱：「賤化民主」是他引美國政治學者杭廷頓的話，他說，如果人人都為了自己利益走上街頭，這種民主一定不能長久牢固。對於「被執政黨當猴耍」的說法，吳牟人表示「我沒有這個感覺」。他們都說：民主權利人人享有，我們來到台灣，也應享有說話的基本人權，別人如果不同意，儘可批評，但不應橫加指責。

五位大陸留學生還與立法院代院長劉濶才會面，並提出若干問題交換意見，徐邦泰說，擔任民主社會的議長似乎很不輕鬆，引發了劉濶才先生的一陣苦笑。徐邦泰道：「在大陸，『人民代表』是許多人公認的很輕鬆的工作，幾乎就是一個不用動腦筋的舉手的機器。在民主社會，才感到議員、議長是最難做也最難當的。」

吳牟人、徐邦泰二十三日還拜會了民進黨主席黃信介，黃信介首先指出：中國大陸在何時、何種情況下，才會出現像民進黨一樣的反對黨？吳牟人道：中共政權當前面臨兩個最大的壓力，一個是台灣的民主發展，另外就是蘇聯的改革。大陸留學生最近在海外最感到「震動」的是台灣黨禁與報禁的開放，台灣的政治民主必須朝着健康、漸進的方向發展，因為它已經對中共形成壓力。黃信介指出，台灣一獨立，中共就會打內戰，因為西藏、新疆、內蒙都會跟進。徐邦泰緊接着說，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獨立是現實問題，不是理論問題，如果講理論，上海人也可以要求獨立，因為中共中

央政府每六塊錢中，就有一塊錢是上海提供的。因此對「台獨」不應有任何幻想。

總之，在十天的對台訪問期間，這五位大陸留學生都深切地感到，台灣儘管在目前，還存在着種種不足和缺陷，但在這片土地上，民主的種籽已經播下，並開始茁壯成長了。他們期望的是，台灣的民主能夠得到健康、穩健的發展，從而進一步影響大陸，成為大陸政體向民主演進的有力的催化劑。

我們能為中國做什麼？

這五位大陸留學生除了拜訪、參觀之外，還參加了許多大大小小的座談會，對中國的前途闡述了他們自己的觀點。

一家報紙這樣報導：

「裴敏欣等五人昨天一連參加了六場座談會，其中除了中央研究院、中華經濟研究院和聯合報的三場座談會是已知並事先安排外，其他三場都是原訂『拜會』而臨時改為座談會的。由於太過勞累，徐成鋼在昨日下午中國時報安排的座談會上，當場不支，提前返回旅館休息。接下來在中央日報座談會時，吳牟人也表示不適，又提早回旅館……」

可見行程的緊張和勞累。

在座談會上，五位大陸留學生就海峽兩岸問題，民主問題，統獨問題，政經改革問題都暢敘了自己的觀點。

吳牟人說：統一並不是最高獨立的價值，人民的利益比統一有更高的價值，不能促進人民的利益的統一，不值得追求。在統一的進程中，如何達到政治經濟的民主現代化？這一點至為重要。

徐邦泰說：統一是中國人的事，人民利益

是至上的，不是少數領袖的事。統一不是要消滅了自我，而是經緩和和對立，實現各自的利益。眼前可行的是交流，從民間交流開始，方可以達到促成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自由化。有此條件，統一就是可以考慮的課題。

裴敏欣說：我對統一問題的看法有四點：一、從統一大業的義與利看，兩岸統一符合中國的利益。二、從統一的原則看，應該是在自由經濟與民主的原則下統一。我們很難想像公有制和私有制，民主和非民主能夠融合在一起。三、統一應該採取和平統一的方式。四、統一的前景，還是比較光明的，關鍵之處是要促使大陸「變」，增加大陸民主化的力量。

錢穎一表示，統一應該在一種什麼條件下進行呢？首先政治上應該民主、經濟上應該採取市場制度。而這兩條，在台灣都是具備的，不具備的是大陸。所以，希望台灣在政治經濟上能產生示範作用。

徐成鋼則強調，他對大陸未來的十幾年，存有很大的希望，短期內應該怎麼辦？我不知道，但未來應走的民主政治制度則是無疑的。政治上不民主，經濟上不自由，就沒有民主可言。

五位大陸留學生這種「位卑未敢忘憂國」的精神，使台灣許多民衆深受感動。台灣女作家張曉風著文稱，他們是一堆「安靜的火」，「在舉世滔滔如洪水漫天，千萬生靈於載浮載沉中滅頂，而這男孩却攀上一根浮木，這根浮木讓他一路能呼吸、能思考，以迄於今。」作家楊明寫道：「對於有緣見到海峽對岸骨肉相溶的中國人，心中有着難言的悸動，雖然我們有着不同的過往，不同的成長歷程，但是，對於中國共有的那份熱望，却足以拉近彼此的心靈。」鄭明俐寫道：「五位青年迢迢跑來台灣

，尋找民主成功的原因，也撿拾失誤的流彈。他們終極的思考乃是：我們能為中國做什麼？這多麼能使我們驚心動容！」

時間過得真快！短短十天的訪問，眨眼就過去了。他們在參加了二十八日的離台記者會之後，心情頗為愁悵，一種對台灣的惜惜離別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吳牟人在他的記事簿裡提了這樣的詩句：

聚——
只不過是生命歷程中，
命定必然的結合，
散——

只不過是生命歷程裡，
緣盡後無可奈何的分手。

只要人們相信，
聚不是開始，散也不是結束，
那麼真正值得在記憶裡鐫刻的
該是聚也依依，散也依依。

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們搭機返美，當飛機升上碧藍的高空，他們俯首下看時，只看海峽兩岸的波濤，沸騰激盪，無止無息。這不禁引起了他們的遐想，中國五千年的歷史，雖然漫長，但比起這萬古如斯的波濤來，也不過是短暫的一瞬，而現在海峽兩岸的隔離，更不過是歷史長河中一瞬中的一瞬。在這裡，一切都是渺小的，而只有時間，才是真正經得住考驗的萬古長存的價值之所在。

讓我們把一個中國人的理想與追求，放在時間的天秤上，讓它來稱出真偽吧！

現在要緊的是——我們到底能為中國做些什麼？！

想到這裡，他們的心又不禁都變得無比沉重，在他們肩頭，分明感到了歷史賦於他們的莊嚴的使命！

歷史的沉思和未來的選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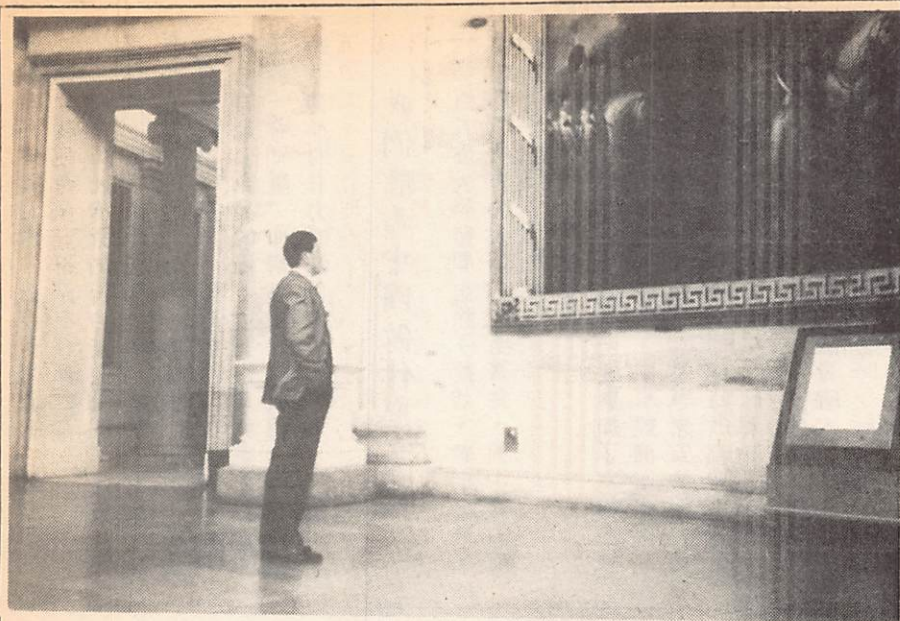
楊小凱

思想敏銳的直感和情緒

我的專業不是政治學，從學問方面而言，我對政治學可說是個門外漢，沒有什麼資格來討論政治理論問題。不過我們這一輩中國人都曾被當代中國的政治動亂所苦，像「久病成良醫」一樣，對政治多多少少也積累了一些經驗。我對政治的關注自然與我會受到的政治迫害有關。我曾親眼看到中國很多不同政見者（其中有些是原來對政治並無興趣的普通人）不知不覺之間竟因政治掉了腦袋。這使我覺得作爲一個普通中國人，爲保全身家性命，都必須懂得中國政治。作爲一個還未成年時就寫下「中國向何處去？」，討論中國的政體問題，並爲此坐牢十年的人，我自然對政治歷史、政治理論、實際政治發展保持着非同尋常的關注。但我在此文中的看法與其說是高深的思想，不如說是這代知識份子中一位思想敏銳者的情緒和直感。

我將從四個方面討論對中國政治改革的看法。第一是民主政治與革命的關係。第二是民主政治與經濟制度，特別是私有財產制度的關係。第三是中國政治的種種特點。最後我總結一下自己的直感和猜測。

我在文革時寫的「中國向何處去？」中推崇「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包括直接選舉官員、取消常備軍、取消高薪等等。而實現這種民主的手段却是激進的革命手段：「推翻中國的新特權階級，砸爛舊的國家機器。」爲此文我坐了十年牢，在牢裡我讀了很多歷史書。開始我想從西方政治史中瞭解，到底什麼是民主政治，民主政體是如何產生的。洛克的思想對我有過極大的影響。雖然我早就是官方意識形態的叛逆者，但自從接受洛克、孟德斯鳩和美國聯邦黨人的觀點後，我才從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變成民主主義者。從洛克的思想，我開始知道革命民主主義與現代民主政治是完全不同，甚至是對立的東西。洛克思想是英國大革命的產物，克倫威爾專政是大革命的後果，而他比舊王朝更糟糕。我讀這段歷史時是一九七二年，當時中國人民中充滿着復辟情緒，大家都在留戀五十年代，都在盼望劉少奇、鄧小平復辟，幾乎與克倫威爾死後，蒙克將軍迎來復辟王朝前英國朝野上下的普遍復辟情緒一樣。按照洛克的邏輯，革命要推翻的是一個暴君，而沒有一個比暴君更集權的力量，却無法打倒老暴君。一旦暴君一倒，對革命中形成的權威，任何人都再無法控制，它又成了新暴君，它又會催



生革命。這就是「革命產生暴君，暴君產生革命」的改朝換代邏輯。

在英國大革命之後的克倫威爾，自稱共和國執政，但實際上比王朝更糟糕，正像中國目前自稱共和國，但却與共和政體毫無共同之處一樣。因此追求民主的第一要旨不是打倒老暴君，而是如何避免改朝換代，陷入「革命民主主義」的陷阱。而馬列主義政治理論的淺薄之處，正在於他從洛克和孟德斯鳩的理論退到了革命民主主義理論，而這種理論比中國式的改朝換代並不會多出什麼。這種理論的核心是誰掌權（所謂國體問題，或者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問題），而不是政體本身的是真正創新。而洛克、孟德斯鳩的理論的核心却是設計一種機制來控制「控制者」。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失敗，正是以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淺薄和沒有控制「控制者」這類設計思想為基礎。因此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失敗不是一個實踐問題，而是政治設計思想的失敗。

共存和制衡令人拍案叫絕

英國光榮革命（實際是次政變）大概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一次政治設計。它在一個有長期專制傳統的國家找到了一個擺脫革命與專制的循環，能有效地控制「控制者」的辦法。光榮革命前，英國實現了復辟，王朝復辟前，國王有個信誓旦旦的宣言，保證不對造反派報復。但他被迎回國，權力稍微鞏固後，馬上大規模報復，把當年的造反派以叛國弑君罪絞死，連克倫威爾的屍骨都不放過。惠格黨（後來的自由黨）人人自危（像今天清除三種人運動中的中國造反派一樣）。造反派當時有兩種選擇，一個是革命，二個是忍讓。但最後却是第三

條路，從海外請來了客籍國王（威廉），用他的武力趕走了舊國王。這滿足了「只能用暴力才能打倒暴君」這個條件。但客籍國王不是革命中生長起來的，他在英國沒有根，國會能控制他。趁他權勢未穩，國會馬上用限制王位法、人身保護法等一系列立法使他變成虛君。然後又有代議制、內閣制等一套制度，而其核心是兩黨制。托利（後來的保守黨）和惠格黨是在長期內爭中互相迫害的兩大派，他們的共存和制衡是整個制度創新的基礎。我當時看這段歷史，忍不住拍案叫絕。這大概是改造專制制度以進行制度創新，擺脫專制的革命循環，走向長治久安的最完美的例子。這種例子對中國 MAKE SENSE，而美國在英國民主制度的基礎上發展民主制度的歷史對中國意義不大，因為中國不是像美國這類「沒有歷史的國家」。所謂政治設計的成功就是說，實際執行的結果與設計的預想基本一致。如果像俄國革命、中



英國在光榮革命中請來客籍虛君

國革命一樣，以民主為目的，而以專制為結果，這不能算成功的政治設計。不能說某些人掌了權，實現了改朝換代，就算成功了。其實從改朝換代的意義上，中國和蘇聯的政治體制設計都不成功，因為很多開國功臣都因他們創立的政體的致命缺陷而人頭落地。

盡量維持上層各派之均衡

民主政體中控制「控制者」的結構說來極為簡單，既然我們認識到人人都有天生的弱點，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控制者，那我們就讓幾個「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獸」的人平等競爭吧。所以三個平等競爭的野獸（兩黨或是三權分立）就是民主，而一個「聖人」却是專制。這個道理雖簡單，但實行起來却不易，因為人人都有征服的本能，都想打倒對方。怎樣才能保證他們和平共處、平等競爭？唯一的辦法是依賴歷史提供各派平衡、誰也吃不掉誰的局面。英國光榮革命前夕，長期互相迫害的兩大派之間就出現了這種誰也吃不掉誰的均衡局面。它就是兩個魔鬼平等競爭（民主）的條件。

所以作為民主主義者來說，實際的謀略就是盡量維持上層各派的均衡，譬如說共產黨比國民黨大了，就要支持國民黨，造反派和保守派中某一派太佔優勢，就要支持他的敵對派。一九四九年民主黨派犯的錯誤就在於共產黨過於強大時，他們不去支持國民黨。其實當時就有一些睿智的民主黨派領袖人物看到了這一點，認識到對共產黨一邊倒會為專制制度創造條件。可惜民主制度的實質當時還未被大多數中國知識份子認識，他們以為民主是一個聖人（共產黨），而不是兩個魔鬼（國共共存）。中國知識份子喜歡附和強權去歧視弱者，這個傳

統也應對一九四九年一邊倒局面負責。

我後來細細咀嚼，發覺有一些更大的歷史背景比「光榮革命」本身重要得多。一個是英國的小國會、小憲章這一段歷史。英國的小國會實質是諸侯會議，很有點像中國的「春秋五霸」的諸侯會議。也就是說英國歷史上有封建諸侯權勢超過國王的傳統。王權的衰落、封建制度的發達，以及沒有中國式的中央集權制，是小國會、小憲章（實際上是個諸侯限制王權的條例）和後來的民主制度的基礎。換言之，民主制度是以封建制度為基礎的。如果王權發達，用中央集權制代替了分封制，則民主制度極難生長起來。正像中國這種中央集權制發達、早就廢止了封建制度的國家，很難產生小國會這種制度一樣。再進一步探究，民主制度的萌芽不是人民參政，而是社會上層階級內的多元化。英國革命的歷史說明，人民革命只會產生暴君，而革命產生出民主大概只找出美國這種已有英國民主傳統的殖民地例子。有人說菲律賓是革命產生民主的例子，而實際上菲律賓的微笑革命只是一次政變而已，政變也是在美國壓力下上層推行民主化政策過程中產生的。這與中國式的革命（改朝換代）實在是天隔地遠。所以我相信在有長期專制傳統的國家，革命只會產生暴政這個假說是可以證明的。譬如說，我們可以假定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獸。有征服他人、損人利己的惡性這一條，對「暴君」和「人民」同樣成立。暴君一被推翻，「人民」就會分為不同的派別，互相鬭爭，既然推翻暴君可行，為什麼打倒敵對派別不行。「人民」會用對待暴君的辦法互相殘殺，直至剩下一個新暴君為止。中國每次改朝換代都要經歷這個過程。把大土匪（皇帝）一打倒，無數小土匪多如牛毛，互相殘殺，剩下一個大

土匪（新皇帝）。最後人民體會到一個大土匪比多個小土匪好些，「寧為太平犬，不為戰亂人」（像不像法國大革命後「熱月政變」時的「秩序黨」和一九七〇年林彪、周恩來聯盟的觀點？），因而新朝代會鞏固一段時間。辛亥革命這種以民主為目標的革命一樣經歷了這個過程。一旦革命發生，只有列寧式心狠手辣的人物才能生存。只有政治白痴才相信這種革命會生長出「民主」。

用革命手段推翻專制行不通

從另一個角度講，假設有可能出現孫中山這類人，利用革命推翻了專制制度，為民主打下了意識形態和憲法基礎，使國民黨「訓政」下長大的人，從小就知道政黨自由、五權分立這些東西遲早是要實現的，所以雖然要經歷兩代人以上的動亂，民主政體終會來臨（像台灣目前一樣），那麼用革命來改變大陸的專制制度是否可行呢？

一九六〇年代末，中國政治極端黑暗，當局的經濟文化政策荒謬絕倫，稍有知識的人都會被這種昏庸無能刺激出參政的興趣：「讓我來治國，比這種搞法一定會好千萬倍」。當時很多人被劃為「黑七類」，受到極不公平的歧視和迫害，「孤苦無告，樹黨強訴」的情緒相當普遍。搞政黨活動、會黨活動的多如牛毛。我當時被關在監獄裡，革命情緒可說是到了頂點，如果有機會，我一定參加反對當局的革命黨的。一九七〇年的「一打三反」運動把這類「革命」活動幾乎完全從肉體上消滅了。一些最優秀的從事革命活動的職業政治家被當作政治隱患而槍殺。這次大規模的鎮壓活動使我觸目驚心。我想起這些被殺害的政治家生前的



革命活動幾乎被從肉體上消滅了

一些思想（他們中不少是我的獄中好朋友），開始體會到他們的一種判斷，即社會現代化過程已使傳統意義的革命幾乎不再可能。當時一些親西方的知識份子在秘密政黨活動中都密切注視在南美搞革命活動的古巴人格瓦拉。他們認為，如果格瓦拉能成功，則在現代社會條件下，在專制國家發動革命就有成功的可能性。儘管他們的政治目標與格瓦拉正好相反（格瓦拉是以革命追求馬列主義理想，而這些中國知識份子却企圖以革命追求西方式的民主）。但格瓦拉是徹底失敗了。很多人總結失敗的原因，與現代化的通訊、運兵手段的發達極有關。

譬如在現代鐵路運兵的條件下，當年的武昌起義根本不可能成功。而現代報紙、電台也使一個專制國家可以完全操縱社會輿論，像中國的大躍進時代一樣，餓死近二千萬人，而人人都以為是「形勢大好」，自己看到的災難只是本地局部性的。而六十年代初和文革中的眾多政黨活動由於官方的封鎖消息，絕大多數中國人包括世界輿論都根本不知道。這種政體有能力把政敵消滅在無聲的黑暗中。

原則上說，在現代化條件下，如果沒有國與國的戰爭，沒有上層階級內的大規模衝突或類似代理人戰爭式的局面，用革命手段推翻一個專制政體（像武昌起義一樣）成功的概率幾等於零。文革中之所以一些非常優秀的知識份子也參與了政黨活動，是因為有一點還不清楚，即像文革這種上層內部的大規模衝突是否會提供革命的機會。但這些知識份子中的一些人後來認識到，文革的作用正是在人民中培養起強烈的反革命情緒。文革不但沒有為改朝換代創造條件，相反却為防止改朝換代、鞏固共產黨的政權起了與預料相反的作用。也就是說，人民自從大躍進以來對專制政體的不滿在文革中發洩掉了。文革中把「人民」土匪本性的一面暴露無遺。在毛澤東短期內允許變相政黨自由的條件下，人民一轟而起，互相殘殺。大家又有了一個念頭：一個大土匪比多個小土匪好得多。復舊和反革命情緒油然而生。這種情緒在批極左路線的口號下成爲鄧小平政權最強的政治王牌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中國今天利用上層衝突發革命的機會比以前要小得多，這是文革的積極後果之一。

革命會延遲民主化過程

留戀一個「大土匪」的情緒是中國人一種有歷史傳統的錯覺。多個「小土匪」如能和平競爭（例如形成互不侵犯的多國或多黨），自然比一個大土匪好，但這種和平競爭的局面在中國出現的概率並不高，其原因可專門寫本書。原因之一是上層內部的多極平等競爭不發達和缺乏穩定的結構，結果往往往給革命和改朝換代以可乘之機。最上層權力太大，中層和上層內部沒有分封制，又不能像歐洲多國制及現代紳士階層等結構來制約中央的權力。歷史的發展，極大程度上是靠碰運氣，誰說美國人不是因爲走運才有了民主制度？

革命會延遲民主化過程，正像一九四九年的革命使中國民主化過程延遲了幾代人時間、俄國革命使蘇聯的民主化遙遙無期一樣。所以防止革命對於今天中國的改革仍是現實和重大的政治問題。

如果有人問我：若是中國今天發生了武昌起義式的民主革命，你怎麼辦？我的回答是：我就會離中國遠遠的，躲開革命中的中國。我本人就是文革後的反革命情緒的代表。我在監獄裡結交的很多好朋友却是一九四九年革命的受害者。我很愛他們，但共產黨革命却把如此高尚的人變成了鬼。我自己文革中家破人亡，母親被逼自殺，我知道革命是怎麼回事；我知道所謂「偉大的人民」在革命中會如何行爲；我知道革命會用迫害政敵的情緒毒害全民族；那時誰都會無法控制這種情緒，而這種情緒正是專制制度的基礎。正像共產黨幾十年迫害政敵（包括他們自己內部的不同意見者）都是以迫害國民黨人的合法性爲基礎一樣。至今迫害「反革命」的合法性仍然毒害着很多親近共產黨的人。有人會說如果革命的目的是真正民主政體，就會避免這類政治迫害狂潮。那可不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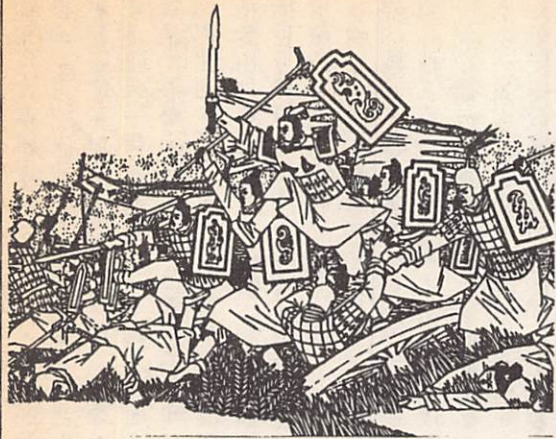
一定。美國南北戰爭中，代表民主的北方勝利後，迫害南方的情緒勢不可擋，一時誰也控制不了，因而出了大量「冤、假、錯」案。有個錯案直到百多年後卡特當政時才昭雪。要不是老約翰遜總統後來力挽狂瀾，與這種迫害南方領袖人物的情緒對抗，美國也不會有今天的民主制度。

改朝換代並不那麼燦爛輝煌

可悲的是，今天中國共產黨並不從理論上否定革命，而是念念不忘「革命傳統」，坐過共產黨牢的人會發現，很多牢裡的政治犯，有與共產黨一模一樣的意識形態，企圖用共產黨革命的方式推翻共產黨。許許多多這類「反革命犯」都是中共革命意識形態製造出來的。年輕知識份子毫無政治知識，盲目崇拜革命，盲目崇拜「人民」這個偶像，這都是革命意識形態的產物。所以專制政體最可悲之處並不是其對人民鎮壓的殘酷，而在於它使人民的意識形態也專制化。因此革命只會複製專制，而這又成爲當權者鎮壓人民的理由，可悲之處就在於這種鎮壓是真正有其理由的。

總之，革命和改朝換代根本不像史書上說的那樣燦爛輝煌，對大部份人而言，它意味着生靈塗炭，意味着人的征服心、損人利己本性的大發洩。

另外，我想強調，我對革命和專制制度的否定完全是從一種功利主義立場出發，而不是從歷史學的角度出發。我是太渺小的個人主義者，我害怕專制和革命帶給我的痛苦。但如果我是個不關心功利的歷史學家，我會說，專制制度，革命的歷史地位却是件比功利遠爲複雜的事情。譬如大家都同意蘇聯的集權制度（



改朝换代往往是極其殘酷的

TOTALITARIANISM)是所有政體中離民主最遠的。但是如果世界是由大量主權國家組成，則對人類歷史發展最有意義的格局是，一百多個國家試驗各不相同的政體，包括最壞和最好的。因為不經試驗，人們根本無法判斷效果(好、壞)。這個過程中試驗最壞政體的國家，對歷史的意義也許最大，因為此國人民雖受盡苦難，但却為全世界人民留下了最寶貴的信息。何況最壞的政體也許有其好的地方(那怕一星半點)，正像蘇聯制度在製造人造衛星方面就會給美國以制度創新的啓發。但作為一個功利主義的中國人，真不希望這個試驗最壞政體的國家就是中國。從歷史的角度而言，好壞不能看短期，壞到底，也許會出好東西，所以在一個長歷史時期內(譬如一千年)，有許多許多的政體在持續不斷的試驗，這是對歷史學家極有意思的格局，但對我們這類渺少的功利主義者，意思却不大。從信息論的角度而言，對歷史後果不輕易下結論，爭取盡可能多的

社會試驗機會是會得到最多信息的。可惜如果我是個被試驗政體下的人，我最關心的却不是信息的多少，而是我個人的幸福。

外國歷史值得借鑒

支持用革命手段追求民主政體的人，自然會用法國大革命來反駁我關於「用革命手段推翻一個專制政體成功的概率幾等於零」的觀念。法國大革命製造了徹底的改朝換代，雖沒有代議制，但却產生了一個「造反派的皇帝」——拿破侖。正好，拿破侖是我最崇拜的一個歷史人物。

試想想，有誰能一槍不發地征服一個與他為敵的政權。而拿破侖百日復辟時正是帶着少數隨從，一槍不發地走到巴黎，沿途，與他敵對的軍隊當他走進時，都高呼「皇帝萬歲」而倒戈。拿破侖會創立科學院制度、現代大學制度、整個大陸體系的成文法制度。私有財產制度在拿破侖法典中「像數學邏輯一樣嚴格建立起來」。被黑格爾這種知識份子真心崇拜，稱為哲學理性在地球上的代表，這種君主實在不多。拿破侖臨死前曾聲稱：「我用以傳之萬世的，不是我的政績和武功，而是拿破侖法典。」顯然法國大革命的主要成果不是民主政體，而是保護私有財產和確定陪審制度的成文法。法國革命後，幾經改朝換代，直至世界大戰時從來沒有真正確定民主政體，但所有朝代都把拿破侖法典奉為主臬，不敢變動。革命後真正被鞏固了的是拿破侖確立的私人財產制度和法律體系。

法國的歷史，與香港、台灣、南韓等東亞現代社會，都說明私有財產制度是比民主政體對現代社會更根本的東西。只要有完備的法律

和私有財產制度，不是民主政體也無關大局。

英國「光榮革命」的另一個大背景是，英國歷史上對私有財產權處理的傳統。中國歷史上皇帝可任意徵用和沒收私人財產。皇帝知道如果「富商大賈富過王侯」，則意味着他的政治壟斷地位將受到挑戰，對這種挑戰的敏感往往與對改朝換代危險之警惕(很有意思的是，周恩來也喜歡用這句子提醒毛澤東對共產黨朝代之威脅的警惕)。所以，中國多數朝代不允許獨立的商人富過王侯，太富了，就要「國有化」，就要「共產」。這倒很像今天的共產黨。商人造反往往是建設性的，不像「無產階級造反」，農民造反那種純粹的改朝換代。而英國不但早就有一大批新貴、大賈，經商致富，富甲王侯，而且國王打仗必須屈膝向他們借錢，私人財產是不能隨便充公的。這種借錢中的衝突正是英國大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直接導火線。只有新的中產階級的獨立經濟勢力超過了政府的權力，政治變動才有產生制度創新的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否則政治變動幾乎完全等於動亂或改朝換代。國有制佔主導的民主制度不但是種烏托邦，而且是種欺人之談。我相信，「不可能有以國有制為基礎的民主政體」是可以被證明的另一個假說。

私有制之政治功能

私有財產制度的政治功能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度的發達，使社會上層結構多元化。不但有政治精英，而且有一個有管理社會能力的企業家精英階層。現代的激進主義是種中產階級現象，而中產階級的激進主義與農民和無產階級的激進主義是性質

很不同的。中產階級的激進主義往往表現出互利性，其關心的重點是政體，而不是改朝換代和國體等等與損人利己的征服心有關的事。資產階級與當權派的競爭更接近上層內行間的競爭，而不像農民起義這類外行競爭。

二、私人資本主義的發達，可以使社會的「仕途」（知識份子的出路）多元化。經商可能比當官更富有、地位更高，所以戀權不退和秀才落第造反的可能性都大大減少了。中國很多改朝換代都是落第秀才搞起來的。中國也極少有自動讓權的例子。這都與私人財產制度不發達有關。

三、沒有發達的私人財產制度不可能有真正獨立的知識份子和政黨。正像我敢在這裡講一些真正獨立知識份子的話，是因為有私人基金會資助我來美國一樣；如果在中國，我就不可能保持如此獨立地位。大陸現在的八個「民主黨派」也不得不附在「共產黨這張皮上」。在這種國有制佔優勢的情況下，所有民主的鼓噪都不會超過中國歷史上「清議」政治的水平。中國曾經有發達的清議政治，士大夫被鼓勵針砭時弊，為民請命。但沒有獨立的中產階級，這種「人民」是種偶像崇拜，是當權者壟斷政治的一種玩偶。正像中共最喜歡用「人民」這種偶像崇拜來推行各種政治運動一樣。

四、私有財產制度具有將政治動亂與經濟活動隔絕開來的作用。美國大選時，政治機器會有短暫的停頓，但這並不會影響經濟的正常運轉；而中國文革中的變動，對經濟影響極大。仔細觀察中國的人，會發覺工業生產最糟時是短暫實行變相政黨自由的一九六六年底到一九六八年中，而生產率最高的却是專制暴政最厲害的一九七〇年。在社會主義國家，還有一種怪現象，勞改隊的生產率比同等條件的國營

單位要高。也就是說，國有工業制度的確要與專制政治相配合。在國有制條件下是不能搞「大民主」的。不過中國人是聰明絕頂的民族，文革政治動亂中，江浙南方一帶發展出一種發達的半私有經濟制度，以溫州、常州、無錫為代表。很多農民和私人企業家，利用文革國營經濟癱瘓的機會，發展出一種準私有制經濟。他們從物物交換式的市場做起，發展出一個計劃控制之外的發達的私人經濟市場。這種市場倒很適應文革的「大民主」氣候。不管政治如何動亂，它照樣發展。

私有制能順利走向民主

這種現象使我有種直覺，中國人是個有私人資本主義本能的民族，那怕是共產黨統治下，他們都有本事發展出私人資本主義來。正像學大寨運動中，有些生產隊就偷偷把田分了，由於產量激增，還得了農業學大寨的紅旗。中國人長於與政治權威妥協，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兩面派功夫實在到家。上海是另一個例子。「四人幫」用專制主義辦法經營上海的國營經濟，相當成功。而上海經濟却很不適應改革後的一些自由化搞法。國營經濟與專制政治有某些內在聯繫，這種關係不是人的意志可以改變得了的。

廣東也是一種例子。廣東私人資本主義目前已相當發達，在廣東就沒有北京那種空洞的政治熱情，廣東的學生就不鬧事，也沒有革命情緒。更不喜歡那些奢侈性的知識份子頭銜。用私有化防止革命和改朝換代的威脅，實在是共產黨的利益所在。如果不搞私有化，而推行把人分為等級的「知識份子政策」之類的（知識份子高人一等，工人低一等之類）「民主」

政策，結果是既討不了知識份子的好（因為這種政策不會多生產出住房、汽車），又會激化革命情緒。

以私有制為基礎能順利走向民主的典型中國人社會，當然就是台灣。台灣走向民主是很自然的事。它有一個富過政府官員的強大中產階級，有一個獨立於政府權力的強大社會。很多人收入比政府官員高，天天在議會罵政府。而在大陸，政府吞吃了整個社會，獨立於政府的中產階級或社會幾乎不存在，或奄奄一息。這種情況下奢談民主是很危險的，因為根本沒有社會結構的基礎。如果只是想欺騙與論或粉飾太平，那還不太危險；如果真想試試民主政治，搞不好就會引出動亂和改朝換代來。因為若沒有獨立的中產階級，則「人民」是不具建設性、很危險的改朝換代的政治勢力。

共產黨靠鎮壓政黨過日子

中國政治有其十分特別的地方。中國政治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朝代周期。所謂國體概念、專政概念、革命與反革命的概念，無非是用現代政治詞語來談論這個古老的特點。朝代周期現象在歐洲並不明顯，那裡的朝代更迭很少是由自下而上的農民起義造成。歐洲歷史上基本上沒有成功的農民起義（革命），而大量政治衝突是發生在國與國之間。美國人更不懂什麼叫「改朝換代」。這種中國政治與西方政治的巨大區別，使兩個政治文化背景的人們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辭典。中國人在談論民主時，他的意思與西方人心目中的民主也許根本是南轅北轍。譬如美國人在談政黨自由時，沒有人會將其與改朝換代聯想起來。但中國人成立的大多數政治組織，都以改朝換代為目標（他們

自稱替天行道、革命或解放等等)。農民起義軍是這樣，國民黨是這樣，共產黨也是這樣。中國政治中成功的政黨都是改朝換代黨(革命黨)，而不是現代政治意義上的「政黨」。所以中國人一講政黨自由，馬上會想到改朝換代。特別是共產黨這個經過成功的徹底改朝換代的朝代，他以極殘酷的手段鎮壓一切政黨活動(爲首份子判十五年徒刑至死刑)，因此對政黨自由與改朝換代的關係特別敏感。以我個人對中國政治犯的觀察，一九四九年後大陸的絕大多數秘密政黨活動都是以改朝換代爲目標，不管是親蘇的「勞動黨」、親西方的「民主黨」、親台灣的「反共救國軍」、信儒家的「大同黨」，還是農民會黨性質的「一貫道」。

而共產黨的政治穩定，全靠對這類政黨活動的殘酷鎮壓，從鎮反、肅反、反右、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這種靠鎮壓政黨活動過日子的政權，會開放黨禁、搞民主政體，這不是哄小孩的鬼話嗎？如果不是這樣殘酷鎮壓政黨活動，共產黨還能幹盡壞事而不垮台嗎(一九五九年餓死近兩千萬人，「文革」又使中國生靈塗炭)？像任何一個新朝代一樣，共產黨開國是以殘酷鎮壓爲基礎，而以德政爲輔助，共產黨的德政實在少得可憐。

共產黨朝代的特點是極權主義

國民黨很像歷史上的隋朝。國民黨比共產黨更像現代政黨，他文化很高，但却不太會打仗。國民黨的革命沒有徹底改朝換代，他把清朝時代的紳士階級和新的中產階級幾乎完整的保留下來了。所以國民黨的革命不太像改朝換代，有點現代資產階級革命味道。而共產黨朝代極像明朝，他是一次徹底的改朝換代，對基



中共王朝要將異己份子趕盡殺絕

層的舊社會紳士階級趕盡殺絕，打入十八層地獄。經過各次政治運動，特別是不爲人注意的一九五八年劃極右和壞分子運動，過去的紳士階級、中產階級已完全沒有社會地位，比奴隸還可憐。一般而言，中國歷史上這類徹底的改朝換代，朝代壽命是相當長的(一般在三百年左右)，不是因爲他的開明，而是因爲他的殘酷。與恩格斯和維特福格(KARL WITTFOGEL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NEW YORK: VINTAGE 一九八一)所議相反，這類亞西亞式的專政並不是建立在管理公共事務

(如水利)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用一個大土匪扼制無數個小土匪，即扼制人的征服他人的惡性的基礎上。

中國政治歷史的另一個特點，是非常極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而不是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但是共產黨朝代的特點却是極權主義而非權威主義。共產黨式的集權主義是人類歷史未曾有過。中國目前對人口流動的控制不但史無前例，也比其「老大哥」蘇聯嚴厲得多。所以中國很多史無前例和旁無佐證的極黑暗的政治現象，只能說是馬克思主義與儒家文化結婚生下的一個文化怪胎。對這種文化怪胎的情性和黑暗切不可低估。中國政治正處在共產黨朝代之中興的前夜，又處在蘇聯式經濟制度的危機中，同時處在世界上發展最快以私人自由經濟爲基礎、以儒家文明爲背景的東亞新工業國包圍中。中國從來看不起的小日本、南韓、台灣，甚至泰國，都在以極高的速度逼近發達國家，拉開與大陸的發展水平的距離。這些都是中國當代政治發展的原動力。另外兩個原動力，一個是台灣問題，二個是文革形成的特殊的政治動力結構。

英國光榮革命的另一個大背景是歐洲十幾支文化、十幾個實力相當的國家之間的平等競爭。這種結構以統治者之間競爭如何治理國家爲主，而不是以人民和統治者爭誰掌權(國體)爲主。所以這類政治動力結構類似一國內的民主政體，有防止革命、保持內行同級競爭的功能。今天中國也有了類似的國際環境。中國文化本身就多元化了。至少有日本式的儒家和西方文化相結合的文化、台灣式的中國文化、香港式的中國文化、大陸式的中國文化、新加坡式的中國文化等數個亞文化。

英國光榮革命時如果沒有從國外請客籍國王的可能性，則擺脫革命和專制循環的概率可說是百分之一。而請客籍國王設立虛君當然要有與英國平起平坐的國家存在。今天中國也有了類似的機會。譬如說，一旦中國大陸上的黨爭激化出現英國光榮革命前的局面，請國民黨回大陸以客籍政治力量的身份來平衡雖然是一種少概率事件，但這個概率雖小却大大大於零（相當現實）。歷史發展本身就包括很多小概率事件的出現。

中國走向民主的過程，台灣問題成爲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這不但因爲台灣正在迅速走向民主政體，使中華民族這個最古老的民族第一次有了真正的政黨政治，而且因爲台灣的存在使中國的政治結構不可能一元化。至少國民黨、共產黨就是二元的。沒有台灣問題，不會有一國兩制的政策，共產黨也沒有今天這麼開明。如果沒有台灣問題，中國極可能走蘇聯式的政治演進道路，當局會像蘇聯罵沙皇一樣，使自己對政敵的政治迫害永遠合法化。而有了個台灣，中共就不可能做到這一點，因爲全世界有目共睹，台灣的政治民主化、經濟發展都遠遠走在大陸之前。共產黨迫害國民黨的合法性就永遠受到挑戰，而否定任何政治迫害的合法性正是民主政治的第一必要條件。另外台灣的存在自然與民主的另一個必要條件——私有制度有關。台灣與香港的私有制始終對大陸中國人是一個最直接的樣版，有了這兩個樣版，任何私有制不適合中國國情之說都不可能站得住脚。台灣無疑起着一種類似兩黨制的功能。回想地中海文明史上，十幾支文化之所以可以和平競爭，一個最重要的政治地理因素就是海洋的扼制武力競爭和促進商業、文化競爭的作用。爲什麼內陸國家難以發達，原因之一也是

內陸方便武爭，但商業運輸在內陸却成本高昂。台灣海峽在當代中國政治史上也起着扼制國共兩黨武力競爭而促進文化、經濟和平競爭的作用。

中國歷史從未有過成功的復闢

文革是使中國不可能重覆蘇聯的政治發展模式的另一個決定性因素。從上層而言，文革造成了鄧小平復辟。這在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史中是絕無僅有的事。赫魯曉夫是史達林一派的，赫魯曉夫反史達林是史達林派內的分裂，這並沒有擺脫社會主義政治永遠朝一種不斷分化這個規律。而鄧小平復辟是第一次「反黨份子」重新上台，打破了政治朝一種分化的規律。這一特點的深遠歷史意義，現在還難以被人們全部看清。革命後的復辟往往能有制度創新，至少能避免改朝換代的惡性循環。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成功的復辟，却有無數成功的革命，這正是中國歷史進步緩慢的原因。每個朝代初期都是文化水平最低，善於征服，而不善於管理。很多朝代末期文化水平是最高的，善於管理，却不善於征服。革命一起，幾百年積累起來的經濟、文化發展成果毀於一旦，新皇帝又是個征戰的內行、管理的外行，一切從零開始，積累數百年，又一個改朝換代，毀掉一切重來。中國歷史就這樣原地進退不能進化。英國有復辟，復辟爲光榮革命打下基礎（而不是爲革命打下基礎）；法國有復辟，拿破侖的法典正是在復辟時期鞏固下來。但中國的復辟却總不成功。共產黨歷史上也沒有成功的復辟，而鄧小平却是破天荒第一位成功的復辟者。復辟推進歷史前進的功能至今並未被人系統地研究過，但我有個直覺，其中學問很多。

文革並不是史達林的肅反。毛澤東在文革中（一九六六——一九六八年）不是用官僚反官僚，而是下令停止共產黨組織活動，允許普通百姓自組政治組織，用這種變相政黨自由的辦法號召被共產黨打成反革命的人、受歧視和受迫害的人起來造反。文革形成了群眾性的政派，不但是群眾性的，而且大多數幹部都捲入了不同的政派。這兩派有大規模互相進行政治迫害的歷史，正像英國光榮革命前一樣。文革後如果不搞「清三種人」運動，文革遺留的政派問題可能會消失。但「清三種人」運動，以及以後對文革中造反派的公開和大規模歧視迫害，使文革的政派問題成爲中國政治中的動力結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清除精神污染」和最近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又形成了新的政派結構。由於文革的原因，政派結構有公開化、合法化的傾向。例如批判一些失勢政派首腦人物（如方勵之、胡耀邦），反而越批越香，威望大增。這就是政派公開化、合法化的一種趨勢。最近中國的人代大會，由於港澳記者和代表的參予和自由化運動中海外留學生和知識份子形成獨立聲音，都制止了中國政派鬭爭朝一種分化和一元化發展。兩派均衡的局面極可能出現和合法化。這就是民主制度所需的內部動力結構。

討論民主改革為時過早

從上幾節的討論，我有幾點直感：第一、用革命手段追求民主不但不可取，而且民主的第一個必要條件就是避免革命與專制的循環，而革命本身却是促成這個循環。第二、沒有發達的私有財產制度時來談民主政治是相當危險的事，因爲這可能導致動亂和改朝換代。第三

、中國共產黨朝代的演進根本不到談民主政治的時機。共產黨還在開國時期的末尾，它的本特點就是鎮壓政黨活動（政黨是民主的必要條件）和壟斷政治。

雖然討論民主政治改革為時太早，但很多特殊事件，如「文革」、台灣問題、鄧小平復辟、蘇聯式制度危機等等，又為政治改革（不是民主改革）提供了動力結構。中國處在一種從極權政治向權威政治過渡的可能性面前，雖然離台灣正進行的從權威政治向民主政治過渡還相差很遠，但脫離蘇聯政治發展模式的概率却相當大。

我想今天政治改革中頭等重要的是經濟改革中為私產化市場化創造了條件，以及在行政改革和立法等方面為上述政治過渡創造條件。即使不搞私有制，中國的行政改革和法律制度的完善實在有很多事可做，例如恢復中國歷史上傳統的迴避制度、文官考試制度、文官系統與政黨官僚系統的分離（前者由考試制度產生，後者由政黨活動產生）、模仿台灣搞軍隊國家化、省級直接選舉、用立法形式保證檔案制度向人民公開（特別是向本人公開），以及設立上訴法院、改變以黨報充當上訴法院的不正常狀況等等。特別是省級直接選舉問題迫在眉睫。因為文革後，地方政治因私人勢力化有更趨黑暗的現象。毛澤東調動省級官僚頻繁，這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地方政治中難以形成強大的私人勢力。但文革後地方政治私人勢力的傾向大有加強之勢。

但所有這些改革的中心原則應該是互利的，要讓所有人得利，尤其要讓原來的特權階級得利，儘量不讓人在改革中吃虧。明治維新成功的根本原因就是要所有人得利。譬如取消貴族和武士階級的特權，發放一次性俸祿（類似

轉業退休金），這是比今天中國改革激進得多的措施。但關鍵的不同是，明治天皇把這些特權階級引導去投資做生意，他們中大多數後來都經商致富，比以前的日子好過多了，所以成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而不是阻力。中國農村改革的成功，也是很多幹部利用特權成了專業戶，發了財，變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但是城市改革中，這個問題卻沒有解決。高幹的真實工資收入相對於他人而言是降低了（儘管非工資特權收入很高）。退休加薪等贖買政策並不是很有效，因為在位的特權收入佔的比重太大。

選擇的機會

如果有人問我：假如中國今天容許民主競選人代表，而你又有機會參加競選，你的競選政綱是什麼？我會告訴他，我的政綱第一是控制物價，第二是知識份子政策等等。當然我心裡想的正好相反，既反對控制物價，也反對政府有任何「知識份子政策」；而是應由勞力市場上的供求力量來處理知識份子問題。但中國大多數人只懂那些對他們不利的空泛之談，要想當選人大代表，當然只能投他們所好。如果有人問我：假如中國今天有一個拿破侖式的人物，他願意聽聽你的謀略，你願意向他講什麼呢？那我會告訴他：中國當務之急是把國營企業拆成股份，把股份給特權份子，將其特權「私產化」，並讓他們退休經商或吃股息，則他們就會由改革的阻力變成動力，像明治維新一樣，解決了這個問題，改革就上了正道了。其他細節，這些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會妥善替你解決的。

如果第三個人問我：你作為一個民主主義者，如果有機會向社會大聲疾呼，你會說些什

麼呢？我就要告訴他，如果我能電視中向人民大聲疾呼，那我會說：民主的當務之急，一是設立人身保護法案，取消反革命罪，禁止任何政治迫害。二是推動修憲運動，取消四個堅持。實現政教分離，取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國教的地位；保證真正的信仰自由。從短期而言，這可能沒有效果，但台灣和各地民主政治的成功都說明憲法意識是民主政治的基礎，有著極深長期影響。正像孫中山立國時的憲政思想，使很多中國人從小就知道信仰自由、新聞自由、三人可組黨，這都是中國遲早要實現的政治原則。而今天台灣的政黨政治，取消新聞檢查，不都是幾十年憲政思想深入人心的結果嗎？所以作為一個民主主義者，今天那怕是對牛彈琴，也要提出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設立人身保護法案這類具長遠影響的問題。

我一直擺脫不了中國知識份子的致命缺陷：過份強烈的使命感，關心國家命運，多愁善感（中毛澤東「關心國家大事」的毒太深？）。儘管來美國後這種毛病減輕了一點，我更關心自己在市場中的比較利益和可能賣得出去的產品（我的產品是知識），但「不在其位，却謀其政」的毛病還是有一點。因此這次抵抗不住朋友的鼓動，又寫了一篇充滿使命感、「不在其位，却謀其政」的文章。寫完之後，悲從中來。因為這種過份強烈的使命感，正是中國政治經濟制度不健全，迫使非職業政治家過份關心不是他專業的事。不管如何，每當中國政治變動發生，我都會「思潮澎湃」、「聯想翩翩」、「傷感」一番，不是對政治的興趣，而是一種「精神享受」。試想一個為看中國政治這齣戲，付了十年牢獄之災門票的人，怎會不仔細觀賞這齣票價高昂的話劇呢？

略論「自由派」知識份子

陳力

如果我們把今天中國大陸社會的知識份子層同「毛澤東時代」的知識份子層加以比較和剖析，我們就不難發現，他們已經有了明顯的進步，其區別的重要標誌之一——就是有越來越多的所謂的「自由派」的知識份子的出現。

「自由派」知識份子——或許我這樣稱呼他們並不完全準確——他們顯然已不再像「毛澤東時代」、特別是反右以後的知識份子那樣，受縛於思想控制，迫作「馴服工具」，處處顯得謹小慎微、循規蹈矩，而是在專制的條件下，首先找好他們自身的「掩體」，然後採取他們各自認為可行的方式，對執政者和由此造成的社會弊端作可進可退、可攻可守、可伸可縮的靈活多變的抨擊。對這些「自由派」知識份子，我們可以開出一大串「名人」名單，如方勵之、劉賓雁、白樺、王若望、王若水、金觀濤、于光遠、于浩成、厲以寧、李洪林、張賢亮、劉再復……等等，雖然這些人看問題的角度、深淺、抨擊的火力以及個人品格的高下都不盡相同，但其特質與取得的效果却是一致的。除此之外，當然還有很多名氣次之或者完全無名之輩，如果把他們都加起來，則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目，在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中，

應該說已經佔了一個相當大的層面。

那麼，我們要怎麼認識中國大陸社會中出現的這一特殊的新現象呢？「自由派」知識份子對中國應負有怎樣的使命以及他們是否能承擔這一使命呢？它對專制政體的衝擊和政治、經濟的改革的推進能起多大的作用呢？在一個極劇變化、動盪無常、險象環生的社會環境中，他們自身保險系數如何呢？這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

政治夾縫中的生長空間

讓我們先來回顧一下歷史。

「文化大革命」——這場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史無前例」的最慘烈的浩劫，把中國共產黨一手建立起來的政權推到了由盛及衰以致崩潰的邊緣，按照毛澤東模式構架出來的社會主義社會，通過這暗無天日的十年，已經把它的弊端暴露到了極限，此時，無論是普通的老百姓，或者是那些高踞人民之上並會同毛澤東一起為虎作伥的黨內「走資派」，都對毛澤東的統治產生了極其強烈的不滿，這時的社會思潮大體分為三種類型：(一)以華國鋒為代表的大權

在握的「凡是派」，仍要繼續實行毛澤東式的統治方式；(二)另一些當權者則企圖對社會作一些有限的變革，以期挽救這個搖搖欲墜的政權。發展到後來，則是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的「改革派」；(三)第三種情況當然是飽受「文革」之害的下層的人民中的覺醒者，他們已對這個制度和建立這個制度的思想體系產生了深刻的懷疑，其代表便是「民主牆」的激進的民主主義者，他們明確地提出了要在中國實現第五個現代化——即政治現代化的問題。在一段時間裡，第二種社會思潮和第三種社會思潮找到了共同點，這就是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一方面是鄧小平之類的人物企圖通過對「文革」的否定奪取華國鋒手中的權力，另一方面是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又想依靠鄧小平的力量改變毛澤東所建立的專制政體和思想體系，他們取得了「聯合」，這就是為什麼在那一段時間「民主牆」得以生存的政治原因。但這種「聯合」又是一瞬即逝的，當鄧小平一旦取得對華國鋒的奪權的勝利，他就非常敏銳地察覺到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對政權的隱患和威脅，於是他又採取了當年毛澤東的「殘酷鬥爭」的手法，利用政權的力量摧毀了「民主牆」，逮捕了

以魏京生為代表的激進的民主主義者，使第三種社會思潮的發展受到強力的壓制。

這時中國大陸的思想浪潮便出現了這樣的情形：(一)激進的民主主義雖然被壓抑了，但人民對社會現狀的不滿仍然強烈存在，他們需要尋求為他們說話的代表人物加以表現；(二)作為當權者，雖然已從「凡是派」手中取得了權力，但為了要鞏固他們的權力，推動社會按他們的構想加以變革，也同樣需要一種輿論力量——這種輿論的力量一方面既要衝擊影響他們運作的舊有的束縛，一方面又要在他們的羈繩的控制之內。也就是在這種政治夾縫中，「自由派」應運而生了。這些人和那些無名氣的激進的民主主義者不同，他們的代表人物都是一些較有名望的知識份子，同時又大都是毛澤東歷次運動的受害者，借「平反」之機重登政治舞台。他們一方面對中共的統治的弊害有深刻的認識，一方面又受到了新當權者的恩澤，同時還帶着強烈的「心有餘悸」的心理。他們憑着他們長期同中共打交道的痛苦的經驗，採取了他們有異於激進的民主主義者的獨特的形式，同時在官方和民間的各種思潮之間找到了結合點，在官方眼裡，他們好像是共產黨，而在人民的心目中，他們又好像是「中國的良心」、「人民的喉舌」、「青天」等等。

「自由派」的知識份子便成了這樣一種複雜的矛盾體。

找好了掩體的戰鬥

那麼，他們這種獨特的方式是什麼呢？

一言以蔽之，就是他們在抨擊政治體制和社會弊端之前，他們必需事先選擇好他們的「掩體」。

這是一種離開了中國大陸的特定環境便很難讓人理解的奇怪的現象。在這裡，尋找一種什麼形式，成了比內容更至關重要的東西，他們首先考慮的，不是他們想的是什麼，說的是什麼，做的是什麼，而是用什麼形式想出來，說出來和做出來，使自己在話說出口又遇到難以逾越的強大阻力後，便於退縮回來，以保自身的安全無虞。

這些找尋「掩體」的方法包括：

(一)他們之中的代表人物，多是不同層次的（全國級的、省級的、地區級的等等）「社會名流」加共產黨員。如方勵之，是科技大學副校長、中共黨員（後被開除）；劉賓雁，全國作協副主席、名記者、中共黨員（後被開除）；蘇紹智，馬列主義研究所所長、中共黨員；王若水，「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中共黨員；等等。有的選爬得更高，成為「改革派」核心的「智囊人物」。但這些「名流」又有一個共同點，即他們迄今為止，沒有一個步入中共權力的決策核心，並且似乎在以後很長的時間內，也不可能步入決策核心，他們的部份思想，只能通過「改革派」權力人物如胡耀邦、趙紫陽的過濾、選擇才能表現出來。利用「社會名流」這一掩體對中共政局進行批評，在他們看來，似乎要比一個無名之輩安全得多，也要有力得多。所以方勵之在一次講話中，曾表示要大家都「爭取出名」，「有了名才好說話」。

(二)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反資」後的方勵之除外）都要做出「第二種忠誠」的「包裝」。不管他們心裡是如何想的，也不管他們的言論如何激烈，甚至再度被中共冠以罪名，他們在口頭上似乎永遠不拋棄對黨的「第二種忠誠」。如果我們深入研究劉賓雁現象，我們就

會發覺，作為劉賓雁，他絕對是一個明白人，他的報告文學，每篇都是鋒利的匕首，直刺中共的心臟，他已經深刻地認識到，馬、列、毛主義絕不可能解救中國，而只會把中國推向滅亡的深淵，但「明白」的劉賓雁却固執地把自己扮成一個「糊塗」的角色，不斷地表現「第二種忠誠」。再如王若水、蘇紹智等人，他們從來都沒有離開過馬列主義去研究問題，從表面看，是馬列主義的忠誠的信仰者，但他們却通過「人道主義」問題、「異化」問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問題，把馬列主義的根本原則作了最徹底的否定。



劉賓雁和王若水，他們口頭上總不願拋棄「第二種忠誠」

(三)他們很少對中國政治作赤裸裸的攻擊，而總是善於在「學術探討」的「掩體」下對中共作曲折迂迴的批評。這些「自由派」知識份子，似乎有一種嫺熟的技巧，把一切犯忌的言論納入「學術」的軌道，是文學家的，從文學的角度去談；是經濟學家的，從經濟學的角度去談；哲學家從哲學的角度，人文社會學家從人文社會學的角度，法學家從法學的角度。「

「河殤」電視劇的創作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河殤」明明是黨殤，但作者只把罪過歸結到似是而非的傳統文化上去，這種指槐罵桑的曲筆，其目的還是在於尋找一種安全的「掩體」，同時也達到了讓人民意會心領的目的。事實上，凡看過此電視的大陸人，誰都明白作者的真正含意是在說什麼。

四「自由派」的作戰是呈現出一種散兵游勇的形式，他們或許不忌諱談聯合，但他們却從不採取聯合的行動。他們之間也有勾通，但那不過是一些無傷皮毛的鬆散的沙籠式的組織。現在，在中國大陸，無論是上層或下層的知識份子，沙籠式的組織幾乎比比皆是。

無疑地，「自由派」知識份子的興起對中共專制制度帶來了一定程度的衝擊，也對民主思想的傳播和民主進程的推進起了良好的作用。但作為中國社會的先覺者——知識份子，他們這樣做是否已盡到歷史賦予的責任了呢？他們思想和行為是否還有升華的必要呢？他們這種尋找「掩體」再出擊的自以為得計的辦法，是否能使他們永遠得到保險的系數呢？對此，我認為都大有值得商榷的必要。

離開掩體便失去了戰鬥的意義

首先，我認為，在當前中共一黨專制的政體下，利用「掩體」戰鬥是一個無需排除的好辦法，他們這樣做，是可以讓人理解的。

這個道理是很明顯的，我們不妨舉幾個例子加以說明。

第一是「河殤」的創作過程。如果作者真正把他創作「河殤」的原意講出來，那我相信，他絕對不在於批判中國的傳統文化（當然也不排斥作者對傳統文化的批評），而在於批判

中共四十年來的倒行逆施對中國文明的傷害。但作者隱晦了他的目的，在一個沒有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現實環境裡，在一個嚴密的層層審查的制度下，作者所考慮的，當然第一重要的是出版（公開放映），沒有出版就沒有一切，如果戰鬥是無聲的，就等於沒有戰鬥。所以，在這種情形下，作者不得不做出痛苦的讓步，把他的創作原意加以扭曲，以使之可納入官方許可的渠道。而這個渠道，比之「毛澤東時代」，現在畢竟要寬容了許多，這個「寬容」，就是容許「學術探討」的自由，雖然這個「自由」是極其有限的，但它終究為「自由派」創造了一個狹小的空間。這個片子出來後，一方面引起了人民的巨大的震撼，但另一方面，也給當權者帶來了恐慌和震怒，據說王震就明令要禁，但由於「河殤」找尋到有一定保險系

白樺一語道破自由派若衷



數的「掩體」，又常常使當權者無從下手，最近已經召開的第五屆文代會，又傳出新的信息，認為「河殤」問題可以探討，領導的意見並不是最後的「判決」。這樣，「河殤」也許可以在「學術」的「掩體」下得以生存，而「河殤」的作者也由此免遭一難。

第二是劉賓雁。如果我們設想，劉賓雁僅僅只是一個無名小卒，那麼，中共在對付他的時候，也就不必費如此的心機了，他或被處死、或入牢獄，也不至造成什麼影響。正由於他是名作家、名記者，不僅本人是中共黨員，而且還是「第二種忠誠」的信奉者，這就在中共對他進行「懲處」時，把他們自己放到了一個很尷尬的境地。事實上也是如此，當「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黑浪掀起時，他們把劉賓雁開除了黨籍，顯得非常違背情理，人們再一次得出結論：共產黨的專制不僅對異己而言，就是對「忠誠」於他們的人士也同樣是如此。所以他們雖然給了劉賓雁一些懲罰，但失去更多的，却是中共自己。

從這一角度來看，尋找「掩體」的做法是可取的。「自由派」的這一特徵，可以說是中共專制制度的一種產物，也同樣能說明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狀況，法治的狀況都是相當差的。

筆者有幸聽過白樺在紐約的一次演講，他用無可奈何的淒愴的聲音說道：

「因為我不是香港人，也沒有生在美國，不然，我會比你們說得更直接、更大膽。」

這話一語道破了「自由派」的苦衷。他們常常以「說真話」自居，但事實上他們說的「真話」也並非完全是心裡所想的真話，這對他們來說，當然是極其痛苦的，但好像他們也並沒有想到要改變這種狀況，他們認為，中國大

陸的事，就只能這麼說，這麼做，一出了「格」，便會失去戰鬥的意義甚至惹來殺身大禍。當然事實並非如此，他們的做法完全有進一步昇華的必要，這一點可以留在文章的最後來探討。現在我們暫撇開中國大陸的客觀的政治環境，再把觸角伸向「自由派」的內心世界，對他們本身的虛弱的一面作一番檢審。

他們應該有一種深刻的自我反省

目前，「自由派」和中共當局的關係，就有點像貓和老鼠的關係。在貓不想逮老鼠時，老鼠可以出來跳上幾跳，甚至爬到貓背上，捋捋貓的鬍鬚，但一旦貓發怒了，老鼠就會非常警覺地找好逃脫的路綫，以縮到自己的窩裡去。

當然，我的這個比喻也許不甚恰當，但有一點却是人所共睹的事實，那就是在「自由派」中，哪怕是衝在最前面的勇士，都對中共——這個龐然大物——有着一種無可奈何的、悲觀的和畏怯的情緒。

方勵之的敢言是令人欽佩的，但是，當人們問到他民主何日能在中國大陸實現時，他的回答却甚為茫然。他說，民主的實現要等到中國大陸的「中產階級」的興起，也就是說，要二代或者三代人的努力。

又如白樺，他對中國大陸民主的進程更是持悲觀態度，他認為中國大陸實現民主的路「又遠又長」，「很難有反對的力量出現」，「因為中共有槍桿子，它一起來就會遭到鎮壓」。

再如劉賓雁，他坦認近三、五年中國大陸可能會呈現亂局，但他認為改變中國大陸的專制政體，只能寄希望於中共的自身，也就是說

，讓這些「自由派」由小到大的逐漸爭取權力，以致最後取得決策權。

「孫子兵法」上說：「不戰而屈人之兵」，這些悲觀的論調，首先在士氣上，「自由派」就自認為輸了中共一籌，他們在發表他們的見解時，從他們的立足點來看，並不指望改變什麼或爭取什麼，而只是想表達一下自己「良心未泯」，「說幾句真話」，在這種前提下，他們的勇氣自然是要打折扣的。

當然，除此之外，我們也應當看到「自由派」的另一弱點，即他們一方面是中共政權的抨擊者，但另一方面，他們又是中共新當權者的不同程度的受益人，「自由派」裡確實不乏真正的「為民請願」的耿介之士，但就整個層面來說，素質還是有待於昇華錘煉。我前面已經說過，「自由派」是一個複雜的矛盾體，它在民間和官方都可以找到接合點，這就造成了很多「自由派」人士的道德上的弱點。我們不妨從下列幾種狀況加以說明：

(一)他們之中的某些人具有投機的因素。無可否認，他們的「敢言」是一種正義的行為，這是基於他們對中共專制政體的深切的認識。但另一方面，當他們認為中共是無可改變的時候，他們之中的某些人就放棄了對改變的努力，而企圖在「自由派」的幌子下謀取個人的好處。事實上正是如此，這些人很會利用社會對中共的「逆反心理」，以抬高自身的知名度，而當他們取得了某種「頭銜」的時候，在他們的天平上，往往把更重的法碼放在官方而不是放在祖國和人民的前途上；

(二)他們之中的某些人具有嚴重的動搖性。當環境氣氛「輕鬆」時，也就是說，貓不想抓老鼠時，他們可以慷慨激昂，針砭時事，大發議論，可是，一旦氣候變化，他們就不擊而敗

，不戰而逃，這個時候，他們所考慮的，是怎樣使自己這條魚從網眼裡溜出去，至於其它被網住的魚，則是難以顧及的。

(三)他們之中甚至有一些品德惡劣者，在大難臨頭的時候，不僅舉起降旗，而且還助紂為虐，落井下石，反口去咬別人。這就使「自由派」中的人，一些中箭落馬，一些逃之夭夭，一些反而成了「反右」先鋒，但等到風頭一過，他們又恢復到「自由派」的舊貌，對他們的變節行為，毫無道德上的檢討。久而久之，也就變成了一種習以為常的事，好像他們這樣做是因為「形勢所迫，身不由己」，自然也就沒有什麼良心上的責備和愧疚。

對「自由派」的這些弱點，白樺有一段話，值得讓我們深思。他說：

「劉賓雁先生把今天中國知識份子普遍的情形下，許多知識份子都很堅強，形勢愈嚴重，他們愈可憐，甚至還會出現幾個卑劣的人，毛澤東對中國知識份子這一弱點看得很清楚，每一次迫害知識份子都要摸底排隊，要物色狗咬狗的狗。」

事實上，現在的中國大陸「自由派」的知識份子，至今仍未超越這些弱點，如前段時間，在「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期間，動搖的、投降的、表忠貞的、叛賣的，仍然大有人在。

在這裡，我並不是有意貶低「自由派」的形象，而是我覺得，必需嚴正地指出「自由派」的弱點。就本質上來說，「自由派」不僅是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的精英，而且也是推動中國大陸由專制政體向民主政體轉化的核心力量，如果他們自身沒有一種深刻的反省，沒有一種素質的提高，他們就不可能擔當歷史賦予他們的

的重任。

只有在聯合中才能取得質變

其實，一個政體的興衰存亡，都無法逃脫一個簡單的規律，如果所有的人民都說：是！那麼，這個政體肯定是牢不可破的；反之，如果所有的人民都說：不！那麼，這個政體不管如何龐大，也非垮台不可。

但這個「不」不能先先後後、七零八落地喊，而要同時地喊，因為先先後後地喊，作爲喊的人，永遠是少數，少數就是弱者，一個政權，它就有力量把你壓制下去。但如果同時喊，政權就會束手無策，它要麼按人民的意願進行改革，加以轉變，要麼下台，而這兩種出路，都可以促使中國大陸由專制政體向民主政體的轉化。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出聯合的力量。

而中國大陸的「自由派」知識份子，所缺少的恰恰是這種聯合。

也正是因爲沒有這種聯合，使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在專制的迫害下，付出了極其昂貴的血的代價。

現在，有不少「自由派」人士，對他們目前這種先找好「掩體」，然後再做伸縮自如的散兵游勇式的出擊自以爲得計，但是，殊不知他們並沒有找到自身的保險系數，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中箭落馬」就是證明，當時的情景，完全不是出於「自由派」的壓力，而僅僅只是由於中共的決策人不想再下去，才收住了「反資」的風。否則，「中箭落馬」的絕不止於他三人，而是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的很大一批知識份子。這就給了我們一個啓示，只要中共權力發生錯位，對「自由派」來說，就可

能會帶來一場災難，這固然主要原因是在於中共方面，但「自由派」知識份子自身顯示不出力量，則也是不容否定的原因之一。

從歷史上看，中國大陸知識份子失去了許多可以「聯合」的機會。譬如建國初期，如果當時的知識份子能形成力量，就會對體制的建立施加影響。又如反右，如果不是那麼輕而易舉地讓毛澤東分化瓦解、各個擊破，事情也許要好一些。再如「民主牆」時期，如果「自由派」能形成對激進的民主主義者的聯合，也許現在情形就會是另外一種樣子。

假如說，在過去，我們的知識份子沒有一種聯合的行動還情有可原的話，那麼，現在再不採取聯合就毫無道理了。這是因爲，在「毛澤東時代」，由於強權的結果，很難讓知識份子逾越障礙，而「民主牆」時期，「自由派」才剛剛「平反」，隊伍尙顯得七零八落，思想的準備也不夠。可是今天却不同了，首先是中共通過四十年的執政，已經大失民心，他現在的存在，完全是靠着「一種」餘威」在嚇唬人民，另外，再加上「改革」越改越糟，民意「求變」的情緒很濃，在這種情勢下，逼使中共不得不作若干「寬鬆」的讓步，其專制的效率已遠遠不如「毛澤東時代」。另一方面，作爲「自由派」的知識份子，現在已經形成了一個很大的層面，中共可以收拾一個、兩個「自由派」人士，但如果所有的「自由派」人士都說：不！他就無能爲力了，在無能爲力之後，他除了自我轉變，就沒有維持的辦法，那時請大家想一想，將會出現一個多麼嶄新的局面，「自由派」不僅因此加強了自身的安全系數，更重要的，則是把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推向了一個質變的階段。

當然，所謂的「聯合」，決不是一種不計

後果的莽撞，它仍然需要「掩體」，不過這種「掩體」是一種「聯合」的形式，形成了一條可以容納下整個「自由派」的「戰壕」，這種辦法如果處理的恰到火候，作爲「自由派」，他們並不需要冒很大的風險，做什麼了不起的犧牲，同樣也是他們目前的力量可以辦得到的。

譬如說，由所有的「自由派」著名人士「聯合」署名，成立第一家民營的出版物。這是完全可能的事，即便會受到壓力，壓力也不會太大，因爲「出版自由」是天經地義地寫在「憲法」上的，「憲法」就是一個很好的「掩體」，由於是「聯合」的，官方拿着那些「名人」，他也不敢怎麼辦，即使冒天下之大不韙，真敢下手了，那麼中共對其自身形象的損害、國際信譽，乃至民意的負面影響，只會比受懲罰的「自由派」更嚴重。一旦有了第一家民營出版物，中國大陸就衝開了「言論自由」的缺口，以後的情形就必將大爲改觀。

再如，我們並不要求「自由派」都去作第一線的勇士。民主既然是一股歷史的必然潮流，那麼，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的人是會大有人在的。但是，「自由派」必需爲這些人作一個「大背景」，首先應該用他們的語言說明這些人或組織存在的合理性，在關鍵的時刻還要拍案而起，聲援他們，假如他們連做一個「大背景」的膽量都沒有，而是避而遠之，視民主鬥士爲洪水猛獸，那這種「自由派」還有什麼存在的價值呢？

總之，我認爲，「自由派」的聯合行動已勢在必行，若「自由派」永遠是這麼畏縮縮，則永遠不可能把中國帶到民主化的道路上去，那麼，民主——則只是一個玩在「自由派」知識份子嘴上的時髦的名詞而已！

從革命團體向民主團體的戰略過渡

丁 楚

儘管中國民聯從前一再宣稱自己是民主團體，並不贊成使用暴力。但是不可否認，它的運作方式還是不可避免地帶有革命團體的痕跡。

民聯過去幹的一些事情常常給人以「搗共產黨亂」的印象，而且常常幹一些讓共產黨丟十分而自己丟五分的小動作。很多民聯成員至今還認為，他們是在「和共產黨對着幹」，他們把共產黨當作真實的對手，一切活動都爲了削弱打擊對手的目的。

可是我認爲，以上戰略指導思想是極不明智的，也不符合民主團體的原則。

我們當然要和共產黨對着幹，但那不是真幹，而是演戲。一着一式並非真要殺死對方，而是表演給觀眾看的，其目的不純是爲打擊對手，而是要爭取民心，贏得群眾的支持和同情。和共產黨真打，那是最蠢不過的事情。因爲你不可能打得過它，用比誰丟分更少的辦法，首先耗乾的是你不是它，必要時我們甚至可以採取讓共產黨得五分而自己得十分的办法。由於大勢所趨，時間終是對我們有利的。這個戰略必需基於一個基本的考慮，就是我們要作爲反對派和共產黨長期共存，而不是打倒它。從

「權利重於是非」的基本民主概念出發，共產黨也應有它存在的權利，我們要打倒的是它壟斷權利的特權而不是它本身。

因此，在和共產黨的鬭爭中，沒有必要真正進入角色一心一意要與它作對，而是要根據觀眾的態度行事。民聯中有些人會說，共產黨不講理，你和它講理是對牛彈琴，不如採取革命手段。可是我認爲，即使對牛彈琴也是必要的，因爲事實上你是彈給旁觀者聽而不是彈給牛聽，只要越來越多的人欣賞琴聲而不是牛叫，我們的目的就達到了。

由於民主的潮流是大勢所趨，我們的這套戰略完全可以公開告訴共產黨人，如果它願意和我們「演戲」，那麼將是它得分，我們得分更多；如果它犯規動真的，那麼將是它失分我們得分，橫豎得民心、左右都得分，立於不敗之地。

如果你要搞的不是革命而是民主政治，核心問題就是爭取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你有了民心，共產黨還用你打倒嗎？

有些人會說，對付專制主義，我們只能採用革命團體的策略，這些策略雖不一定非要有暴力色彩，但至少得具有嚴格保密和縱向指揮

的特點。而民主團體中公開化、程序化的特點往往會被認爲是缺乏效率，以致不足以對付強大的專制對手。

我們民聯中有些人常常把我們今天的活動比作當年孫中山在海外搞的活動，可只要你仔細研究一下歷史就會發現，孫中山的成功實在並不在於他的團體的革命性而恰恰取決於其民主性。難道那樣一個龐大的清王朝是孫中山那幾次微不足道的起義推翻的嗎？不要說他那十一次必敗的起義，就是再搞一百一十次也未必會成功。革命黨人的起義所起到的作用只有一個，就是在人民心中樹起了他們前赴後繼，英勇奮鬥的正義形象。清王朝實際上最終是被自己的軍隊所顛覆，而正因爲孫中山的革命黨人在人民心中樹起的正面形象，他們才被「迎回」來執政。這歷史的一幕難道不能給我們一點啓示嗎？

有人說：「保不成密辦不成大事。」何爲大事？民聯至今爲止所幹的最大的事無非是拔共產黨一根毛。其實有些小動作成不成都罷了，無關大局，有些事則是成也罷敗也罷橫豎得勝了。縱觀歷史你將會發現，每一場小仗都打勝了並不一定保證決戰會勝，而每一場小仗都

打輸了有可能決戰會贏，劉邦和項羽打了七十餘場，仗仗都輸，可就是最後一場垓下決戰贏了，奠定了漢立楚亡的大局。美國的南北戰爭中，北軍幾乎是仗仗都輸，可就是最後幾個關鍵的戰役勝了，這才完成了統一大業。

作爲一個民主團體，我們可能在和共產黨的鬪法中仗仗都輸，但最後的決戰未必會輸，若作爲一個革命團體，民聯也許和共產黨鬪爭仗仗都贏，然而也有可能最後的決戰中一敗塗地。這個最後的決戰就是當我們和共產黨人

歷史將會爲 勇敢的人做見證

蔡茅

共同面對選民的時候。儘管離那一天到來的時候還有很漫長的路要走，但我們今天所做的一切都要以那一天作爲着眼點，我們寧願輸掉全部今天的小戰役，也要爲那天的成功作好準備。

如果你是一個革命團體，那麼決定勝負的將是實力；而如果你是一個民主團體，那麼決定勝負的將是民心。你今天可以有千軍萬馬，可是一個醜聞可以令你傾刻間全軍覆沒，也許你今天步履艱辛，屢戰屢敗，可是只要你幹的

事得民心，說不定哪一天你可以一呼百應。

中國民聯若想擺脫其革命團體的陰影而成爲一個真正的民主團體，就應該放棄那種「爲了正當目的而可以不擇手段」的指導思想，放棄「專門與共產黨作對」的偏激心理，把注意力從面前的對手轉向身旁的觀衆。不必在乎我們每一次行動是否達到預定的目標，但是只要有了民心，最終我們會得天下。

在民聯總部建議凡願意公開自己身份的盟員可將姓名、職業、通訊地址寄往總部，以便在「中春」上分批公佈之後，我便毫不猶豫地做了這件事。毫不誇張地說，公開身份對於我，自從加入民聯那一天就不構成任何心理障礙。八七年在肯塔基入盟時，就有很多人知曉。後來因工作轉至摩根城，人一到，中國人圈子就傳開了，「物理系來了一個博士後，是中國之春」。今年十月搬遷到波士頓附近的布蘭代斯大學，在籌建民聯聯絡站、推動民運工作的過程中，公開我的身份，也是預料中的，且不可避免的。總之，我以爲，公開身份與否，不是個人願不願做、想不想做的問題，而是只要你爲民運、民聯做工作，身份必然會公開。至於在中春上正式宣佈自己的姓名、地址，大

約僅僅是一個形式了。

爲什麼很多盟員遲遲地不願意公開自己的身份呢？除了一部份盟員要在中國境內開展工作，以隱秘的身份更爲方便，大部分在美國及其他國家的盟員不願公開身份，多多少少還是有害怕的心理，對自己的政治主張及活動不肯定，細細說來可有如下二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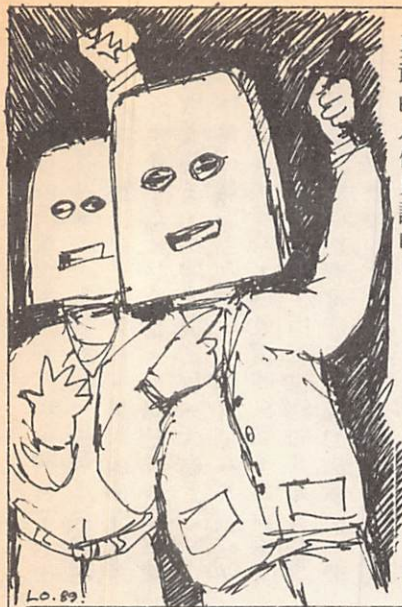
第一，怕被周圍的同學知道了，傳揚出去，就等於大使館知道了，共產黨知道了。將來一旦落入共產黨手心裡，那還了得，輕者一輩子受歧視，重者就進去了。無怪乎一些盟員有怕的心理，幾十年共產黨一黨專政，不許人民有絲毫的自由，除共產黨而外的政治團體的成立，統統被扣上反革命集團，成立或參加這些團體的人也被扣上反革命份子的罪名。但是共

產黨專制獨裁統治了四十年之後的今天，人民大眾再也不願做牛羊，任暴政者隨意宰割了，他們冒着坐牢、殺頭的風險上街遊行、罷工、罷課，以爭取做人的最基本的權利。身在大陸的人民大眾尚且如此勇敢無畏，難道我們現在留學在自由國度的，共產黨手段再兇狠，也不會公然無視美國法律抓捕民運人士，對於僅僅公開身份都會怕嗎？

第二，雖然我們是接受了西方民主教育，個個有碩士、博士頭銜的人，但由於我們前二十幾年生長在中國那樣一個在共產黨專制下的沒有人性、沒有人權、沒有個人的政治信仰的權利，沒有人身自由的牢籠裡，即使我們在美國呆了幾年，似乎依然不能使我們扭轉意識，接受我們應該做自由人，我們有選擇自己的政治信仰的權利，我們有爲自己的政治信仰而工作、而努力的權利的事實。而這恰恰是每一個生長在民主、法治的國家裡的人認爲是天經地義的。如果我們認識到加入民聯是自己的政治理想，爲民主事業而工作是自己的正當權利，是任何人、任何政黨所無權干涉的話，公開自己的身份，全力以赴地爲民主事業工作，就不

會有怕的想法了。

我以為盟員能夠公開身份地開展工作，對於向世界、向中共、向廣大的中國人民大衆宣佈我們這個真正爲中國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而努力的組織的存在，並且一天天地發展壯大是極爲有利的。一個政治團體不能在自己的國家裡生存、成長，已經是十分令人遺憾的事情了，盟員們隱名埋姓，互不知曉，不通往來，豈不更加令人可悲嗎？記得在第一期盟員通訊上看到一篇文章，題爲「民聯在多眠嗎？」大意是民聯不活躍，沒做什麼工作，沒造什麼聲勢。經費問題使民聯的很多活動受制是一個事實，但很多時候是因爲盟員身份不公開，一件需要幾個人合作的工作就沒有辦法完成，很多工作由此而不能開展。公開自己的身份，本身就是對自己的政治主張的選擇的一個肯定，衆多的盟員公開身份，就是對我們中國民聯這個組織的肯定。幾個、幾十個盟員公開身份會孤單、會怕，如果幾百個、幾千個，將來組織發展擴大了，幾萬個盟員都公開了身份，我們還會怕嗎？但是現在我們必須從自我做起，爲了中國的民主、法治的實現，我們必須從公開身份上做一點小小的犧牲，我深信歷史將會爲勇敢的人做見證的。



竊書之辯

佟雪

問：你對竊書有何看法？

答：我同情竊書者。總的說來，竊書的人都是有知識的人，有知識的人做出偷竊行爲，肯定有其迫不得已的一面。竊書者，未必爲竊取錢包、首飾或商品，因爲他們會認爲那些是骯髒卑鄙的事，而竊書是爲了高尚的目的。

問：案書者會有些迫不得已的地方呢？

答：竊書者一般都有兩種原因，一種是書太貴，他買不起。在我們國家，知識分子的待遇同一般勞動者差不多，甚至不如，但他們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必須花錢買書。然而，一本書往往要花去他們一天至一個星期的收入，他們無法支付。大學生更是如此，沒有收入，社會也極少給予大學生靠勞動掙錢的機會，目前一般家庭負擔一個大學生都很吃力，因此大學生更容易發生竊書的行爲。另一種原因是急需的書買不到，圖書館又常借不到，閱覽室去晚了也會搶不到那本書，因此一旦到手，會產生撕書頁等行爲。

我認爲，這兩種行爲的發生，固然竊書者有錯，但是社會對知識份子不合理的待遇，對大學生生活學習的窮困與艱難，都沒有給予重視和關心。社會本身是產生這種行爲的環境，沒有一個追求知識的人，會因爲利欲而去竊書而給自身的心靈與人身的清白摸黑。

問：爲什麼不使用復印機復印需要的部分呢？

答：國內大部分圖書館還沒有復印設備，即使有，一般復印一頁書，要大約五角錢。優惠價至少也要二角五分錢。低收入的國家，加

上窮知識份子與窮學生的社會，除了公家出錢以外，很難負擔這種復印費用。另外，有不少所謂的參考書，都打有「內部使用」字樣，不準復印。

問：經濟問題是竊書唯一的原因嗎？

答：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有一位在北京圖書館竊書被逮住的青年說：「我是中專畢業分配到單位裡來的，我每月只能報銷四元的書錢，也就是大約每月可買兩本書。而科長每月可報銷五十元，處長沒有限制。他們除報銷那些並非很有用的書外，還自稱補習文化，給子女購買課外習題集等補充讀物，也拿單位報銷。我認爲很不公平，心中很不服氣，他們有特權花公家的錢買自己的書，給子女買書，我一樣需要書，而且具體工作還是我幹得多，我只能自己拿了。」

可見，社會上不合理的特權制度，同樣是使有些人蒙生竊書，並且自圓心理不平衡的一種理由。

問：怎樣才能解決竊書之風？

答：竊書之風是社會普遍重視知識後才興起的，解決此問題，只有解決上述的幾項原因。當然，加強防範也是一種辦法，可那是「築坎」的辦法，只會加強壓力與矛盾，現在多採取這種辦法，是解決不了根本的。唯有「開渠」之法，才能「疏洪」。所以關鍵要真正重視圖書館的建設，擴大藏書量，提高知識份子待遇，給大學生更多的關心，給予掙錢的機會，控制書價的漲幅，消除特權的副作用等等。一種社會風氣的好壞，不能只看人的行爲，它往往表現出社會制度的某些方面的不適應，不合理或乃至腐敗。

當然，爲竊書者說幾句公道話，並非鼓勵竊書行爲，而希望看清本質問題，努力針對本質問題，才是積極的。

南京大學民主牆的興衰

王傑夫



這樣的民主牆你是否很熟悉？

我的母校南京大學，是由以前國民政府中央大學和金陵大學等學校合併組成的一所綜合性大學。位於虎踞龍蟠之地南京，南大歷來是中國民主運動的搖籃之一。遠的不說，震驚中外的「四·五」運動就是從南大開始的。一九七九年春，在那道民主的春光中，南大也有過一堵民主牆。

南大民主牆起源於一九七九年春發生在南大校園的一起小學潮——翁寒松事件。當時，哲學系的一位學生翁寒松，在與女朋友約會時，跟女方家長發生衝突，動手打了他未來的老丈人。事情被告到校方，如果校方按照慣常的處理程序，給翁某一個處分，也就罷了。偏偏當時校黨委書記章德缺了點民主思想，也不和系學生會打個招呼，就徑直對翁某作了嚴重警告處分。哲學系學生們的反應是：把大字報貼到了校門口，指責校方無視學生們的權利，要求一個公正的程序。

在隨後的兩天內，各系群起響應。大字報鋪天蓋地，掛滿了校園。主要的內容是：指責校方不夠民主；要求校方給予公正的處理程序

；要捍衛被處分者申辯的權利；要校方提供給學生表達意見的園地；要求校方收回這次處分、和學生代表商量後再說；當然翁某和他的女朋友也表達了自己的意見。我們七八年新入校的學生開始只是對這一切感到新奇和不可思議，後來也向老大哥們學習，貼出了聲援的大字報。有激進一些的學生甚至公開號召罷課抗議。同時，大家也意識到翁某的行爲也不是那麼足以令人稱道，所以多數大字報主要是將矛頭指向校方的蠻橫和專斷。

當然，校方也沒閒着。他們一面出去搜羅不利於翁某的證詞，一面也在學生中做一些說服工作，再者也許諾給學生開關一個園地來發表意見。校黨委自然也要求在學生中的黨員們「起好帶頭作用」，但聽他們話的人實在是不多。終於，在第四天早上，校方公佈了所有的證詞，其中包括讓一個不滿十歲的小女孩在廣播上指責翁某揮拳擊打「老爺爺」，同時，校方也放了兩句軟話。就這樣，這次小學潮就被平息掉了。不過，校方遵守諾言，給學生們起了一個大字報欄。學生們稱之爲「南大的民主牆」。

當時，社會上民主風氣盛行。西單民主牆、「北京之春」等鬧得不可開交，民刊更是到處流傳。在南京大學我所認識的同學中，沒有人沒翻看過「這一代」等宣揚民主政治、討伐獨裁專制的「禁刊」的。可以說，民主自由的思想已在年輕學子的頭腦中萌芽了。當時，七六級的工農兵大學生們還未離校，七七級一大批社會精英又進了校園，所以內中實不乏理論家和思想家。在這樣的背景下，南大的民主牆可謂是盛極一時了。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時不時都會有幾篇有趣的文章「見牆」。開始只不過是討論剛過

去的那次小學潮，後來又引伸到了對於民主和法制的論證。文章的矛頭並不尖銳，隱晦很多。而且不幸的是，筆者並未發現有一篇類似於胡平「論言論自由」那樣高質量的文章。而理科的學生們則在想着別的事情：記得當時最轟動的是物理系的一位教師寫了一篇文章，用他自己的假設推翻了愛因斯坦的光速不變說，證明超光速是存在的。不過後來不見再有討論，這是因為有人證明了這位教師自己的那個假設前提也是非物理的。後來，在中越戰爭期間，傳來了魏京生被捕的消息，在學生中引起了一陣不安。傳聞有人晚間在民主牆上貼出了抗議的大字報，可是不到天亮便不翼而飛了。那是一個迷蕩不安的年代，「愛國主義」和民權自由在人們心中不斷衝突，最後官方終於利用國民的「愛國熱情」對民運大動手腳，將以前支持過他們的民運人士出賣了。

中越戰爭之後，雖然不時也會有一、兩篇文章出現，但民主牆上的主要內容變成了一些學生活動的布告和尋物啟事。除了社會上民運處於低潮這個原因外，主要的原因還是七七級學生已進入了功課繁重的二年級階段，而工農兵大學生們正為他們畢業後的前程問題大傷腦筋。每個人都認為自己的事比民運重要，還有誰肯費心為自由民主這樣的抽象概念去爭執不休呢？

筆者認為，民主牆是生不逢時。那個年代是中國剛剛經歷大亂，人民需要靜下來喘口氣，休養生息的年代。被歷次動亂搞怕了的民衆對任何理想和主義產生厭惡情緒。人們一聽到政治就頭痛。加之訊息不通，事實常被中共加以歪曲。戈培爾說過：「謊言重復一千遍就成了真理」。這話用在當時中共的宣傳系統上是再合適也不過了。在沒有民衆普遍支持的情況

下，民主牆這樣和平形式的民主運動的基礎是十分薄弱的。所以民主牆的衰亡也是不可避免的。我相信，如果今天在中國大陸上開始出現民主牆，它就不會這麼輕易就被拆掉的。

後來，鄧小平在所謂的「人民代表大會」上取消了「四大」自由。民主牆在它被拆掉的前夕也出現了兩篇文章抗議官方奪去了人民僅有的表達自己意見的園地，並且抱怨中共不給人民以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可是，大家功課正忙，也沒有人太去注意這兩篇「悼詞」。於是民主牆便壽終正寢了。

在南大民主牆誕生十週年的前夕，作為經歷者之一的我，寫下這篇回憶，是爲了紀念十年前我一生中的第一堂民主課。正是南大的學

車馬雜記

一位辭職幹個體戶的工程師，發明了一種榨菓汁機。在一次簽定會上，他將一隻橘子放在榨菓汁機中一壓，橘子頓時成了乾絮。這時，只見一位中年幹部走上前來，抓起乾絮在手中一捏，竟又擠出了半碗橘汁，工程師大爲驚嘆。

人們請教這位幹部是有氣功還是用魔術，那幹部爽快地答道：「什麼也沒有，只是在稅務局混了幾年而已。」

潮和民主牆，使我第一次認識到：我們是人，要有一些基本的人權。不管是誰，只要他侵犯了我的基本權利，那我就要不惜犧牲一切而奮起抗爭。我們不但要保護自己的權利，也要保護他人的權利。因爲不保護他人，就無法保護自己，這也是我今天支持民運的原因之一。聽說在八六年底的學運當中，南大的學生也上街遊行了。我很高興我們的學弟學妹們能繼承南大的民主傳統，但同時也暗暗擔心：似乎每次學運的開頭都是那麼轟轟烈烈，可最終總是草草收場。不論如何，我相信民主的火炬總會一代一代的傳下去，直到獨裁政府的消亡那天爲止。

教授：作爲消費者，你最好生活在西方，那裡顧客是皇上；作爲生產者，你最好生活在東方，那裡幹不幹都一樣……

學生：可是人都有兩重性，我們既是消費者又是生產者，那麼我們該怎麼辦？

某海外左派作家到北京大學去講演，她以教訓人的口氣說：「你們別以爲美國可以隨便罵總統就是自由，其實那裡一點也不自由，那裡是有錢人專政。」一個北大學生遞了張條子給她，寫道：「你在這裡罵了雷根還可以大搖大擺地回國去，這點自由就足夠我們羨慕的了。」



森林大火.. 誰之罪？

熊能

森林火災，燒毀了幾十萬公頃森林、吞噬了一百九十條人命、無以計數的工廠、商店、學校、民宅焚為灰燼——五萬災民無家可歸！
誰之罪？

營林大隊長和他的委屈

李義委屈極了。這位漢河古蓮林場營林大隊長想不通：誰放火誰頂罪，要說領導責任，從上到下都有份，憑啥判我蹲五年？

營林大隊長當然沒放火。跑漏火種的是他雇用的盲流汪玉峰。還記得這個河北山溝來的小伙嗎？五月六日下午就是他違反操作規程，在起動割灌機時燒着了火，一夜間燒掉三個林業局，直接經濟損失九億元。（汪以失火罪被判六年半，他稀裡糊塗跟着一起也喊冤。）用李義的話來說：「汪玉峰的一拽（起動），把我拽進了監獄。」

好在李大隊長還沒忘記，去年四月縣政府下文明確規定：為防山火，禁止林場私招盲流工。那天場勞資股長還當面問他隊裡有沒有盲流，李挺胸回答：「沒有！」其實就在昨天，李大隊長手下一名盲流因割灌機操作不當引着山火，由於撲救及時而化險為夷。於是李乾脆來個隱瞞不報，只是拍拍那個盲流的肩膀說：「送你一件衣服，以後有事儘管找我！」又過了一個星期，盲流汪玉峰來了。「收！」政府禁令算個屁，大隊長說不二。汪玉峰上山的第十三天，由於完全相同的原因，他手裡的割灌機走火了。一顆火星，燒焦了中國版圖一角……

李大隊長心頭堵得慌。從哪個結冒出個「玩忽職守」的罪名來？我營林大隊在你領導眼皮底下招用了九個盲流，難道上級真的不知道

一九八八年九月九日上午，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對大興安嶺「五·六」火災十一名被告進行終審宣判。以玩忽職守和失火罪被起訴的所有被告人對一審判決不服，強硬地向省高院提交了無罪上訴。終審宣佈除一人改為緩刑外，其餘十人維持一審原判。

於是罪犯莊學義（原圖強林業局局長）把頭一揚，大聲回告法庭：「枉法審判，不予簽字！」名噪一時的原漠河縣消防科副科長秦寶山更是桀傲不馴：「千古奇冤！救人救火為啥

蹲牢房！」就連改判緩刑當庭釋放的原漠河縣委副書記李永慶對判決書竟也不屑一顧，頭也不回地離開法庭揚長而去……

十名罪犯拒絕在判決書上簽字。

更令人困惑的是：在一審法庭上有人為被告的辯護鼓掌喝彩；有人到公安局申請遊行，要為被捕的幹部請願示威；居然還有領導部門提出，要為罪犯請功授獎！

人們不會忘記，也不應忘記大興安嶺特大

？山上長期雇用盲流，領導啥時動過真傢伙？問問大興安嶺，哪個林場不用盲流工？要說「玩忽職守」，是領導都有份，要撤職統統撤職，要坐牢統統坐牢；至今未摘「法盲」帽子的李大隊長慷慨陳詞作了無罪辯護交了無罪上訴。終審維持原判：有期徒刑五年。

「冤啊！」他巴不得老天六月下場寶娥雪。

只戴了一天的烏紗帽

事情開頭就帶點戲劇色彩。一九八七年五月六日上午，沒有人覺得今天有什麼特別，可對三十八歲的李永慶來說，這天可不平常。上午漠河縣委書記王招英鄭重宣佈，組織部長李永慶昇任縣委副書記，主管黨群和防火。常委會正在開，河灣林場起火了，火燒不動安如山，會議繼續進行。開着開着不對勁，古蓮林場也起火了，火勢還挺猛，好在會議也結束了。李永慶新官上任就遇火。當他受命指揮古蓮火場北火區後，便急匆匆赴湯蹈火去了。經過軍民一夜奮勇撲救，第二天上午八時火勢基本被控，明火滅了，餘煙島島。李永慶麾下四三九個撲火隊員癱倒在三八九〇米長的火區沿綫。大功告成，馬放南山。九時，副總指揮來到火場，皺着眉頭向李永慶下達立即清理火場的手令。多此一舉？也許李永慶體恤下情，也許李永慶精疲力竭，總之李永慶按兵不動。隨後他鑽入指揮車，頭一歪便飄進了溫柔鄉。四十分鐘後醒來，眼前一切依舊，他長長地噓了一口氣。可是李永慶萬萬沒有想到，一個個竟成千古恨！

假如李永慶不打這個盹，假如下午沒有那場古怪的風，假如令到行隨，忠於職守，那麼李永慶決不會丟了才戴一天的烏紗帽，更不會

今天站在被告席上聽審判，然而……然而死灰復燃了。中午，三處殘火外竄，下午，起大風。

誰能料到會起這麼大的風？可為什麼不預料會起這麼大的風？

終審判決：維持一審認定李永慶玩忽職守罪，駁回上訴。但根據案情及李永慶較好的認罪態度，改三年實刑為緩刑。

李永慶斷然拒絕在判決書上簽字。他以如此這般「較好認罪態度」，拂袖而去。

莫非他覺得個人的損失更慘重？烏紗帽畢竟才戴了一天呀！

秦寶山和他的傳奇

秦寶山就有點傳奇色彩了。

這位原漠河縣防火科副科長在去年大火時成了衆矢之的，罵他見死不救，動用消防車保住了自家那幢紅房子……群情震怒，那聲勢已到了「不殺不足平民憤」的階段。可時過境遷，今年的「輿論」好像有變化，有人公開爲他喊冤，有報紙載文爲他擺好，他的上級和上級的上級爲他請功邀獎。秦寶山被捕收監一年多，但他的黨籍依然在冊，你說奇不奇？

記者在監獄裡見到了秦寶山。他搬來一大疊各種版本的「消防工作條例」，極熟練地翻開一頁又一頁。「判我玩忽職守罪，到底憑哪條？」他說，按條例縣城遭到這樣大的火，首先要救人。他把消防車定點在他家周圍，不是爲保家，而是爲保災民疏散路通暢。

果真如此？檢察院調查結果是：秦寶山在大火危及漠河縣油庫、糧庫、物資庫、商品庫時，沒有採取應有的措施和部署，使國家財產遭受重大損失。他從「四庫」返回縣城後，決

定將三台消防車定位於他家附近道路上，這時此處十五棟家屬房只有五棟着火，居民懇求秦寶山撲救，但秦以停電、沒水爲借口拒絕，而讓其中一台消防車向自己家的柴堆和板牆上澆水。後又找來推土機將他家住宅周圍的易燃物（包括未着住房）推掉，形成隔離帶……

救人與保家的「巧合」？

事實是：縣物資庫被燒，經濟損失一百九十萬；

事實是：不該着的房子燒了，沒着的房子推了，他家的住房保住了；

事實是：在那天漠河城最危急的上半夜，經濟防火副總指揮秦寶山始終沒有遠離他家的房山頭。

他的家人曾向記者出示過厚厚一疊秦寶山歷年獲得的獎狀和榮譽證書，他有着光榮的過去。然而直如此嚴酷的生死考驗，對漠河人或對秦寶山來說，都是頭一次。

終審維持原判：被告秦寶山以玩忽職守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

看來秦寶山一案不會隨着終審而終結。

不止一個人說：「撤了職還不夠嗎？爲什麼非要他坐牢？」據可靠消息：秦寶山不久將獲得「保外就醫」。

事實是：他家門口一棟嶄新的秦記旅社正等着他回家就開張。

莊局長和他的十五分鐘

被告席上最引人注意的人物無疑是原圖強林業局局長莊學義。

當漠河的大火朝圖強奔襲而來之時，局長莊學義迎着火龍趕到育英林場。他來的很及時也很勇敢，此刻大火剛燒到林場邊緣。莊學義

當即命令育英防火總指揮會凡金通知群眾疏散，又兩次用電話向局黨委書記通報育英火情並對圖強鎮搶險疏散提出措施。當他放下電話的時候，大火已在場區迅速蔓延，驚恐萬狀的群眾在火光和濃煙中哭天搶地左奔右突——生路在哪裡？領導在哪裡？

在那裡？局長莊學義鑽進了那輛美麗的「伏爾加」跑了。

那個林場防火總指揮會凡金呢？他騎上了那輛心愛的摩托車，充分發揮進口氣缸快速之優勢，飛也似地也跑了。

現代化的轎車與現代化的摩托車在半路相遇。局長莊學義非但沒有制止會凡金的逃跑行為，反而莫名其妙讓會去局裡彙報育英火情。

莊學義在育英呆了十五分鐘。十五分鐘後大火吞沒了林場。四十三個男人女人大人小人在火中葬生。林場直接經濟損失一千六百萬。

於是莊學義被以玩忽職守罪送上被告席。然而他仍舊像個局長那樣舉止從容，風度瀟灑。

他說他領導的圖強林業局四年無火災，這在大興安嶺有目共睹；他說圖強改革走在前列，七個經濟指標他占第一；他說那晚若不去育英而坐鎮局裡指揮，誰能說他玩忽職守？……

九十三個職工寫信上書省政府，為莊學義鳴冤；四十八名黨員聯名電致省委，為莊學義叫屈；數以百計的群眾要到公安局申請為莊學義遊行請願……

是憐憫是同情還是仗義？一場浩劫之後又是一出悲劇：他們自信瞭解和熟悉自己的局長，不過他們是否同樣自信地瞭解和熟悉神聖的法律？

莊學義在大興安嶺建設中功不可沒。可是

，一旦觸犯法律，功罪不能相抵。

法庭根據「刑法」第一八七條規定，判處莊學義有期徒刑三年。

莊學義不服，一副大義凜然的模樣，因為他並不感到孤立。所以在法庭上始終高昂着那顆不屈的頭。

三名被告和三副傲骨

最奇怪的是那位臨陣脫逃的育英防火總指揮會凡金，他也不服。

說是臨陣脫逃，不過逃得還算從容。他首先奔回家中，總指揮親自指揮親屬撤退。他將自己的母親、妻子、小姨子統統塞進林場生產指揮車，這是林場唯一的一台小車，小車的司機就是總指揮的親弟弟。於是指揮完畢，會凡金跨上了摩托，脫兔般地落荒而逃。法庭以玩忽職守罪判處會凡金有期徒刑三年。

而我們的「總指揮」振振有詞地站在被告席上為自己作無罪辯護：我不過是個科級幹部，林場有四個科級單位，叫我當總指揮能指揮得了嗎？

也許，會凡金壓根兒就沒想過，不能勝任的官可以不當，沒有人拿刀架在你脖子上非當不可。那麼既然當了，就要負責；當得不好，就要處罰。否則那烏紗帽光是讓你把要炫耀，真便宜死了。

被告席上還有一位臨陣脫逃者，同樣既不臉紅也不沮喪。

阿木爾林業局依林林場黨總支書記、行政負責人兼夜班防火總帶班包國榮，那晚他明知山上有火，却顯得異常的鎮定和沉着。吃完晚飯，先看了一會籃球，又翻了幾張報紙，然後用了一陣撲克，還是不過癮，於是離開值班室

回家搓麻將去了。一直搓到凌晨一點意猶未盡，一泡尿將他憋出房門。正要解手無意中發現大火正從四面撲來，便連忙跑到廣播室，緊急通知所有的人馬上到學校操場集合待命。待從廣播室出來，大火燒進了村落。他急眼了，慌忙截住一輛卡車，連同他的家人一起奪路而去。而此時驚恐萬狀的群眾正在學校操場「集合待命」——

聽天由命？三條人命喪身火海。

對此，這位林場一把手包國榮的回答是：搓麻將犯了哪條法？何況大火後是第一個返回場部，英勇地參加了撲火救災行列，不說有功還要判我三年牢？沒處說理去！

有人說，依西林場營林隊長張學友這次撞在槍口上，活該他倒霉。依西的火當時就被撲滅，與當天大火災無關，要在過去給他個警告處分頂了天。

又是割灌機走的火。身為營林隊長的張學友，明知職工郭某使用的割灌機有毛病可能引起火災，他不予制止，反而擅自決定讓郭某單獨頂崗作業（郭案另判），結果引起森林火災，造成直接經濟損失一百二十多萬元。

倘若沒有緊接着的「五·六」大火，這事很可能就稀裡馬虎過去了。但是過去畢竟成爲過去，血的代價換來血的教訓。過去不判：有法不依。現在要判：違法必究。

張學友懇求法庭放他條生路，最好判緩刑。他說自己上任不久，安全要求不太懂，不知者不怪；他說自己上有老下有少，妻子沒工作，孩子才三歲……

他的境況真讓人同情。但是法律無情。

張學友以玩忽職守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年。還能說什麼呢？他認爲自己還能做的就是

拒絕在判決書上簽字。這樣好像出了口氣。

法庭外的幽怨

大興安嶺這場火把被告們個個燒得怨氣衝天。

據說怨氣也不無來由：大火是從漠河引起的，漠河的縣長、縣委書記怎麼不判刑！

司法機關的解釋是：關於此起火案玩忽職守罪的認定，主要依據大火到來時有關領導的臨陣表現，同時追究肇事者的直接領導者。大火起於漠河，漠河縣主要領導人負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而且火場指揮也決非無懈可擊。

漠河縣委書記王招英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降兩級留用。縣長高保興開除黨籍並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

一年多過去了。他倆在幹什麼在想什麼？記者來到漠河採訪。

首先在王招英家門口碰了兩次壁。第三次總算開了門。記者坐在明晃晃的客廳，王招英坐在黑洞洞的裡屋。這位現任縣建委主任自始至終一語不發。是因為回首往事愧於啓齒？是因為記者曾對她惡意中傷？或是因為這場火燒掉了縣委書記的寶座、勾銷了十三大黨代會代表資格、葬送了她的錦綉前程？總之她板着臉，氣可不打一處來。最後她家人說：「對王招英的處分歷史將有公斷。」

既然事情被上昇到「歷史」的高度，我們只好拭目以待了。

「高縣長」的態度就誠懇多了，有問必答。聽說他在檢查時就很誠懇，涕淚交加，態度好極了。傳聞他丟了官後發了財，正忙着做生意。

意。記者到他家門口一看，果然氣象不凡，滿院子的啤酒瓶箱堆得比房頂還高！高保興笑盈盈地解釋，是家裡人做買賣，他不過幫幫手。（記者同他交談不到半小時，其間他接過兩次電話，談的都是生意上的事。）他告訴記者，憑他的老關係，很想幫縣裡聯繫木材生意，為重建家園出力。臨走時記者問他是否打算重新申請入黨？高保興沉吟片刻後回答：「不是重新入黨問題，而是應該恢復我的黨籍。」

是嗎？！
那麼讓高保興去耐心等待吧。

沒有人經過這裡

張真

沒有人經過這裡

我的牆是玫瑰色的

我每天把一束花放在缺口上

早晨是白的，傍晚是紫的

我等待着一隻不屬於任何臉的手

它會搶劫一空使夢不再延長

好多好多日子

我餓極了啃着牆頭的灰磚

我凍極了鑽進枯萎的花堆

好多好多日子

牆裡長起一片參天的青草

把我掩埋了

那天，太陽停下來

照耀着一個站在牆邊的男人

一雙金子般的手

光芒四射

永世不鏽

大興安嶺火案終審結束了。

當事人拒不認罪。

誰之罪？

罪在天？

十月二十五日，中央電視台播出一條新聞

：大興安嶺災區重建工程全部竣工，祝捷慶功

大會在漠河隆重舉行。

於是又想起那顆高聳於新城之上的不鏽鋼

球……

災難的教訓「永世不鏽」？

詩一首

毛毛，幫我畫一張像

白鳥

毛毛，幫我畫一張像

要兇狠一些

當年那隻老斑豹

不就是憑那吃人的眼睛

把我們唬住了

那個比老斑豹更歹毒的野獸

常常嚇得我們無處藏身

你畫上他腐臭的屍體倒吊在荒山

再畫一些木棒繩索和刺刀

我要脫光上衣，兇狠地毒打他

直至打斷木棒

再一塊塊割他的骯髒的肉

讓所有的惡棍看看

我比他們野蠻十倍

毛毛，這張像畫完了之後

你就把它撕掉



河殤兮！海殤？

——海南島盛衰紀實

楊天樹

藍色潮聲

當海南熱的大潮還在地平綫湧動的時候，海口市出現了一家「海南經濟報」。該報的宗旨是「集天下經濟思想之精華，唱走向海洋之高歌，領特區搞活開放之風騷，把報紙打到全國四百六十萬個廠長經理辦公桌上。」這家報紙的主編稱該報為「藍報」，他為藍色的文化大聲疾呼：我希望海南文化率先騰飛，這就形成自己獨特的文化——藍色文化，其特徵是具有很強的外張力和吸收先進文明的能力，不封閉，不壟斷，願共利於天下。

河殤產生的悲憤還在人們心底餘盪，而海洋文化的衝擊波已在這個古老的國家滾動了。海南島，成了藍色文化的象徵，成為希望的象徵，開放的象徵。在蔚藍色的召喚下，十餘萬知識青年渡過了瓊州海峽，為這塊未經文明開發的處女地帶來了第三次移民大潮。

自一九四九年以來，海南島經過了三次大規模的移民：第一次是一批解放戰爭和朝鮮戰爭的復員軍人留居海南轉為農墾；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第三次就是這次藍色的移民潮。如果說第一次和第二次移民潮是自上而下有組織的，甚至是強迫的，那麼這第三次移民潮純粹是自發的、狂熱的。

三次移民浪潮給中國南部這塊未開墾的處女地帶來了文明的衝擊。只有第一次移民在島上扎下了根，他們代表了比較先進的農業文明。第二次移民潮歷時十年，然後退得乾乾淨淨，除了給人們的記憶中留下無數篇小說的題材外，彷彿什麼也沒發生過。第三次浪潮更是表現了現代化的節律，從漲潮到落潮歷時僅一年，在中國地圖上留下了一個巨大的「之」字。一九八八年五月一日，一個二十四歲的青年在他橫渡瓊州海峽的壯舉中被陰冷兇虐的海浪吞沒了。他那旨在「激揚民族偉力」的冒險征服僅僅以一碗稀飯作為能量補充。在蔚藍色的呼喚下他把自己交給了大海，在沙灘上留下一座孤墳和一個壯志未酬的靈魂。

那些急於撲向海洋的大陸人，你們瞭解大海嗎？

漲潮篇

海口市海府路上「人才交流中心」的二層小樓是這場人才大潮漲落的見證。從一九八七年秋到一九八八年夏，它接待過四萬餘名從大陸來的求職者，收到的求職信將近十五萬封。在這段時間內，這座小樓會沸騰過，人聲噪雜，樓下留言板貼滿了求職和招人廣告，並夾雜



着五顏六色的失物招領、尋人啓事，以及「請保留十天」的便條，活像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紅衛兵司令部。

另一個人才大潮形成的漩渦是海口市街心的三角池地帶。海府、海秀、博愛三條主干道相交於此，當大批大陸知識青年爭相湧入時，這漩渦加倍湍急。人們在這聚集、碰撞、分流、交往，各種信息在這集散。

來自大陸各個角落的人背着簡單的行李，一出車站碼頭，到人才交流中心二樓填表之後，便匯集到這三角池來了。人們像早就熟悉了一樣，一通報姓名就漫天聊起來了。在這裡你可以聽到五光十色的來歷，五花八門的計劃，五彩繽紛的設想。流浪的學士、碩士們漫無目標地從這裡散去，穿過海口每條大街，打聽用人單位，四處碰壁。落夜後紛紛擠進低檔旅館、招待所。所有住宿地都人聲鼎沸，人們在院裡交換信息，在椅子上疾書家信，玩撲克，下象棋，在吉他的伴奏下，低聲地哼着一支熟悉的歌曲：不要問我從哪裡來，我的家鄉在遠方……

在那些剛剛踏上這塊陌生海島的冒險者眼裡，這裡生活頗為浪漫，大陸來的求職者大多是年輕人，到處瀰漫着青春的衝動，他們互相吹噓着如何瞞過父母，如何扔掉情侶的豪邁之舉，有的人甚至還未放下行裝就擠進了街頭的詩歌朗誦會和酒吧的演唱會。好奇心加冒險欲在這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生活中得到滿足。所有聚集在這裡的大陸人都異口同聲地詛咒部門所有的用人制度。海南島這地方儘管工作沒有保障，可是願上哪幹任你挑，兩廂情願，留下幹；兩廂不合，拍屁股走。長期受到禁錮的人渴望自由，海南島的氣氛令他們如願以償。這裡沒有省軍級、縣團級，什麼官階、資歷

，見鬼去吧！

在戰略規劃研究中心，你可以結識無數野心勃勃的「規劃家」，每個人的皮夾子裡都有打印的項目建議書。看着這些建議書，令人不禁想起了那個「一個雞蛋的家當」的寓言故事。

一個小伙子打算搞自行車環島自助遊。進五百輛自行車，從東、西、中三綫鋪開。沿途有接應點，路上有詳細標誌。在海邊設帳篷露營地，在苗寨設居住點，用步話機聯絡，可以集體活動。

另一位年輕人聲稱他的計劃是首創性的：弄條退役的驅逐艦，搞海上冒險家俱樂部，旅客住水兵艙，服務員水兵打扮。還有快艇巡遊，水鬼探險等游樂項目。

建跑馬場的呼聲是最大的，賭博不合法可以稱為有獎比賽，反正通融的辦法有的是。有人還建議以一些有名的商品招牌，如健力寶、生力啤酒等，命名跑馬，以達到最佳的廣告效果。

海南島這個文化的沙漠一夜之間變成綠洲。一個彈丸之地，竟有五十多家報刊，出版社要求登記，在省委宣傳部，辦報辦刊的申請表累成一堆。文聯招待所擠滿了從大陸逃出來的文人，其中有探路的、求職的、掛鈎的、為生計奔波的。沒有人認為海南是作家的樂土，但文人都願意到這裡闖蕩一番。

首當其衝受到人才大潮沖擊的要數旅館服務業。所有旅館、招待所人滿為患，一些居民把房子騰出來住客，讓價收費。旅館最擔心的是拖鞋的損耗驚人，那些不拘小節的大陸人常常「順便」就把旅店裡的拖鞋穿到大街上去。海口飯店的服務員發明了一種新的管理拖鞋的方式，他們把每雙拖鞋都配成單邊的，讓人穿

着極不舒服。此招具有奇效，立竿見影。從中頗能體現中國人的機智和幽默。

人在專制禁錮的制度下生活慣了，一到了開放環境中就顯得格外奔放、浪漫。那種要按自己意志選擇生活方式的願望，常常會以幼稚甚至滑稽的心態表現出來。所有的人都聽到過有關海南島各種各樣的傳說：自由港特自由，進口貨免稅；只要有錢，願開什麼公司都行；只要是人才，到那裡准埋沒不了……

人們滿懷希望為明天而來，然而，明天會為他們帶來什麼？

相持篇

人們浪漫色彩的求職生涯很快因經濟拮据而結束。於是，那些好高騖遠的大學生們終於不得不回到現實中來了，開始為衣食生計而奔忙。海南島有的是賺錢的門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於是鬧市的街邊出現了連片的小食店、游動攝影點、租書的攤子、賣藥的攤子、賣畫的攤子……

文化的雜交在飲食業表現得最為明顯，山西刀削麵、陝西擔擔麵、北京烤鴨、南京板鴨、潮州米粉、山東煎餅、上海小籠飽、重慶湯圓、新疆烤肉串……你只要順着一條街漫步走過去，就能吃遍天南海北。

一些攤販的主人一眼看去就不像正經八百的生意人，穿西裝戴眼鏡的店主一手拿着菜譜，一手掌勺，讓人見了十分幽默。那些自學成材的業主們乾脆砸了傳統的京味、川味、魯味等舊招牌，另起爐灶，把他們的產品命名為「博士水餃」、「秀才湯麵」、「狀元飽子」。還有兩位理工科的學者合開了一個經濟快餐廳，為了突出「經濟」和「快」的特點，門口的

大招牌號稱「一元一刻」。一元錢一份，一刻鐘吃完，這一推銷原則果然大見成效。

街邊，你還可以看到一些氣質優雅的女大學生臂彎裡搭着一疊新出的報紙叫賣。據說在內地上一個禮拜的課不如在這裡賣兩天報紙賺錢多。

一些古老智力行業也蓬勃起來，現出無限生機。「有獎娛樂」五花八門：一盤象棋殘局，誰攻下給十元，攻不下付二元。還有電動游戲，攤主是一個搞電子一個搞機械，兩人合作搞了個電子轉盤，指針處放着外國香煙、圓珠筆、香皂等獎品，五角錢按一下紅色按鍵，指針旋轉，停那就算那，指到那個獎品就歸顧客所有。一些女大學生的把戲更簡單：二十粒扣子，上面貼膠布，十粒寫十，十粒寫五，反過來隨便摸十個，總數和是一百或五十，可得獎十二元，若和為五十五、六十、九十，各有數額不等獎；六十五和九十五免交錢；七十五、七十、八十為抓空。五角錢抓一次，說不上這是數學還是命運的遊戲，總的來說總是莊家贏多，賭家贏少。

希望之火在冷卻，「明天」變得越來越模糊。大陸闖海者們在苦撐堅持着，期待着幸運之光的降臨。在這場持久戰中，女人們既發揮了她們的優勢，也暴露了她們的弱點。

白天在街頭賣報的女大學生，晚上你可以在咖啡館裡見到她們與顧客陪酒調笑。一些年輕美貌的姑娘被當作花瓶秘書招進一些大公司，進去之後才發現老闆圖謀不軌。在她們中間，有的適應了，隨波逐流；有的人反抗過，最後憤然出走。一個從西北來的姑娘在離開海南前說：只有兩種女人在這裡呆得住，一種是具有極強的自衛力並能控制住男人的女強人；另一種是放棄傳統價值對什麼都不在乎的現代派



海口街頭賣畫攤子

在「人才大三角」，你可以聽到許許多多這樣的故事，既有喜劇，也有悲劇。海南三亞市鹿回頭海濱，有四個女青年集體自殺。而自殺的原因各有傳說，有許多不同的版本，然而都和上面的故事有關。

海南島的宏圖僅僅是一個構想，所有的公司、企業都處於草創階段，社會沒有足夠的空間來容納大批湧入的人才。獲得這些空間需要時間。而等待這漫長時間的求職者又需要生存的空間。空間和時間的矛盾像一塊總也平衡不了的蹺蹊板，把社會的秩序給攪得不得安靜。渴求職業的人才盲流像一群無頭的野馬在海南島各城市湧來流去。政府機關滿了，公司滿了，工廠滿了，事業單位也滿了……活躍而

變得焦躁不安的年輕人像失序的分子撞來撞去，最後聚集在市中心的人才大三角，訴苦、洩怒、抱怨情緒在發酵、膨脹，以致最後在衝動的狀態下湧到政府機關去抗議。

政府一方面勸阻，一方面又重操計劃體制的舊招，通過有計劃引進和有組織安排就業的方式疏導危機。可是求職者對一個蘿蔔一個坑的組織安排極為反感，他們來此闖海的目的本身就是擺脫禁錮。

政府希望滯留海南的求職者北渡瓊州海峽，退回當地等候聘用通知，以減輕海南島的社會壓力。

而一些求職者橫下一條心，不混出個人樣無面見江東父老。加上某月某日封島的謠傳滿天飛，更增加了氣氛的焦灼和不安。

春來夏初，隨着氣溫的高昇，求職者和政府當局的緊張氣氛也在加溫。公安部門、工商部門和政府市容維持部門張開了大網，對求職者的「非法」經營攤販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圍剿。

熱鬧非凡的街道只要有人高喊一聲：「警察來了。」一些非法經營的攤販立即辟裡吧啦收拾東西準備逃跑。「呼嘯」的警車上跳下一群治安人員衝進街邊小食店，用水潑息爐火，接着就把店裡的鍋碗瓢盆、桌椅板凳案扔上車。有一次碰上一個年輕氣盛的大學生店主，立即揪住治安人員要求賠償。雙方吵起來：一方以法律為依據，強調政府已三令五申，屢教不改者理應取締；另一方以人情為依據，聲稱「政府總要讓人活，給口飯吃」。於是雙方爭執到大打出手，周圍圍觀者大多同情攤主，起哄趕走治安人員。這種小的磨擦不斷昇級，最後釀成五月二十二日三角池地帶求職者集體與治安人員的全面戰爭，以致引發省政府門口大規模

的靜坐抗議。

生存空間危機，退潮是不可避免的。

退潮篇

經過和治安人員的幾次拉劇戰之後，胳膊終究扭不過大腿，繁榮的街景已露出衰敗的跡象。逐漸冷落的街頭和慌亂的氣氛告訴人們，撤退的時刻來臨了。

小食攤開始變得稀稀拉拉，像大潮退去留在海灘上的貝殼。「店面轉讓，桌椅賤賣」的廣告比比皆是。殘留下來的主人也失去了往日吆喝的興致；缺少競爭的場面似乎令留下的人感到一種懷舊的淒涼。

壯志未酬的闖海者們，北渡瓊州海峽，陸續離開了這塊曾燃燒過他們心胸的土地，博士水餃、秀才湯圓等過渡生涯留下的僅僅是一絲浪漫的回憶。人們遺憾，人們感嘆：沒有人才，千呼萬喚，人才來了，塞堵成疾。中醫說體弱不可大補，海南的局面正是如此，一下供應了太多的營養，吸收不了，消化不良，反成大病。

海南島曾經也令外資感興趣。當他們派考察團上島之後，立即產生諸多失望。一位在海南辦廠六年的日籍總經理不願把夫人帶來，寧願每星期回日本渡假。他懷疑他的夫人在這裡是否能生存下去，即沒水又沒電，在郵局排隊掛長途電話，一天一夜掛不通。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年得子，這第三十一個早產兒一生下來就先夭不足。當時全省發電裝機容量不足十六萬瓩，其中水電占百分之八十，一到旱季，電力就緊張。海口市的郵電業務在人才大潮中猛增百分之八十，但還是原來五千門電話設備。長途綫一次只能供十二戶同時

通話。省際電話未建，很多縣還用手搖機。港口、公路的交通運輸能量僅一百萬噸，僅達所需量的八分之一。在這個基礎上，能生存多少家企業，能容納多少人才？

一家旅游公司招了一位青年裝潢設計師。可是公司業務不佳，無海報廣告之類生意。於是他被發配到下面商品公司，可是那裡正倒騰緊俏商品，也沒什麼設計需要，於是再把他下放到商店門市部，門市部經理找不出要畫要設計的工作，把他扔給櫃台組，而櫃台組認為他專業不對口而拒收。他建議總經理從長計議，養着設計師終有大用，可是經理也有難念的經。工資包干，落實到人頭，哪能養得起閒人。

雄心勃勃的求職者大多是自命不凡的大學生，他們總是把眼光集中在城市，集中在外資企業，政府部門、事業單位、大公司，而那些地方恰恰人滿為患。相反，縣裡、鄉裡的企業急需人才，到處招人，應者寥寥無幾。求職者對鄉鎮企業的表格不屑一顧，對人才中心工作人員的大道理一笑報之。什麼「到基層去」，「到落後偏僻的地方去大展鴻圖」，這一切他們的上一輩已吃盡了苦頭，這一代人不再相信了，他們不準備將青春用於這種嘗試和賭博。人才交流中心的小樓忠實地記錄這次海南大潮漲落的水文資料。在四萬多登門求職中和十五萬封求職信中，經人才中心介紹安排的僅三千餘人，只占來信和來人總數的百分之二點一和百分之七點五。

被人才大潮沖得頭昏腦脹的省政府終於清醒過來了，對人才開始實行計劃引導。於是海南省派往北京、上海、西安、武漢、成都的人才招聘小組出發了。滯留海南的求職者譏之為「愚蠢的舉動」，「送上門的不要，反倒捨近求遠出門去找。」

招聘小組帶回的數字並不理想。同意來海南，並辦遷移手續的，武漢有二十三人，北京十五人，而西安、南京、上海、重慶竟無一人。與此流相反，北流的人數劇增，每日數百人，海口碼頭的船票成爲搶手貨。



與人才回流呼應，持續了數日的「公司熱」開始消退。曾經陷入困頓的「海南省一條龍」式的投資服務中心，得以喘息。註冊登記、公司掛牌的高潮冷卻了，許多公司辦事處只留下看家的留守人員，其餘陸續班師回朝。飛機票、船票的黑市價仍然居高不下，海南島投資環境調查報告已由各種諮詢機構送抵各省市決策機構，大多數分析結論為「不理想」，「條件不成熟」。於是資金也開始回流。一些在海南碰得頭破血流的投資者道：原以為海南是一片投資樂土，可是沒有想到內地有的弊病這裡都有，內地沒有的弊病這裡也有。

土地原來在海南島是最廉價的，可是一夜之間漲了百倍。三亞市河東區月川村一天之內聳起一百多座新墳，可是全村人個個面帶喜色毫無悲痛之情。原來市政府要征用該村這塊荒地，村民們趁機多撈一把，製造假墳，多要補償費。這是一場真正的群眾運動。

當前海南省有句話：「滿城都為發財跑，唯有土地最看好。」很多地方出現了莫名其妙的「土地使用證」，似乎每個農民口袋裡都能掏出一個來。一個村子有十三戶村民將自留地賣給城鎮居民建房。當他們被指責為非法時，理直氣壯地亮出一九八〇年鄉政府發放的「土地使用證」，而證上蓋的章是八年前就已取消的崖縣所屬鄉政府章，可是信箋用的全是當時根本不可能得到的進口紙。

海南的地價一夜之間漲到了東京銀座，紐約曼哈頓的水平。一個舊廠區每畝地一百三十萬元，城中商業區達每畝二百萬元。從大陸湧入的投資者怨聲載道：「海南人都瘋了，好像一成了特區，連草都身價百倍。房租比平均利潤率還高，真是天下奇聞。」於是一些城鎮出現一個怪現象，一方面地價上漲，另一方面地

賣不出手，房租不出去。海南人看來還沒有學會計算時間的價值，很多人還在做着「房價還會再漲，再等一等能賺大錢」的美夢。

人們乘興而來，想在這裡找尋更廣闊的生存空間，可是現在他們又敗興而去，這寸寸寸金的地價使這裡的生存空間比大陸還要苛刻。

目送北歸的人群，你可以看到一張張表情惆悵的面孔。其中有一個全島聞名的人物：麥保爾，他是作為廣東省智力開發中心的副總經理應聘來管理友誼大酒店的。他曾雄心勃勃地想在這裡創建一個國內管理公司，建立一個實習酒店的培訓基地。在內地，五年內他四次跳槽，從不氣餒。可是在海南島友誼大酒店却遭重挫。作為一個總經理，他被董事會強行趕走。合同被撕毀，酒店被迫停業，移交時董事會竟出動武裝人員。而這所有的原因是因為他沒有與地頭蛇的董事們搞好關係。

在赴海南島闖海的芸芸衆生中，也許每個人都曾經有過一個絢麗多彩的黃金夢，同樣，在北渡瓊州的歸還者中，也許每個人都會滿懷一腔苦澀。

中國人因過去飽受政策的束縛和制約，所以對新的政策的迷信也特別狂熱。似乎一個自由開放政策就能夠創造一個自由的樂土。他們以為，只要有了特殊政策就可以扭轉乾坤。

可是最終他們發現，這裡還是共產黨的世界。外國投資者並沒有因為它貼上了「自由港」的標籤就放棄了對共產黨人的不信任和疑慮。共產黨的管理者們並沒有因為踏上一塊陌生的土地就放棄腦中舊的思維方式。四十年來，中國人總是在巨大的「冷」「熱」「溫差」中打擺子，如今，這個瘡疾又在海南島重演了一遭。中國人呵，我們已經有了「河殤」，難道我們還要有「海殤」？

你想合法留在美國嗎？請找 律師 Roland Gell

專辦

H-1 簽證 工作許可 超速罰款
政治庇護 學生簽證 違章駕駛
婚姻案件 刑事犯罪 執照吊銷
遞解出境 意外訴訟 房屋買賣

請電話預約：

(212)619 5520
(212)619 2859

免費保密 諮詢

地址：299 Broadway Suite, 420, New York, N.Y. 10007 (Near City Hall)

大陸文化圈裏的自由職業者

星星



朱曉陽在河北滄州採訪。



徐星伉儷

一批賦有才華的年輕藝術家放棄了行政、工資、公費醫療、退休金、人事系統的保障，簡言之，放棄了共產黨的「一手安排」，走進了「自己安排自己」的自由職業的行列。他們與眾不同的生活狀態和藝術見解，他們的名聲和他們的困境引起人們的關注。

十年前出現的星星畫展，可以算作這批自由職業者的源頭之一。這個事件不僅孕育了當代北京第一批自由畫家，還孕育了自由文學家和詩人。譬如作家鐘阿城，詩人北島都是最早的星星美展的成員。他們熱愛藝術熱愛自由的天性，迫使他們急於擺脫時時羈絆着他們的「黨的領導」，那怕是用生存的基本條件作為代價。

後來的，年輕一代的自由藝術家，或多或少都受到這一事件及其成員的影響。

假如明天來臨

十月十日，「中國文化報」的記者在勁松新區的一幢樓房的地下室採訪了三十二歲的自由作家徐星。徐星的中篇小說「無主題變奏」已作為八〇年代新潮文學作品之一被一些文科大學指定為必讀作品，可是出人意料，徐星負債累累，正急於在官方文化系統中謀職。

記者：發表「無主題變奏」時，八五年吧，你是在烤鴨店工作，是嗎？做什麼？後來成了自由職業者？

徐星：我是八一年去的烤鴨店，之前插過隊、當過兵。在烤鴨店是清潔工。發那篇小說時已經不怎麼去了。後來我一直沒有正式工作，其間騎自行車去過廣州，到西藏拍過電視劇，到處亂撞。不過我的檔案一直在烤鴨店，直到八月份，他們通知我，再不上班就把檔案寄

回街道居委會。

記者：後來呢？

徐星：曾經有一陣，我到處找工作，現在「華人世界」答應接收我的檔案，我很感激那裡的總經理。

記者：你為什麼一定要找一個單位呢？靠寫作不能維持生活麼？

徐星：根本不能。

記者：稿費低還是投稿的命中率不高？

徐星：我寫稿很慢。總是別人催我，還沒寫完上一篇，人家又來催下篇。我想不能靠寫作維生的原因是稿酬太低。到目前為止，我得到的最高稿酬是千字十八元。

記者：那篇「無主題變奏」也是約稿麼？稿費多少？

徐星：那篇是投稿，是個例外，那時我還不知道我寫的能不能發。稿費記不清了，可能千字十七元，你們可以去問編輯部。

記者：在沒有工作的這兩年裡，除了稿費沒有其他收入麼？

徐星：賣過一陣書。

記者：像大街上小販那樣擺個書攤？

徐星：還不如他們。工商局的一來，我就得跑。我沒執照。

記者：工商局看到我們的採訪會不會來征稅？

徐星：不知道。我申請過執照，可是一直沒批下來。前一段黃色書刊泛濫，申請書攤執照必須先由北京文化局批，我想可能卡在那裡。說實話，如果我有執照，我不會急忙找工作。

記者：就是說，如果稿酬可以維持你理想的生活狀態，當然不是指那種奢侈的生活，你還是想做自由作家而不是編輯或文字方面的職

員。

徐星：太對了。只要能維持一般生活，甚至可以窮一點，我也情願當一個只在家寫稿的人。這是不可能的。三年來，我欠下許多債。就我瞭解的情況，王朔、北島、芒克、江河，這些你們可能都叫他們自由職業者？

記者：對。

徐星：他們都不敢做純粹的自由職業者，他們的檔案都暫存在一個工廠或公司，沒人敢把檔案放在街道。

記者：爲什麼？

徐星：我想一個主要原因是怕生病，如果沒有個單位擔保，我們生一場大病就完了，傾家蕩產。

記者：你爲提高稿酬做過努力麼？

徐星：剛剛寫完的這篇小說，我向編輯部提出四十元一千字，還不知能不能拿到，這是第一次，實在沒有辦法了才這樣。

記者：這篇小說什麼內容？

徐星：寫我騎自行車去廣州的一些故事，可能要寫到二五〇〇〇字左右。

記者：你的小說是先寫提綱還是上來就進入情節？

徐星：直接寫，是後一種。

記者：那麼怎樣控制結構？會否寫到一半時產生新的設想，改變了原來的情節。

徐星：太可能了。

記者：這種中途改變是什麼原因？你自己進入角色後；按角色需要任意發展，而不顧「導演」，也就是作者的最初設想，是這樣麼？

徐星：有這種情況。通常不會陷的這麼深，往往憑直覺，覺得這樣可能更有意思，那樣沒意思。

記者：就是說你臨界選擇的標準是怎樣更

有趣。那麼你更注重情節而不是說清一種道理，是麼？

徐星：我認爲小說本身不含有教育價值，至少寫作時不應考慮。小說負有的道德責任是在社會、讀者的背景中產生的。

記者：這麼說你是缺乏使命感的作家？

徐星：我敬佩有使命感的作家，但我不是。

記者：能否解釋一下？

徐星：我們社會目前需要這樣的作家，無論他們在文學史上有無價值，在社會發展史上肯定是有價值的。並且目前中國還不急需純而又純的文學，沒有純文學大家一樣過日子，但是沒有敢於干預生活的文學家，大家可能會不滿，因爲明擺着有許多問題。

破壞與否定，重建文化的前提

十月十九日，中國文化報記者又訪問了自由歌手崔健。

崔健：作爲一個歌手，我希望你們聽我的歌，然後寫自己的感受，最好注明那是你們自己的看法。現在先介紹我這個人，後聽到我的歌，程序倒過來了，好像，好像什麼呢？短褲穿在長褲外面了。

記者：傳播媒介對藝術品或藝術家的闡釋是無意義的？

崔健：毫無意義。特別目前在中國，闡釋者往往在沒弄清楚的時候，也許有人根本沒想弄清楚就出來闡釋了。小時候我非常羨慕記者，一見記者證什麼電影都可以看，後來我覺得人們把記者慣壞了，他們付出的與享有的太不平衡了。跟你閒聊兩句，就寫出好幾千字，讀者無法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闡釋錯了，還不如什麼都不說的好。

記者：如果只表達感受而不闡釋，會不會更容易偏離藝術品或藝術家的本意？

崔健：據說語言表達速度僅是思維速度的五分之一，你再寫出來，讀者再看，同一個詞在不同人看來又生出許多不同的意思，經過多次扭曲，所以說闡釋是一種可怕的事。

記者：那麼只好直接問，你對已經對你做出的那些闡釋產生了反感？

崔健：歸類。不負責任地歸類，這是靠寫別人吃飯的人最時髦的作法，每出一新事、新人，他們馬上站出來，你屬於這派，他屬於那派，擺出一種鳥瞰的姿態來指點江山，好像一切都在他們的預料之中。把別人往固定的格式裡一扔，然後就拿稿費去了。我總想與這種人的位置調換一下，讓他來彈鋼琴，我去分分類，一切就都清楚了。

記者：我沒聽懂。據說你認爲中國還沒有真正的搖滾樂，是麼？

崔健：大家都說自己是搖滾歌手，成癡成魔，那肯定是出了問題。就好像，好像什麼呢？好像農民彈電子琴……

記者：什麼意思？

崔健：還不知道電是什麼。

記者：你說搖滾是什麼？

崔健：我沒想過如何定性定量地描述它，也許定性定量地描述一種意識形態是不切實際的奢望。搖滾是一種意識形態，而不是固定的形式，實際上今天西方的搖滾樂技術、形式已與五十一六十年代的相去甚遠。

記者：中國歌手缺乏這種意識？

崔健：你說意識可以增加或減少？我說只有有與沒有的區別。你看，很簡單的事用語言表達多難、多累！這麼說吧，京劇是什麼？

記者：一種意識形態？

崔健：你沒想就說了。一個「阿」字唱半分鐘就是京劇麼？美國人也穿上戲服、唱花腔，那是京劇麼？雖然很像，但不是。這需要在更廣泛的文化背景上進行比較。譬如中國人的享受是和諧、平緩，這些沉淀到音樂上就是京劇。西方人的享受是刺激、自由和性，沉淀下來生出搖滾。我們往往只注意結果，一系列的方程式解出來等於八，但這個八可以用無數個方程引導出來，中國目前的搖滾可能是八，但不是正解得出的八。

記者：那麼中國不可能產生真正的搖滾了？

崔健：暫時弄不出結果，但應該開始尋找那個方程了。

記者：那個方程是在那個文化背景中產生的。

崔健：那就先整理一下背景，不就是人格獨立麼？這很簡單。

記者：我們為什麼非得那樣呢？

崔健：你的提問包含着重負，我們是誰？你只代表你。我要弄出八，你不願弄，你還問我為什麼要弄。我們的談話已開始明朗了。

記者：你是否認為好的東西是屬於全人類的？

崔健：這還用問麼？日本的電器好，買來就是，幹什麼非得用國產的？美國人也沒因為京劇是中國的就恨之入骨。怎麼說呢？你不想開汽車？不想住大房子？用真心去想。

記者：那麼音樂民族化或中國搖滾樂之類的說法是……

崔健：外行的說法。音樂是什麼？是創造，在什麼都沒有的地方弄出聲音來。但是在中國已沒有空白，種種扭曲、重負使人們聽不清

自己說了些什麼，也聽不清別人在說什麼，這時候搞音樂，最好先砸，先毀，把所有已經有的聲音都毀掉，騰出地方來再談創造，談真正的音樂。

對官方文化的影響

由於中國官方文化系統目前基本還是大鍋飯式的體制，所以官方文化職業者在文化市場上缺乏自由職業者具備的競爭能力。許多文化系統領導為提高他們的文化產品的競爭力，已開始借助自由職業者的才能。這種融合使自由職業者的發展前途變得複雜化了。將來的自由職業者可能被全部納入官方文化系統，或者是，官方文化系統徹底解體，文化職業者可能全部被推入文化市場。採訪至此，我們發現自由職業者的前途或許與中國改革的成敗還有些微妙的關係。

十月七日，我們在中央電視台「中國人」電視系列片攝製組駐地採訪了朱曉陽，這位三十一歲的自由作家以其長篇報告文學「盲流中國」而一舉成名。

朱曉陽：從來都是寫別人，沒想到如今有人要寫我。

記者：據說你剛寫完一篇報告文學「中國的拉丁區」？

朱曉陽：對。寫一幫住在海峽區的沒北京戶口的外地人。

記者：你好像對戶口問題很敏感，是否自己沒有戶口？

朱曉陽：對，我現在沒有北京戶口。在中國沒戶口就意味着租不到平價房子，沒有勞動保護、沒有糧票，只能幹當地人不幹的活兒。

記者：指什麼？

朱曉陽：譬如蹬平板三輪車，很累很苦，但北京人愛幹，外地人就不能幹。外地人只能幹北京人不幹的，譬如當嫖娼、建築工人、彈棉花等等。

記者：能否介紹一下你到北京後的情況？

朱曉陽：一九八二年我從雲南大學政治經濟系畢業後分到雲南物價局，八三年八月辦了留職停薪手續；跑到新疆伊犁生產建設兵團，在第四師的一個學校教書，八六年初到北京，就開始了，你們叫什麼，自由職業，對，開始了自由職業生涯，到處亂撞，不斷變換工作，今年九月底雲南方面通知我自動離職。

記者：在北京你都在哪些地方工作過？

朱曉陽：多啦，「醜小鴨」、「中國文化報」、中國社會調查所，現在中央電視台幹臨時工。

記者：在社調所幹什麼？

朱曉陽：調查了全國二百家農民企業和業主。

記者：有何收穫？

朱曉陽：原來是學經濟的，對這項調查很感興趣，鄉鎮企業是最有前途的一個社會階層，有些像自由職業者，他們一出現就進入了市場，或者說應市場經濟之運而生，我們都是在市場競爭中崛起的，有人要我我才能到中央台來，就是說我們的出現是市場機制自然運轉的結果，而中國的出路就在於恢復和理順市場機制。

記者：目前已經出現如閣下這樣的自由職業者，但又沒有一個健全的人才市場，那麼你認為將來是自由職業者促進人才市場的健全呢，還是社會環境改變自由職業者的初衷？

朱曉陽：事在人為，許多事說明自由職業者已經對形勢發展起了作用。崔健沒工作，照

樣有公司願意出他的磁帶。表面看大家都為錢，實際上有些事的出現、存在本身就是對傳統社會結構的衝擊，不用評論，行為就足夠了。搞社會調查時我曾親眼看到，山東有兩個鄉同時富了起來，都想推舉自己熟悉的人當縣長，於是就有了政治捐款，投資為自己的候選人開展公開活動，拉選票，很有點現代政治的意思，沒有人引導他們，也沒有人鼓勵、評價他們，但他們已經改變了當地的政治傳統。你說我們能否影響形勢的發展，我們能生存就是一種影響。

記者：你同中央台的合作開始於什麼時候

朱曉陽：大概是八七年底，原來他們想以我的鄉鎮企業調查報告為綫索攝製一個電視片，錢沒籌夠。

記者：現在每月掙多少錢？以什麼名義？

朱曉陽：以稿費名義每月掙二五〇元。

記者：吃飯、住房都用這些錢麼？

朱曉陽：暫時不用，中央台包了房子和伙食。

記者：誰請你出任「中國人」的撰稿人的

朱曉陽：本片總編導呂斌。

記者：他知道你的生活狀況和歷史麼？

朱曉陽：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

記者：他為什麼請你而不請本台的人撰稿

朱曉陽：好像中央台還沒有專職的撰稿人

記者：他們會否把你調進中央台？

朱曉陽：絕對不可能，他們已經有幾千人

，幾千人！太可怕了。

記者：在以往的合作中，你的文學風格與

編導的要求有無衝突？你寫的詞他們修改麼？

朱曉陽：到目前尚無衝突，這是一種合作、一種謀生手段，而不是獨立的藝術創作。整部片子的調子和總體計劃都報台領導審批過。電視片與文學創作不是一回事，要隨拍隨寫。另外，你們應該知道，中央台現在也在尋求突破，希望製作一些收視率高的節目。

記者：攝製組全是自由職業者麼？

朱曉陽：不不不。只有我和吳文光，吳是我的朋友。

記者：你剛才說為中央台工作是為了謀生，那麼你認為有非功利目的的創作了？「盲流中國」和「中國的拉丁區」是這樣的作品麼？謀生與創作不能統一，是麼？

朱曉陽：中國知識份子可能受十九世紀俄羅斯、法國貴族文人影響太厲害，我還弄不清楚通過什麼渠道受的影響，好吃懶做，搞文學的就在家一呆，呆煩了開個會，選得有車接，國家養了一批無論寫不寫，注意，還不是寫得出寫不出好作品，都拿工資，外加稿費的所謂專業作家。你知道麼？福克納也要靠管理農場維生，也要靠給好萊塢寫通俗故事片腳本賺錢。你說是否存在無功利目的的創作，我認為有，但我沒那樣做過，我得吃飯。

記者：拍完「中國人」幹什麼？有無寫作計劃？會不會依舊圍繞戶口問題寫些什麼？

朱曉陽：不知道。總的方向是寫社會現象、社會問題。戶口，這是很討厭的事，弄得我很煩，最好能取消戶口。

結束語

也許這些藝術家有一萬個理由不這樣生活，有一萬條出路可以比現在獲得更多的生理上

的享受。如果他們願意像上一輩的藝術家，「一切交給黨安排」會省心的多。

但是只要有了選擇的機會，他們就選擇了這樣的道路，正如和查理、卓別林講過的一樣，他們也要說：「我不相信我們的存在沒有意義、或是偶然的。」

政治笑話

畔之

貝多芬熱愛毛主席

那年我在農村插隊，勞累之餘拉拉小提琴。一次大隊開聯歡會，社員硬是要我上台。「拉個提琴給我們聽吧！就拉你平時拉的那些曲子，挺好聽的。」

我不喜歡當時流行的那些「革命音樂」，平時拉的都是洋曲子。這次推辭不過，只好上台。也沒加考慮，信手拉了支「貝多芬D大調」。

拉完之後，社員都鼓掌。坐在台上的大隊黨支部書記却皺起了眉頭。他滿臉警覺地問道：「你這拉的是什麼曲子？」

我略為一怔，然後說：「這個曲子叫「貝多芬熱愛毛主席」。」

「貝多芬熱愛毛主席」，書記狐疑頓消，連連點頭，「好聽，好聽，真好聽。」

今日的中國，

苛捐雜稅多

吳甦

以前，大陸的人們用「國民黨的稅多，共產黨的會多」來形容兩黨的區別。這句話現在顯然不合時宜了。共產黨已經集二者於一身，把國民黨的特點也學到手了。並且有過之無不及：不僅處處有官征收堂而皇之的稅，而且路路設卡，強收莫名其妙的「買路錢」。

你不是要出國嗎？好！從成績單、協議書到取護照，你就準備好給錢吧。注意，還得早給早好。因為這些地方收錢的標準也受通貨膨脹的影響。上海某大學，留學所需成績單一九八七年是每個人五元，一九八八年則是三十元。某省政府外辦，一九八七年簽發護照，每本四十二元，一九八八年要收一百二十元。

你想要房子？行，給錢吧！當然，如果是交房租，或買商品房，那交錢是天經地義。可那要給的錢同這些都不相干。例如上海市一家工廠一九八八年給職工分配了新公寓。當職工們去房管所辦理用房手續時，經辦人員僅在廠方發給的證明上填了幾個字蓋了一個章，開口就要五元。不服？「這是我們所裡開會規定的，錯了也得執行！」吞不下這口惡氣？想開點兒吧，房子俏着哪。只收五元已經夠便宜的啦，如果我們決定每戶得交十元，你還敢少給一個子兒？

近兩年來，國內無論什麼部門，只要手中有權，無不借着開放搞活的名義巧取豪奪、敲榨勒索，將本職義務變為生財之道。他們深知，在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下，他們手中的權力使他們可以占山為王，坐地收錢，在國家工資、獎金、津貼之外，再撈取一份報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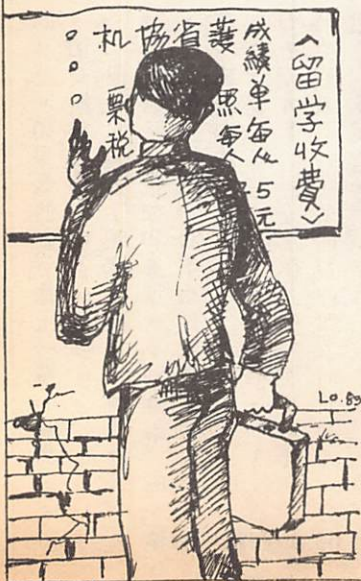
「咱哪兒也不去，你總敲不着吧？惹不起咱躲着點，行吧？」未必，有辦法叫你破費。說不定哪天小孩從學校下課回來，會交給你幾張借讀繳費單或「自願贊助書」之類的東西。在上海某區一所重點中學裡，有關部門檢查了二十張借讀收據。其中五名高中生每人支了五百元；七名初中生每人交了四百元；另有八名高中生每人僅付了五十元。為什麼竹杠敲下來還有輕有重？原來，被優待的學生都是經過校長特意「關照」過或是該區領導幹部的子女。

工廠企業目標大，更難逃「稅網」。據統計，上海市基層商業企業要支的費用有：安全費、治安費、保潔費、保潔費、滅鼠費、設攤管理費等二三十種。有幾個單位集資建造職工宿舍，五年內被房管所、住宅辦、派出所收去管理費、治安費、保潔費、停車費共五萬多元。一家年利潤只有近三十萬元的菜場，被各方各敲

去了多達幾十個名目的十萬多元。

抗捐抗稅？你敢？！個人量你沒那個膽，不交錢叫你哪一關也過不去。單位企業的腦袋硬一點？也有你的好看。例如上海一家上千人的工廠被通知與某環衛所簽訂新的承包合同，規定該廠每月除了支付每噸五·五〇元的糞便清運費外，還得加付每隻化糞池二百五十元的疏通保潔費。該廠一算帳，七隻化糞池，一年就得支出二萬一千元，不堪消受。派人商談減價，遭到斷然拒絕。結果，在該廠俯首臣服之前，環衛所明顯降低去該廠抽糞的頻率，致令該廠「糞滿為患」。

多納德·雷根在他任美國總統期間曾多次引用一位古埃及經濟學家的話來作為他的稅收政策的論據：所有臨近末日的王朝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這就是苛捐雜稅。我們也知道：「國民黨的稅多」這句話所指的也只是在大陸大勢已去正準備退守台灣時的國民黨。由此看來，苛捐雜稅在大陸囂張自有其必然性。雖然，本文所引具體事實並非都是典型意義上的「捐」和「稅」，但唯其如此，才更見今日中共的腐敗，才更令普通百姓不堪忍受。近期在大陸所謂工商管理人員為普通商販所殺的事件幾成風氣，不是很能說明問題嗎？



「天堂」的入口

薰子

這是一條十分幽靜、整潔，濃蔭遮蔽的馬路。馬路西邊，花木掩映當中，是一座式樣平常，但門禁森嚴的樓房。房前有一片開闊的場地，一桿美利堅合眾國的國旗矗在那兒，正在藍天下高高的飄揚。再過來一點，便是一扇巨大的鏤花黑漆鐵門，門外筆直站着一位中國武裝警察。這便是美國駐北京領事館的外觀。

很難形容站在那莊嚴的黑漆鐵門前的感受，只覺得裡邊那面舒展自如，迎風飄揚的星條旗的燦爛、鮮艷與站在外邊的自己那陰鬱、壓抑的心情對比過於強烈。前幾天，在一位即將赴美的好朋友手裡看到一封家信，她姐姐寄給她的，上邊竟有這樣一行字：「……妹妹，在看到你終於拿到赴美簽證時，雖才短短一句，却令我驟然眼淚奪眶而出！妹妹，你終於可以踏上通往天堂的路了！……」這朋友是個深沉的女孩，遞信給我時，眼圈突然紅了；而我讀到「天堂」二字，竟也莫名地感到一陣冰寒！

地獄篇

每天凌晨，在天色依舊漆黑的時候，這扇鏤花黑漆鐵門對面的人行道上，已倚牆站了幾個人。他們的腿邊，低低攔着一根細細的鐵鏈。漸漸地，人越來越多，隊顯然長了起來。這些人每人手持一本深褐色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裡邊夾着各式各樣的材料。他們起初都默默站着，憂心忡忡地想着心事，偶爾大聲打一個呵欠，但不久就三五成圈地談論開了。「你怎麼樣，這回又換什麼材料了？」「我他媽這次再被拒簽，發誓不來了。誰他娘非說非得去他媽美國不可！」「害怕嗎？」「不，就是有點擔心。我都三次了。」「哎，你說我怎麼才能讓他們相信我呢？」「喲，這個，沒准兒。不知道。」每個圈子裡幾乎必有一位「久經沙場」，連連被拒批了幾次的人，只見他侃侃而談

，分析着近日領事的陣容，美國對華政策的新動態，而其他人則多愁容滿面，目光深含焦慮地諦聽着。等一到八點，鏗鏗噹噹幾聲，從馬路對面黑漆鐵門左邊一扇小側門裡走出幾位異常標致、瀟灑，衣着考究的中國工作人員時，所有排隊的人霎時沉寂了。人們迅速恭順地排好隊，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們。「今天只見五十人！」一位工作人員宣佈道。長隊後面隨之響起一片失望的驚呼聲；而前邊的人們則默默地、驚喜地垂頭等候着，然後，跟着這幾個瀟灑的人兒魚貫越過馬路，穿過小門進入領事館內。在這裡，他們又被分成兩撥：前十五名先在裡屋一個小窗口遞進所有材料，經一位中國工作人員審定之後，被吩咐坐在對面靠牆的一排長椅上；剩下的人則分散坐在外屋等候。從外屋這兒，越過那扇依然緊閉的鏤花黑漆鐵門，能望見那大堆大堆未被允許進入領事館的人們，不少後者正在鐵門外眼巴巴地看着裡邊，因為，在他們眼裡，哪怕這些坐在外屋的人也已是一「猶帶昭陽日影」，堪值歎羨了！

煉獄篇

裡屋不大，牆壁雪白，靠屋內盡頭的地方，豎着一排精緻的中國風格的暗褐色漆雕屏風，上邊裝飾着梅、蘭、竹、菊四樣象徵意義很強的花卉。屏風後有兩面巨大的，明亮乾淨的長方形玻璃窗，窗下有一窄窄的空缺。窗戶裡面，兩位年輕干練，膚色白皙的美國領事各坐一處。

屋內靜寂得像要燃燒。

九點半，屏風後傳來第一聲麥克風低沉的聲音：「×××。」這是一個中國人的名字。只見坐在長椅最頂端的一位四十歲左右知識份

子「騰」地聲從椅子上彈起來，疾步走向一隻窗口，他剛想出聲用一句英語同準備接見他的男領事搭話，領事拿手指在自己嘴邊噓了一下，然後，用標準而冰冷的中國話問道：「你爲什麼去美國？」「想去學計算機管理。」「擔保人是誰？」「我姨媽，她在加拿大開公司；我祖父在美國有遺產……他的學生都會資助我。」這位四十歲左右的知識份子一邊說着，一邊向窗下的空缺處塞進許多證件、信函和榮譽證書。但領事並未去翻動那些材料，而是一併將之推了出來，說：「您不符合美國移民及國籍法第二一A十五條例。您未能證明您有足夠的經濟能力，以支付您在美國停留期間的費用，我不能爲您簽證。」這位知識份子吃驚地、愕然地直直盯着領事，臉色頓時變得利白。「您可以走了，」領事說，微微眨了一下他那雙湛藍的，清澈平靜的眼睛。與此同時，另一個窗口前站着的是一位非常清秀，風度相當溫柔典雅的青年女子。接見她的是位同樣年輕，滿頭金髮的女領事，她身子筆挺地坐着，凝視着玻璃窗外的中國女子，「請原諒。再說一遍，我非常同情你，但我不能相信你，」她說。那青年女子已被拒簽兩年了，她辦的是陪讀，她丈夫正在美國讀書。兩年裡，她每三個月來一次，但每次都是這樣的結果。領事認定她不會再回中國，因此，無論她百般解釋都拒絕了她。她此刻仍溫柔而委婉地一笑，但嘴角明顯在抽搐着，眼淚湧滿眼眶。「謝謝你；再見，」她輕輕說，說完擰身匆匆走出去。那背影十分削薄、淒楚、絕望。

麥克風不斷在低聲叫着一個個名字。長椅上的人們一個個向前挪動着。空氣緊張極了。望着一個個從屏風後走出的人那副沮喪、頹唐的神色，這些坐着等待的人們幾乎感到一種快要發瘋了似的窒息和壓抑。沒有人說話，甚至沒有人哪怕哼一聲。一位坐在中間的三十多歲女人漸漸受不了，張嘴輕輕出了口氣，轉臉問身邊一位中年男子。「您也是留學嗎？」不料那男的雙目直直盯着正前方收材料的小窗口，緊閉嘴唇，神情一動不動，彷彿壓根兒沒聽到女人的問話；直過了很久，才也慢慢吐了口氣，瞥了眼問話的女人，說：「不是，我辦探親。我妻子在那邊。」緊挨這男子坐着的是兩位



中學生般的少年男女。「咱不怕，不就等於一次高考嘛，什麼了不起！」那少年搖晃着腦袋說。少女則緊張而腼腆地一笑。正在這時，前邊「咕咚」一聲，屏風後剛走出的一位青年男子突然一頭栽倒在地上。這是位高個子，臉色蒼白，削瘦，樣子相當聰穎、敏感的青年，穿着一身極樸素的深藍色學生裝。已經坐在椅子最頂頭的一位矮個兒小伙子立刻站起來，上前拉起他，將他扶到自己的位子上。那青年於是

雙手捂住臉，深深垂着頭，久久靠牆坐在那兒。屋裡更加寂靜，每個人的心都緊緊揪在一起。在一陣長時間的沉默之後，那位剛才搖晃腦袋的少男聲音低而沙啞地祈禱開了：「上帝保佑，聖母瑪麗亞保佑，穆斯林默汗默德保佑，如來佛保佑，觀音菩薩保佑，大慈大悲的一切在天神保佑！」他一連串地說完之後，乾乾地對身邊的少女笑笑。「你求不？我反正都求到了。聽天由命吧！」所有長椅上的人都默默聽他說着，沒人答腔。過一會兒，椅子尾端慢慢快傳來一位老太太有氣無力的聲音：「從早上六點鐘來排隊，這都十一點了，連口水也沒喝，真糟心！」仍然沒人應和。末了，一位正站在門邊的工作人員微微一笑，不慌不忙地說：「這不是化驗肝功，誰叫您空腹！」然而，即使這句俏皮話也招不起一點回響。長椅上的人都默默地，臉繃得緊緊地坐着，豎耳聽着屏風背後的談話。現在，男領事正在接見一位穿着時髦，化妝濃艷的高大女子。她顯然被拒簽了，只見她高聲申訴着：「爲什麼？不，你得說出個爲什麼！我已經被拒批了六次，六次都說我移民傾向，移民傾向。我想知道憑什麼，你們憑什麼這麼說我，你們也得拿出個證據來！」男領事微微聳聳肩，聲音溫和地說：「這不屬於我回答的範圍。」女子沉默地，滿眼怒火地瞪着領事，半晌，咬住牙罵了聲：「我操你媽！」領事轟地一震，然後，低頭看一眼花料，仍舊聲音低沉溫和地叫道：「下一位。」這女子掃了眼正走上來的青年，又看看領事，胡亂收拾起自己被退出的材料，威風凜凜地走了出去；但剛衝出外屋，走到領事館院內一棵樹蔭碧綠的梧桐樹下，她忽然失聲地嗚嗚哭開了。這邊，女領事正叫着另一位年輕姑娘的名字。這是位十分樸素，但衣着講究的姑娘。當

她大步走進窗口時，坐在裡邊的女領事突然用流利的英語問道：「CAN YOU SPEAK ENGLISH？」姑娘一愣，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領事冷冷望着她，又重問一遍。這時候，姑娘才如夢初醒，用手一抹額上滿滿的汗水，吃力而清晰地回答說：「YES, YES, SURE！」她們用英語交談着，姑娘的英文非常好。最後，領事用筆在一隻小本上飛速劃了幾下，撕下一片紙遞給了她。姑娘最初還未明白，吃驚地看着小紙片，接着，忽然驚訝地叫了聲「呵！」她連忙抬頭望着窗內的金髮女子，大聲說：「THANK YOU！THANK YOU VERY

MUCH！」她是今天第一個得到批准的人。屏風外的人顯然明白了，於是，在她走出來的時候，幾乎一致抬頭望着她。「批了？」「怎麼批的？」「你辦的什麼？」姑娘一聲不出，疾步朝外走。外屋人也向她湧上來，她理也不理。等徑直衝到外邊台階上，她仰臉靠牆站着，望着頭頂大片蔚藍的天空，忽然覺得一陣空空蕩蕩的眩暈。

一個男子臉色發白地走出來，人們剛想湧向他，只見他無力地搖搖頭，人們便將剛要邁出的步子收回了。

一個女子風風火火跑出來，雙頰通紅，大聲地神經質地笑着：「不行，沒戲！這次還是沒戲！」

一個帶小孩的婦人默默走出來，人們只遠遠看着她。

忽然，一位戴眼鏡的青年意氣風發，春風滿面走出來，人們「嘩」一下湧上去包圍了他。「怎麼樣，批了嗎？」「今天是誰在右邊窗口？」「嘿，哥兒們，問了你些什麼？」青年被擁在中心，高深莫測地一笑：「我能不批嗎？」「他說着往鼻子上一推眼鏡。「我這麼好，

這麼誠實！說實在的，我在門口已經轉了一星期了！我天天觀察，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再說，今天天氣這麼好，領事心情也能好一點，他就會批！」「啣！」周圍頓時響起一片驚嘆、讚揚聲。

命運

記不清「神曲」中但丁是如何解釋「煉獄」中的人們濼清罪孽，昇入「天堂」之門的，倒是米開朗基羅「最後的審判」中基督那隻高高揚起的，神聖而有力的手和他手下無數在呻吟，在渴望離開罪惡，奔向天國的人的神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國領事館玻璃窗前的一幕自然不能與這種宗教的崇高的故事併提，但那扇鏤花黑漆鐵門外大堆的人群，領事館內、外屋坐着等候的人們，尤其是，被喚去站在玻璃窗外接見的人，那種精神的焦慮、憂愁、膽怯、恐懼與玻璃窗內領事的平靜、坦然、優雅而自信的神情的對比，也實在猶如一場新的，發生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煉獄」，而那張小小的簽證紙也幾乎真的猶如一張進入「天堂」的許可證。然而，令人難過的是，那扇玻璃窗隔開的其實又並非是神與人，那將宣判我們快樂、幸福抑或悲傷、絕望的完全只是一個像我們一樣普普通通的凡人！也許，這正是現代的「神曲」，現代的「最後的審判」，但無論如何，對在盧梭「人生而平等」的偉大聲言中成長起來的我們，對此的確總感到一種難言的深深的屈辱。

呵，但願有一天玻璃窗內外的無形的審判能消除掉，但願窗內人那種紅潤，那種優雅，那種坦然清澈的目光也能早日降臨在窗外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

林口 印刷公司

彩色報紙 各型雜誌 宣傳刊物 大型海報

☎ : 718-937-5141

718-937-5301

🏠 : 50-22 23 ST.

L.I.C., N.Y. 11101

LINCO PRINTING CO.



廣州街頭一景

一九八七年七月，在我準備離開這個不管你怎麼掙扎都像處身於泥潭中的祖國前夕，抱着一種好奇，決定去南方的廣州走一趟，看看開放的南大門會給人一種什麼樣的感受。我希望在大陸最後的旅行，能夠給我一點振奮，一綫希望。

於是我乘坐中國民航來到了廣州市。在廣州待了三天，這裡比內地更活躍、更開放、更有生機，但卻沒有能夠給人多少振奮，也沒給我帶來什麼希望之光。

至今，廣州市還是不讓裝魚骨天綫收視香港的電視節目。羊城，畢竟還是社會主義的天，文化開放遠落後於經濟開放。

有趣的是，我三天的旅行，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街頭的騙局。

中國大陸——

街頭騙局

奇觀

石磊

第一天下午，我坐小巴士來到南方大廈，首先光顧新華書店，想看看這個城市文化開放的窗口——當然是一無所獲。

然而，在書店的門口，却有不少人手捧港版的「金瓶梅」在競相兜售。我上前去看，發現書是香港出版的，印刷也不錯，而且沒有經過刪減。書後港幣標價二十八，而販子的開價是人民幣四十五元。

我決定買一套送給上海的朋友。在上海街頭，想買一套這樣的書是不可能的。

經過討價還價，我們以廿元一套講定。那販子拿出一張報紙，將四冊「金瓶梅」包起來，裝入一個紅色塑膠袋，系好，遞過來，可沒鬆手。這一切都當着我的視線，書在袋中，絕對錯不了。

這時，那販子却說：「再多給兩塊錢吧，就兩塊。」我有點生氣，哪有說好了價又改悔的事呢？不買了，我轉身要走。

「好好，就二十，你贏了。」

我付了二十元，拿了書。

那販子說了聲謝謝，轉身走向路邊，然後突然跨過欄桿，跑向對馬路。這是怎麼回事？

我這時突然閃過一念，得看看那包書是否對。我用力撕破塑膠袋，拉開報紙，壞了，報紙中竟是一疊小學算術語文教科書，而且都是破爛不堪的舊書！

晚了，那販子已無影無踪。

我很不甘心受了騙，明白是在他多要兩元，而我轉身欲走時調了包。

那麼，這麼多賣「金瓶梅」的都是騙子嗎？於是，我走上天橋，遠遠地盯着那個角落。

果然，又看見一個顧客上當。原來邊上有幾個人，坐在街邊的椅子上，屁股底下都有一包包好的用來調包的假「金瓶梅」。所有販子都是一伙的。

可惡，強龍也難壓地頭蛇，受騙上當自己自然是不謹慎，認輸吧。

可我怎麼也弄不明白，為什麼魚骨天綫可以拆得一乾二淨，而馬路騙局却又那麼明目張膽呢？莫非這些騙子，可以被理解為對於「精神污染」的一種以毒攻「毒」吧。所以他們如此逍遙，堂而皇之。

第二天，又陷入一場更有組織性的騙局之中，不過我沒有受騙，而是與騙子們「玩」了一陣子。

在廣州動物園門口，一個十七、八歲的男孩上前詢問我：「電子表要嗎？兩元一隻。」

我答：「電子表不要，有撲克牌嗎？」我當然是指有裸女畫的撲克牌。

「有啊，你跟我走，就在前面。」
於是，我跟着走了二條街。

這個販子突然拍了一下路邊走路的一位中年人，問：「同志，電子表要嗎？」

「要。」那中年人爽快地答道。

於是，販子在前帶路，我與中年人在後一齊跟着。這位中年人看上去很像外地出差來廣州的採購員。我們閒聊着。

那販子又回過頭來，拿出一粒真空封裝的藥片，中年人見了立即興奮起來，大叫：「你有多少？這是好藥，能治胃痛，一吃就靈啊！多少錢一粒？」

販子說：「四十五塊。」

哇！這麼貴。

中年人竟拿出四張拾元，討價還價很快結束，四十元買下了那粒「神藥片」。

這可蒙不住我，我是學過醫的，沒聽說過有什麼進口藥片一吃就能治胃痛。我倒很為那中年人上當感到可憐。不過，也許那中年人沒上當，看他那麼自信，那麼老練，那麼懂行，也許真有那種藥呢！

接下去是販子稱回家取撲克和電子表，讓
我與中年人留在一個店門口等候。

等不多久，一位西裝領帶、滿頭大汗、手提公文箱的人上前來詢問：「請問環球藥品進出口公司在哪兒？」

「不會有這種公司，你會弄錯嗎？」我開口就答。中國的藥品進出口是國家統管的，名稱只會是地名、省名，加上一、二、三、四等等，不可能出現「環球」這種取名。這我是內行。

不過中年人比我更有生意腦子，一下子打聽出那人是雲南某醫藥公司的採購員。
下一幕活生生地展現在我眼前：

中年人以六十元的價，將那粒治胃痛的神藥賣給了雲南來的採購員。

然後，雲南人稱要大批的，手頭現金夠買五百粒。中年人讓他在對街等候。

小販子回來了，稱姐姐不在家，取不到撲克牌和電子表，而中年人的興趣在藥上了。

講到最後是：小販子叔叔那裡立即可取到二百粒神藥，因原包裝，不能散賣。以每粒四十元計，要價共八千元。

中年人將我拉在一邊，告訴我，他身邊只有四千元，若我能湊另四千，買下那二百粒藥，再立即出手給對面那雲南人，我和他各賺二千元！

進帳二千元，那我上海的朋友們可以印多少份民刊，不用冒風險去找人募捐，也不用乘天黑擺小攤了。

然而騙局已很清楚，那三個人是合伙的，靶子是我，買下小販子的藥後，雲南人會無踪影，中年人也會與我一起叫苦。

騙，那就大家騙吧！

我立即答應回酒店取錢，讓他們都別走。當然，我乘一輛的士，去別處遊覽了。

騙人的圈套，精心設計，還真是用盡心機呢。

騙子有時也會幹出一場令人痛快的把戲。我有個朋友，在單位辦公室被宣傳組的副組長

「捉姦」，其實也就是那些在大陸市區公園暗處到處可見的那些動作，可副組長揚言說：「你自己明天去向書記彙報並檢討，不要等後天我來揭穿，你自己考慮吧。」

盛氣凌人，下班時間還管閒事，一個小小的黨員竟可毀人一生的前途，得想個辦法阻止他。

送禮？也許打不倒他的官癮。

講情？也許改變不了他對組織的忠誠。來硬的？事情也許會一敗塗地。

怎麼辦？實在沒辦法。

他的垂頭喪氣，讓鄰居中的一個混混發現了，一打聽，原來是這麼回事。這個混混原也是在單位裡遇上了類似認真的幹部，後來混不下去了，才辭職出來混的。

混混為之不平，說了聲：「看我的。」就到機關門口守着那位副組長下班出來去了。

那副組長在車站上等車時，混混上前拍了他一下，說：「同志，你的表掉了。」手裡拿着一塊閃閃發光的金錶。

副組長一念之差，伸手來接：「是我丟的，謝謝了，這位同志，謝謝。」

與此同時，另一隻手接過手錶，只見那人仔細看了錶面和背面，又取出一張發票，說：「這明明是我丟的那隻金錶，看，發票還在，我正急得團團轉呢。」然後問混混：「同志，你真好，哪裡檢到的，你是什麼單位的，我要寫表揚信去你單位。」

副組長的臉一下子漲得血紅，然後變紫，最後變得灰白，冷汗爬滿額頭、手心。口中吞吞吐吐：「搞，搞錯了，我以為……對不起。」轉身想溜。

混混上前一把抓住他問：「好哇，我們邊上來講講清楚，想冒領！把工作證拿出來看看。」沒辦法，雖然副組長一口咬定自己也有那同樣的表，可還是拿出了工作證，怕鬧下去，圍觀的人一多，事情傳到單位裡去。

還好，事情沒鬧大，這位副組長蠻機靈，拿出二十元錢，說是給混混買兩包外煙抽，脫了身。

第二天，我那位朋友乘副組長一個人在走廊上寫通知，上前說：「聽說昨天機關門口的

車站上有人想冒領金錶，被人當場扣了工作證，聽說那人是我們單位的，你知道是誰嗎？」

副組長看了他一眼，遞過來一支煙，替他點上，說：「你呀，年紀還輕，要懂點事。昨天的事，你想過了嗎？今後要保證在辦公室守規矩，被別人看見了你就完了，懂嗎？」

我朋友沒明白，可也沒有有人以後為那天的事來找他的麻煩。為此，他請混混吃了頓飯，混混酒後吐真言：「我就是被這種人害的，才會落到今天這個地步，我已經幹了一年多了，專挑這種幹部模樣的人，這種人見了利還是收不住的，我與小老鼠搭檔，一次五張分（五十元），就這樣混日子。一次找上三個外地公安局的碼子，心裡很慌，可硬著頭皮上，還是進了三張分。」

在今天的社會裡，武俠已經成為傳奇小說，而「騙俠」也許可以找到自己的場子。

黑市換外幣，騙局也是不勝枚舉。許多學生、青年人為了考托福，付出國去日本的學費、報名費或去澳大利亞的自保金，紛紛到黑市上用人民幣換取美金、日元或港幣。黑市上的高價，對有些人來說實在是無從負擔，可高價換到真貨那還算是走運的呢！

有位急着要支付去澳大利亞學費的個體戶，在上海西藏中路市煙草專賣局門口搭上了免主，他們相談了幾分鐘，就到了人民公園門口的僻靜處去成交。免主看了他點完六千四百人民幣後，遞過來一只小包，請他自己裝入，拿在手裡，以防外人看見這麼多鈔票。然後清清楚楚地點十張百元面值的美金，放進一個白色信封。

正在這交換的一刹那，突然竄上來兩個人，急急匆匆地小聲說：「調令（警察）來了。」免主立刻把信封封住那個體戶手中一塞，奪過



你相信這種保證嗎？

險，有的可以完全不用擔心上當者會找你算帳。上海的靜安寺、玉佛寺門前，有大批的乞討者，往地上一坐，邊上放個碗，前面用石頭壓着一張紙，紙上寫着些諸如：文革時下鄉，已患上了癌症，家裡妻兒窮困不堪，自己又無錢看病等等，激起路上、特別是前去燒香拜佛者的同情與積德心理。殊不知，這些人大部分都在扯謊，很多是乞丐萬元戶，以此「集資」，在家鄉蓋起了高樓，買起了輕騎甚至卡車。

街頭鬧區叫賣便宜貨或特別玩意兒的人中，經常混雜着行騙者：

「自行車去鏽劑，不靈當場吞下去。」一開始的確效果極佳，可不久就銹斑更大、更深了。原來是浸過硝酸的石棉粉。

「全毛羊毛衫，出廠價，噁血拍賣。」原來是地下工廠出的暗綸製品，一洗，又硬又縮

「真絲女套裙」，真是「騙騙外地鄉下人」，明明是濼綸喬其紗。

「華佗再世，醫德高尚」的錦旗下，賣的是不會吃死也不會起作用的假藥，而錦旗出點錢可以請鄉鎮企業幫個忙。

目前的中國，騙子、騙局和受騙者，組成了一個相輔相成的社會環。雖然這是一個社會風氣日下，道德觀念敗壞的現象，可受騙者無處申冤，告到派出所，不但不能追回損失，反而引來一頓訓斥：「就是你們這種人去上當，所以騙子才會這麼猖獗！」單位同事會嘲笑你笨，所以受騙；領導更會從另一個角度把問題提到抽象的高度來評價你的政治覺悟與人格品質：你沒有資產階級貪圖利益的思想，就不會受騙；你不去追求精神污染的東西，就不會受騙。

所以，受了騙，最好還是吃了黃蓮裝啞巴

放滿人民幣的小包，說：「你快往那邊走。」個體戶一急，見信封提在手上，拔腿就走，連頭也不敢回。萬一被逮住，一千美金被沒收不算，還會有個處分記錄，倒霉時還可能進去幾天吃「鴿子飯」。

他走出兩條街，想看一眼換到手的美金，於是偷偷地打開信封，奇怪？這是什麼錢？信封裡全是面值為一萬元的中國錢，是哪個朝代的？仔細一看，原來是給死人燒的紙錢！上當，上當，辛辛苦苦賣掉生意拿來搏一記命運的本錢，全部化為烏有。後來他幾次糾集一伙兄弟去找那免主，終沒發現其踪。

然而，不是所有的行騙都要冒這麼大的風

廖主任，說話算數嗎？

——致僑辦主任廖暉先生的公開信

鄭源

而騙子，也有它的邏輯：「吹牛不犯法，騙死人不抵命，進了公安局，我們還是高級份子，審訊人員還會投以欽佩的眼光呢。」騙子的伎倆也有高低級之分。上海有個高級騙子，其案至今懸而未決。

一個因走私黃金而被捕入獄的人，在牢裡不甘寂寞，苦思冥想數月，終於計上心來。

他首先給公安局寫了封信，告發上海某民主黨知名人士，又是統戰刊物的主要負責人，是走私黃金的主謀。雖然證據不確鑿，可他還是得逞，被放了出來，由市政府某單位的人介紹，到那位知名人士身邊去當特別助理。

從此，他身价高了，利用手中掌握的汽車調配和報銷權利，過起花天酒地的生活。而政法機關爲了捕條大魚，也不顧此人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只想能盡快用他作爲「倒鈎」破案。

二年過去了，案情一點也沒破。而這個騙子，也不顧牽着他脖子的大繩，開始申稱自己是安全局人員。

這個人的妻子出於吃醋，終於忍無可忍，向那知名人士透露了他的真實身份和編造的案子。

知名人士訴訟了，騙子又進了班房，罪名依然是走私黃金。而有關知名人士遭到誣陷與誹謗一事，受理此案的所有律師，都被司法局告知：不要再過問此事了。

有位律師去安全局調查此案，安全局人員回答是：「此人冒充安全局人員，我們知道了，他以後再這麼做，我們不會聽之任之的。其他情況，我們一點不知道，無可奉告。」

騙子真是可惡，可也存在比騙子更可惡的事情，使騙子社會迸出一道異光。

廖主任：

您好！您來訪紐約引起了華僑各界的關注，一場記者追隨報導的旋風在大都會紐約各界的中文報紙上颳起。世界日報、華僑日報、星島日報十一月二十七日關於您在紐約中國總領事館召開的記者招待會的詳細報導使我極感興趣，作爲民聯的普通成員我對您在會議上所表現的政治家的寬宏氣魄和胸懷大度表示敬佩，其示出有三：

其一：中國民聯是以和平對話的方式去爭取實現民主的群眾組織。爲此她多次要求與中國領事館官員交換觀點，進行對話。令人遺憾不解的是，歷來領事館工作人員把民聯代表拒之門外，不予對話；更有甚者，還有毆打、謾罵者。他們的做法在美國這塊民主、自由的土地上，只能遭到斥笑！而這次記者招待會，當丁楚自報是中國之春的名號時，您並沒有顯得如臨大敵，或者像以往領館的惡劣手法把人趕出去！而是耐心聽取了楚的發言，耐心地回答了他的問題。

其二：當丁楚提出，國家僑委對通過政治庇護手段而獲得綠卡的新移民如何對待時，您的回答是在您的腦海中沒有政治避難的概念，不管經過什麼途徑變更身份而成爲新移民，國家僑委會按照僑胞對待，因爲僑民政策只有一個。看來您的這番話可能會被認爲界限不清、立場不穩，在場的副總領事竟搶過話筒，惡狠狠地說：「我們對政治避難而成爲的新移民，一律不予承認！」毫無疑問，這位副總領事

的發言是大部份共產黨官僚老爺的想法和做法！但這並不等於您的看法，您又進一步闡明了自己的觀點，針鋒相對地說：「再說一遍，我腦子裡沒有政治避難的概念，即使是隨團、隨隊來，以投奔自由或反對專制爲由而留下的人，我們相信，一代兩代相傳，他們對祖國的眷戀之情還是常在的。」

這番話說的很好。我認爲要求政治避難的人並不是不愛國，他們只是現在摒棄共產黨的領導、反對一黨的專制和獨裁，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人對自己的祖國和人民充滿着深沉的愛。如果共產黨拋棄四項基本原則，給人民以民主、自由；給中華民族以希望，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份會回歸到祖國母親的懷抱中。

其三：您的坦率、開明大度獲得在場的民聯代表鄭爲民的好評，並希望您能言行一致。鄭拿出曾經被紐約總領事館無理退回的中國民聯給北京和平統一促進會的一封信，托您代爲轉交。您爽快答應。能當着紐約報界記者和領事館官員的面答應替中國民聯轉信，這也使作爲民聯普通成員的我深爲感動。我們希望對話能夠開始，堅冰能夠打破！

敬佩之餘，頗多疑問，對這封代爲轉交的信更爲之擔心。共產黨的官員說話不算數者居多，自食其言者也就多！不知廖暉主任說話到底能否算數？！

禮！

致

鄭源

「二進宮」收容所今非昔比

(日本)孫力

偶然在友人那裡見到一本八八年六月號「中國之春」雜誌，署名劉存的一篇「北京監獄的囚犯」，勾起我努力忘却的許多往事。惡夢連連，汗流浹背。我願提供若干真實情況拋磚引玉，希望熟悉北京市公安局內幕的人們相繼拿起筆來。

一九八三年八月六日晚，我在親戚家裡觀看表弟搞來的幾盤日本成人錄相帶。一共六、七個人。有男有女。大家隨意交談，隨便吃些冷飲。大約十點多鐘，大難臨頭。全樓突然停電，室內一片漆黑，窗外傳來雜沓的脚步聲：「片刻，有人叩門。是本地派出所的片警（責任區警察）、本樓治保主任以及一些身份不明的人。電燈復明之後，這些人已站在客廳裡，手忙腳亂地擺弄錄像機，剛才因停電而卡住的鏡頭——性愛畫面——清晰地映現出來……」

我們面紅耳赤，有些無地自容。
片警胸有成竹地說：「到派出所去一趟吧。」

於是我們被帶到了甘家口派出所。正是大逮捕的高潮，派出所裡燈火通明，耀如白晝。牆根下，站着、跪着一排排被捕者。打人、叱罵之聲不絕於耳。

我們剛剛走進去，就聽片警喊了一句：「抓住了！北京市最大的流氓集團！……」（後來，我發現這是一句套話，凡抓來人，都說是「北京市最大的××集團」。完全是信口雌黃。

我還沒回味過來，腦袋上便吃了一記重拳，登時天旋地轉……接着又是左右開弓的大嘴巴！「我叫你流，我叫你恨！他媽的……」

我被打懵了，喊不敢喊，叫不敢叫，只能活受。暴打過後，渾身疼不可當。臉上淌着熱乎乎的什麼東西，我抹了一把，是鮮血。

我在派出所裏被關了幾天，挨了好幾頓痛打。警察和聯防隊員大多是虐待狂，一天不打人，便手心發癢。他們想打誰便打誰，無需任何藉口。例如：警察規定關在一起的被捕者不得交頭接耳，有人違規，警察們便衝進來，用棍棒和皮鞋教訓全體被捕者，不分青紅皂白。一邊打，一邊怪聲嘻笑，彷彿是一種千金不換的享受……

我是一名助理工程師。在廠裡正參予一個技術項目。被捕之後，還一直惦記着這件事，希望具結悔過，早了事。我對片警說：「××同志……」他勃然變色：「什麼銅志鐵志？！」

「話到手到，一拳將我們打倒在地！」派出所不是正式拘禁單位，所以某些方面比正式看守所稍強一些。一日兩餐，飯食與常人概念中的「飯菜」相去不遠：白面饅頭，醃白菜幫子等等。偶而還見肉末肉星。

幾天後，我被送到海澱區公安分局拘留所，說是「收容審查」。這是八三年「嚴厲打擊刑事犯罪運動」中統一使用的措詞，在這個幌

子之下，刑事訴訟法的有關拘留、逮捕的有關規定完全成了一紙空文。警方放手捕人、拘人，隨心所欲。

這是我第二次進公安局，用行話來說叫做「二進宮」。巧得很，兩次都是海澱分局拘留所。時間相隔十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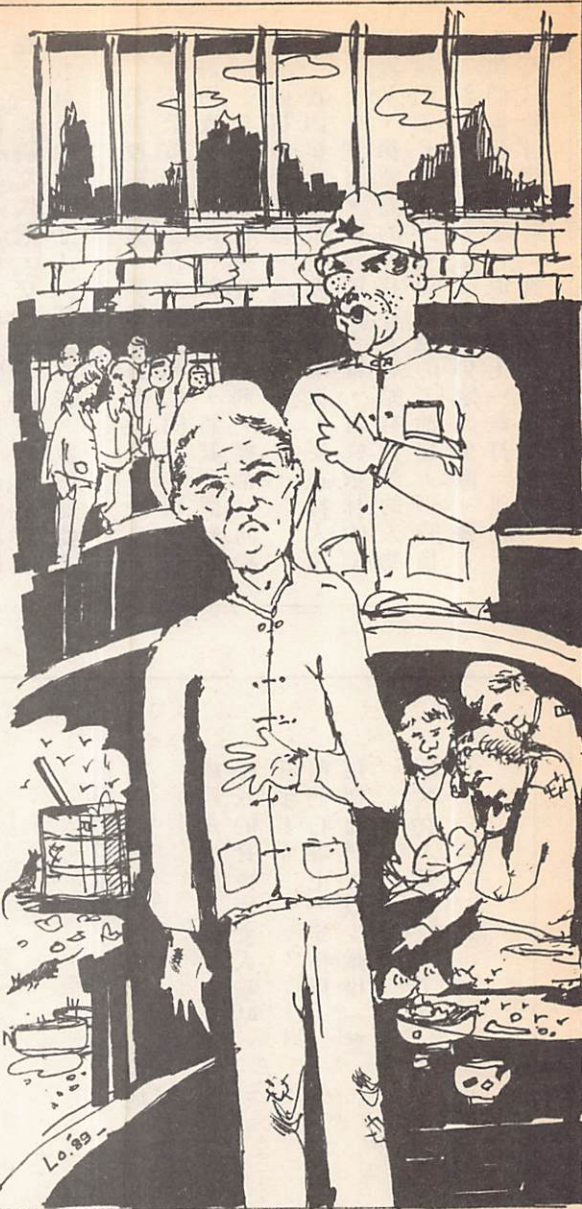
文革初期，我還是一個頸上繫着紅領巾的初中一年級學生。什麼都不懂，跟着高中學生瞎起哄。人家印好了反中央文革的傳單，我們幾個傻毛孩子騎着自行車滿街亂撒，結果被抓了起來。

現在提起文革，總是說那是無法無天的十年浩劫。可是，就我的親身經歷而言，文革班房比八三年班房文明得多。前者或多或少地體現出共產黨冠冕堂皇的改造政策，後者則不折不扣是人間地獄。

我記得很清楚，文革那回蹲分局，呆了三個月，總共只挨過兩次打。第一次是入監時，警察搜身發現我身藏一把沒有開刃的藏刀，狠狠踢了我一脚；第二次是牢房裡一些幹部子弟高唱國際歌，讓我起頭（我嗓音比較嘹亮），結果被看守所狠狠揍了幾下子。僅有這兩次。

那時候，看守大都是現役軍人，很注意「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從不輕易打罵犯人。入監第一日，我按規矩去留十指指紋備案。當一位青年看守在我雙手塗了墨汁後，我不禁熱淚雙盈——依中國大陸的說法，這叫個人經歷有了污點，只怕一輩子也洗不去了……青年看守見狀嘆了口氣說：「我看你樣子挺聰明，家庭條件也不錯，幹嘛跟着反革命跑？……」完全是講道理的口吻。

那時候，二十幾個人擠在一間十幾平米的牢房裡。雖然也很不舒服，却還可以忍受。牢房裡並不很髒，在押犯人輪流做值日，清掃地



面，擦淨鋪板。當然，討厭的虱子捉不勝捉，牢房是它們的安樂窩。

那時候，伙食還過得去。一是由於物價很低，大師傅有周施餘地，二是海定分局係全市公安戰線的紅旗單位，不苛扣犯人伙食費。我記得，金黃色的窩窩頭配上醬豬肺燒白菜是最常吃的牢飯，滋食不錯，一個星期吃一次細糧，有時是大米飯，有時是炸醬麵。倘若在押犯裡有回民，則用雞蛋代替豬肉改善生活。

那時候，預審員多少有些水平。他們很少說粗話，一般也不動手打人。有一回，我跟一個王姓預審員嘴來嘴去地頂撞起來，他只是喝令我起身離開板凳，到牆角罰站片刻。

那時候，只要不是天氣惡劣，總可以出去放一會兒風。晒晒太陽，呼吸新鮮空氣，與熟人遙遙相望，互相傳遞眼色和微笑。有些把蹲監獄當成家常便飯的老油條甚至借機以手勢和隱語串供。放風時間，常被看守所負責人用來

訓話。他通常是指名批評各監房裡不守監規的犯人，然後微微冷笑着說：「鬧監有什麼用？就算是把牢房頂通塌了，外邊不也是共產黨的天下嗎？！……：……：……：如果說「君子動口不動手」，那麼他可算是一位真君子。」

那時候，每個月可以洗一次澡。看守所裡有個大澡堂，先去的洗清水，後去的洗混湯。記得有次洗澡，我一邊往兩腿之間抹肥皂一邊賊看守：「報告班長！拉稀求茅（意即希望增加一次去廁所大便的機會）！……：……：看守見我這個觀之不雅的舉動（這個動作可解釋為對他個人的侮辱）只是狠狠地瞪了一眼，沒有打人也沒有罵人。」

那時候，一個半月可以理一次髮。看守將手推理髮剪子、白單布等物送入牢房，讓犯人互相剪理。

那時候，犯人可以給家裡寫明信片，索要諸如洗衣粉、廁紙之類的東西，並附短言誑報

平安。雖然明知是瞎話，對牽腸掛肚的親人却也是個安慰。

八三年「二進宮」的情況則完全兩樣。所謂「嚴厲打擊刑事罪犯」運動實際上是「嚴厲打擊刑事罪犯」，減一字更加貼切。一進看守所，警方便大打出手，被打者既有罪行累累的惡人，也有嫌疑份子、業已洗手的失足青年；以及無辜者（例如抓錯的同名同姓者、罪犯家屬等等）。有兩兄弟違反交通規則被扣，亦遭警察毒打。

由於犯人數量激增，牢房裡擁擠不堪。我所在的那個號子裡，最多竟關了近六十個人。人挨人，人擠人，有時連屋角的尿池上也站着人。大家只好協商倒班睡覺，一半人前半夜躺着，另一半人後半夜躺着。非睡眠時間，只好抱腿坐着，甚至倚牆站立。

夏日炎炎，牢房裡溫度超過體溫，常有體弱者暈倒，報告看守反遭斥罵。跳蚤橫行，臭蟲猖狂，把人咬得死去活來。

囚飯之糟，跟豬狗食差不多。囚犯人隨時增加，常出現僧多粥少的情況。菜湯裡從不缺少死蒼蠅這道佐料。

每天清晨「放茅」，時間卡得極死。不管你是不是解完大便，只要一聲吆喝，你就得提褲走人。否則便是一頓拳打腳踢。

沒有洗澡的機會。屋角有個水龍頭，總開關掌握在看守手裡。只要他不高興了，便截斷水源。犯人身上的瘡疔癬疥在這樣骯髒的環境中日益惡化，臭氣薰天。

取消了放風制度。一天二十四小時，像沙丁魚一樣擠在囚室裡。因生存空間過於狹小，犯人之間常常爆發發口角甚至打鬥，看守非但不予勸阻，還隔着鐵門上的監視孔大聲叫好：「打！打！打死一個少一個！……：……：……：」

看守以及預審員毫無政策水準，他們以打人為樂事，隨便尋個藉口，甚至有時候什麼藉口也沒有，便把你拉出去打一頓。有一回在預審過程中，我的回答使對方不甚滿意（主要是觀看X級錄相的動機等），預審員便繞過桌子，用電警棍給了我一下子。我只覺得渾身麻疼，比裂骨剝筋還難忍受！我只得屈打成招，胡亂供認。

在看守所裡，每個干警都有一根電警棍。本來，公安機關關於使用電警棍有着嚴格的規定。一搞「嚴打」運動，這些規定統統作廢，電警棍成了干警們取樂的玩具，有事無事便拿出來玩耍一番，他們最喜歡電犯人身上的兩個部位：嘴和生殖器。常常是犯人哀嚎、打滾，干警哈哈大笑。

海淀分局預審科負責人葛某，是一個披着警衣的大壞蛋。他原是中關村派出所所長，靠造反起家。這傢伙打人兇狠，活像一個閻羅王。爲了誘供，他不擇手段，開口閉口都是流氓腔：「你快交代吧，交代完了我要是還不放你，我就是你的孫子！（或者：你×我的姥姥！）……」

葛某壞事做盡，到頭來終有惡報。後來，北京市公安局派工作組調查他的問題，揭出包括奸污女犯在內的一系列罪行，將其判處有期徒刑七年。葛某在茶淀農場服刑，經常被同場犯人摸得鼻青臉腫。這是後話。

我因案情簡單，僅提審兩次，便被打入冷宮，不予理睬。在我的號子裡，有姚依林的侄子姚某、徐特立的外孫林某等頗有背景的人物。他們都是早在公安局掛號的老油條，平時橫行不法，出出進進公安局好似家常便飯。警方拿他們也沒有辦法。但一趕上「嚴打」運動，二人只得自食惡果。他們挨打挨得最重。

林某因受不過折磨，只求一死解脫。有一次看守用電警棍打他，林某大吼一聲：「我不想活了！」就以頭撞牆，血流滿面。看守見他真心尋死，反倒有幾分害怕，從此不再毆打林某。林某之妻是北京有名的潑婦，也被關在海淀分局的女牢裡。雖然有了身孕，還是挨了許多打。

我在海淀分局蹲了半年多，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後來因打擊高潮已過，我父母又托了一位曾任市公安局長的副市長，才重獲自由。

孤獨

朱凌波

因爲習慣孤獨
常常走在人們的前頭 遠遠地

或許那些男人
在我的身後與女人嘀咕
但我相信
他們心理上一定情願
這樣他們可以少承擔一些
那些女人却忍受不了啦

爲了證明她們是人
更爲了證明她們的男人
扭動魅力走到我的前頭

這時
我只能裝傻地一笑 退居後頭
一直退到
所有人的後頭 遠遠地
我這個人有點怪
要麼走在最前頭 遠遠地
要麼走在最後頭 遠遠地

出來時，體重不足百斤，頭髮脫了不少，後經檢查還發現患了肝炎、高血壓。不過，我總算撿了一條命。

出國後，我總想把自己的經歷一五一十地寫出來，盡可能不加評判，不置臧否。可惜我對於寫作實在生疏，就遲遲沒有動筆。現在，我把這本流水帳公之於衆，希望大家對一九八三年「嚴打」運動中的大陸監獄增加一點了解。

新三民主義·

歷史的彌天大謊

楊農

一、前言

最近「中國之春」刊載黑馬君的著作，對於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發生的「五四運動」再做反思，用功極深，是很有見解的文章。黑馬君在討論到蘇聯十月革命對當時中國的影響時，是使很多知識份子普遍轉向。這是事實，連孫中山都多少受到影響，問題是影響到什麼程度。迄今，國民黨的體質仍有蘇聯共產黨的烙印。

但是，黑馬君提到：孫中山放棄「舊三民主義」而提倡「新三民主義」，措詞激烈地批判資本主義式的民主，把西方民主視為壓迫平民的工具，稱議員為「豬仔議員」，並全力主張蘇聯式的民主。我不知道黑馬君是根據何種歷史文獻，而下此論斷。我想以本文和黑馬君討論。

我猜測黑馬君是接受過共產黨歷史教育的大陸學者，因此有必要先提出共產黨對孫中山國民革命的看法。

二、共產黨的看法

按照共產黨的史觀，孫中山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先行者，辛亥革命是不徹底地資產階級的

民主革命，中國國民黨是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孫中山接受蘇聯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建議，以及和中國共產黨做了朋友，得到他們的幫助，改組了國民黨，使得孫中山和國民黨在思想上及行動上起了新變化，這些變化促成國共合作的可能。故有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孫中山發表國民黨改組宣言和黨綱草案，確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繼有一九二四年元月二十日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並通過大會宣言。這個宣言是由共產黨人直接接參與制訂的。宣言中提出了民主革命的新綱領，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特別重要的是，孫中山在這個宣言中重新解釋了他的三民主義，他把「舊三民主義」發展成為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義」。

這可能是前引黑馬君的見解之所本。簡言之，「舊三民主義」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新三民主義」是「三大政策」和（或）加上反帝、反封建。這種簡單化或教條化的歷史說法，因共產黨在中國大陸長期地對各種資訊的全面壟斷或嚴密檢控，即使錯誤也會成為人民腦中的必然正確；若無外來資訊的對比和刺激，常使大陸出來的人被誤導。這種例子曾在「中國之春」上出現過多次，常有美

籍華裔學者挺身糾正。

篇幅所限，我僅提出一些例證以說明無所謂「三大政策」，並簡述三民主義無新、舊之分。這些名詞或概念都是共產黨後來提出來的，在孫中山生前未曾存在過。

三、三大政策的來源

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澤東曾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這篇宣言，區分了三民主義的兩個時代。在這以前，三民主義是舊範疇的三民主義，是舊的半殖民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三民主義，是舊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是舊三民主義。在這以後，三民主義是新範疇的三民主義，是新的半殖民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三民主義，是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是新三民主義。只有這種三民主義，才是新時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這種新時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沒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時期中，就都是偽三民主義，或半三民主義」。在此，毛澤東區分了新舊三民主義，並且認為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有「三大政策」，但事實不然。以下筆者依着時間的倒序，逐次論證史實，而不涉及史現。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日汪精衛和鮑羅廷合作的國民黨武漢政權公開提出「三大政策」，即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同年的四月五日，汪精衛離開上海到武漢之前，曾和陳獨秀在上海發表著名的「汪精衛陳獨秀聯合宣言」，在宣言中，汪精衛把孫中山的「容共」政策改為「聯共」政策。

事實上，首先喊出「三大政策」口號的就是鮑羅廷。這出現在一九二七年元月十一日，



成立與中會

軍事北伐途中，鮑羅廷在武昌總司令部歡宴蔣介石席上說的：「今日能夠得到武漢，今日能夠在這地方宴會，是誰的力量呢？並不是因為革命軍會打仗，所以能到這裡的，乃是因為孫中山先生定下了三大政策，依着這三大政策做去，所以革命勢力才會到這裡的。什麼是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呢？第一是聯俄政策，第二是聯共政策，第三是農工政策」。這是「三大政策」。這是「三大政策」的名詞和名目的首次出現。

就在一九二七年元月三日，共產黨「上海區秘密通信第七號」（即中共中央之通令），曾出現「三個政策」或「三個革命政策」之概念和名詞。該通信這麼說：「我們要記得：從興中會到現在的國民黨，他們的進化是有時間性的。所謂左右，乃比較之詞，並沒有固定的界說。社會的左右派，和一個政黨內的左右派既然不能混同；贊成解決土地問題的是國民黨左派，現在又還未成胎。所以只好承認一些贊成孫中山、廖仲愷的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三個政策的分子是左派，反對者是右派」。

該通信又這麼說：「我們幫助左派領袖，和我們合作的條件；他們固然要繼續孫中山、廖仲愷的三個革命政策；我們也須要顧及他們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對他們有所讓步」。

更早可追溯到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日，陳獨秀在「響導週報」第三十七期發表的「什麼是國民黨左右派」一文。他是這麼說：「左派懂得要實現反對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國民革命，國外有聯合蘇俄，國內有聯合工農階級及共產黨之必要；右派則反對蘇俄、反對共產黨、反對工農階級利益的爭鬥而失其同情。左派爲了要實行三民主義，便不得不採聯俄與共產黨合作，不反對階級鬥爭這些實際需要的政策」。

由此觀之，當時陳獨秀已有「三大政策」的觀念和名目，但仍未出現「三大政策」這個名詞。

這是迄今所能查到與「三大政策」有關的思想和名詞的最早期資料，但都是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孫中山逝世以後才出現的。

今天，我們查遍涉及孫中山的各種資料，包括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之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和一九二四年元月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都找不到所謂的「三大政策」。也沒有直接或間接證據顯示，孫中山和國民黨曾制訂過「三大政策」。難怪美國學者韋慕廷（C. MARTIN WILBUR）說：「當時鮑羅廷喊出三大政策，我們只聽到他和共產黨在喊，沒有聽到孫中山對這三大政策作過說明，也沒有在演講中提到這個主題」。當時孫中山已死了兩年，連聽都沒聽過這個名詞，又如何說明起呢？

四、三大政策的批駁

在軍事北伐途中，鮑羅廷提出「三大政策」後，共產黨，甚至國民黨左派如何香癡、徐謙等，無不隨聲附和，使得當時的武漢只有「三大政策」的宣傳，而無人敢再提起三民主義，直到國民黨左派在上海清共和其左派在武漢分兵。

「三大政策」這個名詞，不只共產黨喊了六十多年，連反共的國民黨人也誤認爲此「三大政策」爲孫中山在一九二四年改組國民黨所確定的政策（一九八四年以前如此認爲）。其實，早期也有國民黨人一再反駁過，但鮮爲人注意到，可見國民黨過去缺少有歷史知識的能人。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二日，胡漢民在清黨二週年時曾爲文指出：「在本黨正要清黨的時期，有人造出一種口號，大喊總理有三大政策，一、聯俄，二、容共，三、扶助農工。扶助農工一層，確是總理所定的政策，……至於容共、聯俄與主義有什麼關係？共產黨那裡曉得自己不容於中國國民黨，只好硬着頭皮提出這個不倫不類的口號來，一面抵制本黨，一面做自己的護身符。他們以爲既說容共、聯俄是總理的 policy，本黨同志便不能違背了；違背了就不是總理的忠實信徒。這實在太欺負我們了。」

對此「三大政策」的批駁可回溯到更早的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顧孟餘在武漢國民黨中央會議上的發言。他這麼說：「國民黨在歷次的宣言中，本來是有許多政策。但外間宣傳的所謂三大政策，却找遍了總理遺教、歷次宣言，以及各種決議案，找不出這麼一個東西。實在是，三大政策的歷史很短，不過只有七個月。何以知道只有七個月呢？因爲三大政策的內容，在七個月以前還沒有定。今年正月，本席由西江到武漢來，才聽有鮑羅廷同志說起三大政策，並勸大家要遵守；而那時他所說的三大政策是反帝、聯俄、農工，同現在天天嚷的不同。可見得三大政策的內容，在正月時還沒有定，而且未經任何會議決定，是共產黨替我們想出來的。於是各軍政治部、各報館、各團體的宣傳，只有三大政策，絕不提三民主義」。

現在的證據顯示，確實是共產黨替國民黨想出來的，但是在孫中山逝世以後，而非國民黨改組或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至於共產黨因何提出「三大政策」且又硬把它和孫中山掛上關上，則是另一個大問題，不在本文討論範圍。

五、孫中山沒有改變

前述的論據顯示，在孫中山逝世前，不論國民黨或共產黨都沒有所謂「三大政策」公諸於世。當孫中山在世時無所謂「三大政策」，則毛澤東和共產黨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區分爲新和舊，也就沒有邏輯上的關聯性，也失去學術價值，就只剩政治意義。故而，也就無黑馬君所說的：孫中山放棄「舊三民主義」而提倡「新三民主義」。若硬要說有「三大政策」，那也只是政策而非主義，只能說孫中山爲了革命須要，在行動策略上有所變化，而非其主義思想有變化。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後的中國，西方各種主義思潮氾濫，馬列共產主義也進入，加上蘇聯十月革命的刺激，是使很多人轉向，但孫中山並未改變其一貫的主義思想，即追求西方的民主。蘇聯十月革命及其發展對孫中山的影響是孫中山接受蘇聯的援助，但不贊同共產主義甚至蘇維埃制度引用於中國。此可由一九二三年元月二十六日，孫中山和蘇聯政府代表越飛聯合發表著名的「孫越宣言」得到證明。該宣言這麼說：「孫逸仙博士以爲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使此項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實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爲中國最重要最急迫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並向孫博士保證，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摯熱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爲依賴」。

其實，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曾提到「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爲

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或爲壓迫平民之工具」。但這是指出西方的代議民主尚不圓滿，故要改變設計以矯正弊端，並沒有否定近代發展出來的民權制度。孫中山對西方代議民主是有批評，但決未否定，而且一再強調民權時代的來臨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孫中山所講的民權，就是民主。

又孫中山曾在一九二四年的民權主義演講中這麼說：「近來俄國新發生一種：『人民獨裁』的政體。：我們得到材料很少，不能判斷其究竟；推想這種『人民獨裁』的政體，當然比較『代議政體』改良得多」。可見當時孫中山尚不明白「人民獨裁」是什麼，只能推測它比「代議政體」改良。但仍看不出孫中山一頭栽進「全力主張蘇聯式的民主」，而且，在他演講民權主義時已有一套堪稱完整的制度設計，諸如五權憲法，其基本是建立在西方的民主理論。又一九二三年孫中山曾在他所著的「中國革命史」這麼說：「余之民權主義，第一決定者爲民主，而第二之決定，則以爲民主專制，決不可行」。

即使孫中山死前的遺囑也看不出他有任何轉變。他的遺囑這麼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因此，如果查閱孫中山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文言本或演講本三民主義，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都找不到孫中山「全力主張蘇聯式的民主」之思想。

孫中山的遺囑是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擬好的，而他於逝世前一日簽名。在他死前的最後一刻是說了「和平奮鬥救中國」，仍看不出有何轉向。

沒有流動， 也不會有現代化

貴刊第六十一期上登載的房志遠的文章「沒有流動就沒有安全」寫得相當精彩。我認為這個涉及到人的流動和選擇的問題，還可進一步同經濟發展和政治變革聯繫起來，作進一步的探討。

許多西方學者在研究傳統社會向現代化過渡時都指出，人的流動（地理流動和社會地位變動）是一個社會現代化的必要前提之一。沒有這種流動，就談不上工業化、現代化。而中共從一九四九年掌權以來，先是實行戶口制度，將農民固定在土地上，阻斷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而後又在某些大城市上設了種種限制，連從一般城市向大城市（北京、上海）的流動都卡死了。在職業的選擇上，中共大力強化社會分工，宣傳「扎根」思想，動不動就是「要一輩子扎根農村、邊疆」或「樹立當一輩子清潔工的思想」。總之，是要人們「為革命而幹一輩子某某工作」。而對這某某工作的選擇，又不是根據個人的興趣、愛好和能力（那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而是要人們「願做革命一塊磚，東西南北任黨搬」，或是作一顆螺絲釘，「黨擰到哪裡，就在哪裡一輩子閃閃發光」。

應當指出的是，這種「服從分配」的要求

，並不只是道義上的提倡，而是帶有相當大強制性的。這種極力壓縮個人選擇範圍，逼使人們做各種一生不能改變的「一錘子買賣」的作法，極大地挫傷了人們的勞動積極性。大概中共以為，斷絕了人們的其他想頭，抄了人們的後路，人們就只有腳踏實地在農村、邊疆、清潔隊幹一輩子。按着這一邏輯，被剝奪了一切選擇權利的奴隸，應該比這山望着那山高，隨時可以「跳槽」的僱傭工人創造出更高的勞動生產率了！如果是擔心某些工作沒有人做，這種政策的效果也是適得其反。只要放開勞動力市場，絕不會出現無人幹的行業。而且對於某些職業（如清潔工），越是弱化它的正規性、職業性（如改成非全日制），就越會有人做。從縱的角度看，沒有人一輩子幹清潔工，從橫的角度看，社會上總有人幹清潔工。

著名經濟學家F·海耶克認為，經濟發展給人們帶來的福利的增長，主要表現為個人選擇範圍的擴大。阿蘭·G·格魯奇也認為，區別各種經濟體制的關鍵點是「私人的積極性範圍」。還有的學者指出，歐洲在十一世紀時出現的農奴以現金繳納年度稅的方式贖買「捐稅

」義務，首次獲得了全部佔有個人勞動力的權利。這種對自己勞動力的第一個「所有」是現代權利的真正鼻祖。它極大地調動了個人的積極性。中共長期以來實行的勞動人事制度，是以行政強制手段，剝奪了原屬於個人的勞動力，極大地壓抑了人們的生產積極性，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大障礙。這一點在改革中已有所突破，如對科技人員給予有限的流動，放寬農民進城謀業的限制等。但對從根本上改變這種人事制度，則既無全面系統規劃，也無理論上和精神上的準備。這裡面的原因不全是經濟上的。因為對中共來說，單位不僅僅是經濟活動或文化事業組織，也是對社會成員進行政治、思想和人身控制的組織形式。改革這一制度，牽涉到敏感的黨對社會生活的控制問題，也觸及到上百萬政工、人事幹部的利益問題。一旦人們能夠根據自己的興趣和專長選擇職業，而單位又是根據專業的需求來選擇人才，單位作為政治控制形式的力量必將大大削弱。對於連人們的業餘文化生活都要「提到黨委議事日程上」予以「安排」的中國共產黨來說，這無疑是一道難過的關。

然而，許多研究現代化現象的學者早就指出，雇主與雇員之間關係的「功能化」，即呈現單純的勞動力——工資交換關係，是現代化社會與傳統社會的重要區別之一。雖然日本的企業由於文化傳統的影響而表現出某些獨自的特點，但在不具備政治思想控制功能方面却並無例外。中共如致力於中國的現代化，必須破除舊的勞動人事制度，讓市場來決定流動。由此而來的經濟理論問題和黨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等等一系列政治問題，都是對中共的嚴峻考驗。

不必要設黨政治局·權力鬥爭妨礙「改革」

——採訪中國政治理論家嚴家其教授

〔日本〕高今航譯

〔日本〕「讀賣新聞」本田記者

中國著名的政治體制改革青年理論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的嚴家其教授，最近參加了在夏威夷召開的國際學會之後，歸途中在東京停留並接受了「讀賣新聞」記者的採訪。嚴教授作為中國現行憲法中規定的「廢除幹部終身制」條文最早的提出者而聞名，他還提出了「政府工作責任制」等主張，成為活躍在政治改革第一線的理論家。嚴家其教授在批評了政治改革最近的停滯狀態之後，提出由於經濟改革搞得不順利，所以才不能下決心大膽地搞政治改革。他認為「作為政治改革，必須解散凌駕於政府之上的另一個「政府」——

（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了大膽的見解。

本田記者與嚴家其教授的對談如下：

問：應怎樣看待政治體制改革的現狀？

答：現在，為了使中國正在進行的現代化得以實現，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必須同時進行。但由於經濟改革搞得並不順利，所以遲遲不能下決心大膽地進行政治改革。另外，因為通貨膨脹、分配不公平、官僚的腐敗、教育工作者地位低下等問題的存在，使得人民群眾對於改革的不信任感加深。為解決這些問題，有必要暫時把市場經濟的一部份轉回到計劃經濟上來。

問：這會不會導致改革的後退？

答：為實施市場經濟，必須具備所有權的

明確化、公平的競爭法則、契約的秩序等三個條件，然而現在在中國連一項也不具備。因此，不顧一切地向市場經濟方向推進，就會產生各種各樣的混亂，引起人民的不滿。為了安定民心也必須返回到計劃經濟上來。

問：政治改革的障礙是什麼？

答：可以舉出兩個例子來：一個是政治體制的問題。許多領導者對工作和社會不負責任，僅僅考慮在權力鬥爭中如何保住或擴大自己的權力。其根本癥結在於集體領導這個問題，什麼事都依賴集體，使得個人的責任變得明確。

另一個是思想問題，即由於舊的意識形態的束縛，使人不能正確地認識現實。只有鄧小平例外，只有他可以大膽地表達自己的想法。黨、政不分、集體領導等現狀，致使權力鬥爭不可避免。迄今為止，權力鬥爭在妨礙着社會主義的發展。如果中國再次重復發生類似「文革」那樣權力鬥爭的話，將會變成亞洲最落後的國家。

問：你希望黨政分離應採取何種形式？

答：共產黨凌駕於政府之上，成為另一個「政府」的情況必須改變。明確地講，（凌駕於政府之上，具有特權的）黨政治局必須廢除，並且，如若黨的幹部兼任行政領導職務時，必須站在行政官的立場上。

問：多黨制的可能性如何？

答：根據現狀來看，還未達到成立反對黨的階段，黨內的民主化是先決條件。

問：那麼你認為要推進經濟改革，首先需要做些什麼？

答：對於財產權必須更明確地在憲法上正式予以保證。說到財產權，往往使人認為究竟是屬於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問題。其實這不外乎是個保障公民權的問題。

中國的財產分為私有財產、公有財產、財產權不明確部份等三種。私有財產的情況：個體經營者通過經營即使獲得利益，也對保留私有財產缺乏信心，認為留在自己手中有危險，所以不是去消費掉，就是捐贈了。

對於公有財產，正被一些所謂「官倒」的官員不正當地侵占，然而這種現象並不僅限於政府官吏，一些普通勞動者也一點一點地裝入自己的腰包，而帶回家去了。

第三種就是不明確部份，這就是私有企業從利潤中扣除工人工資、福利等之後剩餘的部份。由於不明確該歸誰所有，管理上十分混亂。三種財產都未能利用於再生產投資，這對經濟的發展有很大阻礙。有人擔心，大幅度承認私有財產權會引起貧富之差，但這可以通過政府的政策，特別是稅利上的調整加以解決。■

不怪黃河、不怪共產黨、

不怪人民，該怪中國的知識份子

——與胡平和丁楚商榷

辛立林

「河殤」評點黃河，菲薄古今，其剖析中國大陸現今貧窮、落後和愚昧的根源，不可謂不深刻。但平心而論，黃河之造地毀地，益民害民，皆天設地造，只能用利治害，無從怪也不該怪；中國幾千年皇權的殘暴統治，到中共已發展到頂點，現已幾乎把中國人民推入了萬劫不復的災難之中——對共產黨，只能促其下台，或趕其下台，恨也無益，怪也無益；那些當初為溫飽而把中共捧上台並授之以生殺之權的中國百姓，現今衣食不足而至榮辱不知，論其處境，實乃可悲，可憐，又何忍怪之？

以筆者愚見，真正該怪的是中國近代和現代的知識份子及其精英。

工人靠做工吃飯，農民靠種田吃飯，即使其他事情皆不懂，亦可心安理得，無可苛責。但如果知識份子，特別是那些號稱以天下興衰為己任，以研究社會、人文等為職業的知識份子，而不能正確地洞察歷史，分析現實，預知未來，則至少該被認為是「白吃飯」的了。

必須承認，歷代的人民造反，其起因或是官逼民反，或是因飢荒無法生存而反，都是一

種盲動的力量。這種力量，可以像中國一樣，屢被毛澤東式的獨裁者所利用，而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中國封建奴隸制的循環；也可以像美國早期歷史一樣，被傑佛遜、富蘭克林那樣的知識份子所引導，而建立起美國這樣的民主社會。

中國的悲劇不在於沒有美國建國前的肯為飢餓和不平而鬪爭的人民，而在於沒有像傑佛遜、富蘭克林那樣的一批能夠吸取歷史教訓，善於分析現實情況，且對民主和人權有正確而深刻的理解的具有遠見卓識的知識分子。

中國清末的康有為、梁啟超變法，其本意並非把中國建成一個民主、人權的國家，而是為挽救大清帝國的滅亡。到「五·四」運動時湧現出的一批中國民主知識份子，也終於或屈就於國民黨的專制（如胡適等），或倒向蘇俄的國際共運（如李大釗、陳獨秀、魯迅等）而變成共產黨或其同路人。

在中共統治中國大陸的幾十年中，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遭到了空前絕後的迫害。但即使如此，當「文化大革命」結束而「西單民主牆」興起時，中國的大多數知識份子還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中國共產黨內的改革派身上，而對「

北京之春」那樣真正的民主火花不屑一顧。中國之知識份子對中共「執迷」如此，着實令人痛心！以至胡平論至此事時（見「中國之春」第六十七期，「民主牆：十年後的反思」）而痛心疾首，認為中國人民當時失去了爭取民主的絕好時機。讓這樣的時機白白丟掉，實在該怪中國當時知識份子的見識短淺。這一點，也可以從劉賓雁因當時未對「北京之春」予以支持而表達的悔恨得到證明。

看來中國的知識份子並未走在時代的前面，肩負起其應該肩負的歷史使命。筆者認為與其如丁楚所言，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還不如說有什麼樣的知識份子，就有什麼樣的政府。中國封建奴隸式的獨裁專制經久不衰，且愈益發展「完善」，一個很大的原因是中國的知識份子從未對民主、自由和人權有正確的理解。

時至今日，中國不是還有像夏穎奇博士這樣的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份子，甘為中共所用，對留學生明裡恫嚇，暗裡監督，而試圖在美國這樣的民主社會中剝奪留學生選舉聯誼會這樣微不足道的民主權利嗎？或許像夏穎奇這樣的甘做中共專治打手者只是中國知識份子中的少數。但像遲來先生那樣的對中共肆意踐踏民主和人權可以熟視無睹、逆來順受，但一聽到對中共的批評則大驚小怪者；或像李憲先生那樣的認為中共無論怎樣作惡多端，都可「武運長久」者，則也許不在少數。由此可見，中國之民主啓蒙，不但要啓蒙人民，還要啓蒙知識份子。從知識份子是社會的先驅這一點看，也許啓蒙知識份子比啓蒙人民還要重要。

中國的知識分子如果能夠像巴金先生一樣，首先反躬自責，而不只是責怪中共，責怪人民，責怪黃土地，則中國才會真的有望望！

聽聽洋先生的話

錢 達

十月三日白樺先生應邀在柏克萊加大演講，次日並有座談會，演講和座談都十分成功，同學們也有很熱烈的反應。白樺先生的演講內容經各大中文報紙報導過，我就不再重述。倒是那天座談會以後，我聽到了一段精彩的對話，帶給我的啓示與感動，不亞於演講和座談本身，使我至今記憶猶新，願意借中春一隅與讀者分享。

那兩天的演講或座談，有一位金髮藍眼，身材瘦長的洋人也來參加。不論演講或座談，他都認真聆聽或熱切參與。在座談會後的交談中，我得知他的姓名，並驚訝的發現，他不但能說流利的中文，聽懂多省方言，而且對中國遠近的歷史都有遠遠超過一般中國人的認知程度，他多次訪遊大陸、港台和新加坡，因為他不久就要回到大陸講學，我不便透露他的姓名，就稱他爲洋先生好了。

在座談會中，有一回洋先生發言，他說：「我覺得海外的中國同學應該更積極支持中國之春，甚至創辦更多類似中國之春的雜誌。」當時立刻引起在場同學們一番爭議。會後有人仍圍着白樺先生，也有同學三三兩兩的聚着討

論，我發現洋先生正和兩位同學站在走廊上談着，便加入了他們。

其中一位同學說，我不贊成中國之春也有幾個因素，一方面中春的水平不高，一方面中春這些人只在海外嚷嚷起不了什麼作用，我們則是要回去作實際的改革。

洋先生說：「在長期觀察中國人的個性時，我發現中國人個性中有衆多優點，但也有不少缺點，其中一個缺點就是，中國人要有出頭幹事是很難的，即使是幹正經事兒，其他人不但不上來一起幹，他們坐着觀望之餘，還要批評這人水平太差，那事辦得不高明，這一來大家面對主要問題的方向就分散了，反而成了自己互相攻伐，忘記了最主要的目標。另外你們說中春的水平不高，這話不太合理，如果你們覺得他水平不夠，那你們水平高的人，怎麼不寫寫高論，交給中春發表呢？」

那位同學又說：「不單是水平的問題，主要是觀點不正確。」

洋先生說：「觀點不正確不該以一兩個人的標準來判斷，而就我讀過中春的觀感，並

不覺得中春偏差的幅度有那麼大。但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是一個獨立的言論陣地，因爲在面對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巨大專制體系時，獨立的言論陣地是絕對必要，且應該給予支持的，或者像我在座談會中所說的，即使你們真的很不贊成中春的言論，那你們該出來創辦別的雜誌。否則像你們這樣私下批評中春，不也一樣起不了任何作用嗎？」

那位同學又說：「我還是認爲回去從內部改革才是正路，在外面不管言論獨立不獨立，根本進不去有什麼用。」

洋先生說：「到今天如果有人還想否認外在的獨立力量也可以形成壓力和影響，那已經是不符事實的了。而且我常常覺得奇怪，你們爲什麼總把內外分得那麼清楚，因爲只有高幹子弟等既得利益者，他們只想作片面改革而基本上維持專制，他們的利益才是與外在反對力量相對立的，他們自然會有內外絕對有別的觀念。否則像你們想進去改革的人，應該與外面反對力量合作才對，因爲根本上以全中國的前途着想，就應該以打破專制爲一致的目標。」

那位同學聳聳肩，沒說什麼。

洋先生又說：「當一個大時代在轉折點上時，其速度和力量常常是出乎一般人所能想見的，所以像我先前講的那種只顧觀望批評的人，很快會發現他們突然被甩在時代後面了，因爲時代是不會等人的，只有那些已作好準備的人，才能抓住時代的脈動，作出開創新局的大事業的。」

洋先生的話引起我心中難言的共鳴與欽敬，倒是我與那位中國同學在先後談話中，產生一些不甚愉快的爭執，事後想想自己的態度實在不太好，盼望那位同學也能讀到這篇文章，接受我的道歉。

台灣問題之我見

高標

從某種意義上說，把台灣問題稱為「海峽兩岸關係問題」會顯得更妥當。否則，老讓人覺得有失平衡。例如，外界的注意力三十年來總是集中在催促中共放棄武力統一台灣，而忽視了台灣當局「反攻大陸」的鼓噪（這種鼓噪聲在今年「雙十節」李登輝的演講中還可以聽到）；當人們在議論中共對台灣的主權要求時，却忘却了國民黨也在聲稱擁有對整個大陸的合法代表資格。

國共兩黨都是靠槍桿子起家的，也難怪他們對武力「解放」或「光復」寄予厚望。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於人權精神的空前崛起，自決原則和主權要求獲得了同等的重要意義。因此，中共在決定「解放」台灣之前應先問一問台灣人民是否承認它為自己的「解放者」；同樣，國民黨「光復」大陸之前，也應先問一問大陸的全體民衆是否「歡迎」它的卷土重來。客觀事實證明，國民黨在大陸已成了歷史「陳屍」。而中共竊取台灣的黃金時機也一去不返。事到如今，兩岸政治老人如鄧小平、陳立夫等還在作出種種脫離現實的努力，諸如「一國兩制」或「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等，實在是可悲可嘆。

一、貌似神離的兩岸中國人

三十九個春秋的事實分離隔絕，使得兩岸的人們看上去似乎是同文同種而實際上却是早已離心離德。首先，現已成爲兩岸社會中堅的

中青年一代，是在彼此毫不瞭解、毫無影響的情形下成長起來的。由於各自政治、經濟背景以及由此而滋生出來的次文化迥然不同，彼此溝通已出現了不少困難。其次，台灣與大陸的經濟存在的階梯差，使得台灣人產生了一種優越感，而這種優越感往往進一步破壞了本來就十分脆弱的溝通。再次，兩岸民主政治進程的剪刀差，也使得本應較易互相理解的兩岸海外民運人士，也存在事實上的溝通障礙，譬如互相對彼此「國情」缺乏真正的理解。另一方面，兩岸政權在國際舞台上長期互相拆台，甚至幸災樂禍，惡意中傷，無形中加速了兩岸的離異。

近年來，台灣的經濟發展固然有其令人鼓舞的表現，民主政治進程也有長足的進步。但是，這些成功都是有其特殊條件作背景的。如美國市場的長期開放，高額美援，高科技的自引進等等。若以爲台灣模式可以直接搬到大陸運用，這就未免有失之於偏頗；若以爲台灣的成功證明了國民黨應重返並領導整個大陸，則實屬政治上的幼稚。反觀大陸，中共當年席卷大陸，趕走蔣家王朝，自有其得乎民心的一面，但若以爲國民黨政權已被「徹底消滅」，台灣順理成章應歸併中共統治，則是白天說夢話、自欺欺人；倘若中共借口反對台灣獨而魯莽出兵，則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爲國際法所不容，並極有可能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二、事實上的兩個政治實體

國民黨在台灣當了四十年的寓公，這是事實，而中共在大陸實施了四十年的統治，這也是事實。事實的結論是：在遠東的國際政治版圖上，自四九年起便出現了兩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儘管這兩個實體迄今爲止都否認對方的合法存在，並聲稱自己是兩者的唯一合法代表。這兩個政治實體却分別擁有自己獨立的政府體系，相對穩定的統治疆界及一定的人口，它們還分別以獨立的國際法人資格與世界其它政治實體建立了平等的交往，簽訂了各種條約和參與某些國際性活動。按照國際法的定義，這兩個政治實體已經符合作爲國家的基本條件。雖然台灣政權在一九七〇年喪失了聯合國的席位（那是中國的席位），但這並未改變台灣可以單獨作爲國家的事實；況且，台灣當局並未嘗試僅以台灣的資格申請其會員資格。

就國際慣例而言，同一血緣或同一文化背景的人群居住在鄰近的兩個國家或同一個國家因某種歷史原因而分裂成兩個互爲獨立的實體，都被視爲可以接受的客觀現象。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出現的東、西德，中東的南、北也門，印度次大陸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及遠東的南、北朝鮮和大陸與台灣都是最爲典型的例子。相反，任何以民族統一爲藉口對另一實體進行武裝干涉，則構成威脅人類和平的侵略行徑，例如納粹西德二戰期間對奧地利和捷克的吞併，以及一九五〇年六月北韓對南韓發動的戰爭都是較明顯的實例。另外，按照國際關係一般實踐，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中共對台灣的主權要求並沒有足夠的現實根據。首先，中共政府並不是國民黨政權驅趕到台灣，而是僅以武力手段把國民黨政權驅趕到台灣，從而形成各居一方的長期局面。最明顯的例證是當中共被納爲聯合國會員時，中共拒絕了爲國民

黨政權代償欠下聯合國的債務。其次，即使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統治的三十八年（一九一一—一九四九年）期間，也只有四年時間是對台灣同時行使主權的（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其後，國民黨政權的主權行使便轉移並只限於台灣諸島；而中共政權自一九四九年成立以來，則從未有過一天是可以同時行使對大陸和台灣的主權行爲。換句話說，台灣自本世紀以來，只有那麼四年的時間是曾經受到一個設在大陸中國的中央政府有效的統治的。再次，儘管「開羅宣言」要求日本無條件將台灣歸還給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但是當日本政府在一九五一年正式宣佈放棄台灣諸島時，國民黨政府的統治範圍也就僅剩下台灣諸島範圍。這樣一來，台灣諸島的地位要麼就是未定，要麼就是已經歸還給「開羅宣言」原來指定主人——中華民國（即現時的台灣政權）。

三、統一的可能性

四十年來，兩岸政權一直處於事實上或理論上的戰爭狀態。這種狀態無疑是對統一的諷刺。據筆者愚見，目前兩岸的當務之急是如何消除近四十年的敵意，在聯合國的保證下正式宣佈無條件停火，彼此承認對方生存的權利和人民選擇自己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權利，這包括了以平等資格參加各種國際組織和活動的權利。其後是簽訂互惠協議，在認同血緣和文化的基础上確定彼此可以給予對方某些政治、經濟、人員往來的互惠。到一定的時機，兩岸方才分別舉行全體公民投票，決定是保持現狀或實行過渡統一。倘若要求統一分別爲兩岸的大數，兩岸當局就應擬定一個可行的統一程序交由彼此國民投票通過。事實上，由誰來統一

是無關緊要的，甚至是毫無意義的，因爲一旦該統一程序規定兩岸在一個特定的時期裡有步驟地將各自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制度向某一經全體國民通過共同模式過渡和統一化，其結果將是兩岸逐漸出現一個類似的、非人格化的、不依賴某個政黨、或「大人物」的意志而自動運作的國家機器。這樣的國家機器實質上就是民主政治的制度化體現。

四、統一的障礙

統一有賴於兩岸民主政治進程走向同步。而民主政治與一黨專政却是水火不相容的兩種形態。一黨專政的最大弊端在於一黨倒台，滿盤皆輸。因此該黨即使是腐敗無能，喪盡民心，也會不惜一切地死撐下去。而民主政治的優越性之一則是國家機器能相對獨立地連續運作，而不在乎於某黨倒台或某黨上台。當一個國家政治能夠擺脫以政黨或首領作稱謂時（如中共政權、國民黨政權、全斗煥政權等），這就標誌着該國家開始進入了制度運作的民主政治時期；而民主政治的社會局面才是兩岸和平統一的唯一途徑。

台灣國民黨當局最近解除黨禁，朝民主政治方向前進了歷史性的一大步。人人期望台灣當局會有更多的民主措施出現，包括將軍隊國家化，取消國民黨政訓制並宣佈放棄武力收復大陸。

然而，中共至今仍堅持其一黨專政的保守政策，司法系統不能獨立於黨的干預，軍隊、警察仍是黨的棍棒，黨的頭面人物及其親友借「改革」之機大量侵吞國家財富。這些都是與民主政治進程而步入統一時代的真正障礙主要來自於中共政治、經濟制度的落後和僵化。■

全美創辦最早，
最具規模的移民律師事務所

傑史格(Jay Segal)美羅省移民局前任首席法官
馬丁譚士澤(Martin Danziger)前美司法部移民局副局長
亨利杜根(Henry S. Dogin)美司法部移民局紐約總局

畢斯特·慕嘉模 法律事務所

BARST & MUKAMAL

移民·大赦·不動產買賣·商業登記·酒牌申請等等

紐約總公司
2 Park Ave.
19th Floor
New York N.Y. 10016
Tel: (212) 686-3838
Fax: (212) 481-9362

加州羅省
Tel: (213) 623-4592
Fax: (213) 623-3720
加州三藩市
Tel: (415) 398-8887
Fax: (415) 398-6757

佛州邁阿密
Tel: (305) 371-3838
Fax: (305) 374-3381
佛州棕櫚灘
Tel: (305) 832-2369
Fax: (305) 832-7370

華盛頓首府
Tel: (202) 659-0712
Fax: (202) 659-0194
香港辦事處
代理廣州、台灣
Tel: 5-200818

紐約法拉盛:
39-01 Main St.
Suite 402
Flushing, N.Y. 11354
(718) 463-8500

紐約華埠
8 Chatham Sq. 8F
New York N.Y. 10038
永發大廈八樓
Tel: (212) 513-7800

爲胡秋原

的中國之旅說幾句話

楊雨亭

此次胡秋原先生接受中共全國政協的邀請，於九月十一日從美國舊金山搭中國民航飛往北京起，至十月十八日離開深圳到香港搭華航飛往台北止，外界——香港、台灣、海外，對他的言行大抵是毀多於譽。我以一個隨行秘書的身份，負責一路上與中共官方接洽安排事宜，各地演講、會見，以及收集資料、照相存留等工作。胡先生從舊金山到大陸，再到台北的一切活動，我都大部份參與，是以有我們這一方面的瞭解。請容我也說幾句話，爲我們的言行做一個基本的說明。

外界為何非議統一論者

我把這兩個月海外以及香港、台灣的報刊大致的收攏、細讀，認爲普遍的是反對中共。因爲中共這四十年來從反右到文革，造成了中國的災難，七九年以後的改革至今尚未觸及政治體制的變革，所以任何人主動去和今天的中共謀談中國的未來，却容易在邏輯上被有意無意推斷成不顧人民的需要而加強了中共的地位的這個心理結論。

事實上，台灣的國民黨目前的大陸政策頗有可取之處，而且外交部宣佈放棄以意識形態的敵我觀念來導引外交政策以後，還會有更進一步的做法。但是爲什麼對於國民黨這種實質性的西進政策，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爲攻守的心理屏障的做法不受到普遍的非議呢？

從去年故蔣經國總統宣佈探親政策開始，到今天兩岸的交流，使四十年不如一年風雲之變，更受到許多人士的歡迎，甚至是堅決反共的人也認爲是明智之舉。其中原委，我想是國民黨這些年來做的尚有可圈可點之處。如果明天就是國民黨大員北上與中共談海峽兩岸的和

解，全面終止內戰，加強經濟往來，反對的人必是少的。

這樣分析，可以明白，重點不在於胡秋原、陳立夫或是熊玠，而在於打這場牌的莊家在哪儿。如果莊家在北京，那麼攪局的人必多；如果莊家在台北，同情弱者的心理上加上民主抗共的共同基本戰略，吆喝助陣的也多。

但是統一論者，如胡秋原先生，是民主政治的終身擁護者，他一貫反抗蘇俄對中國近代長久的摧殘，從強佔爲數一百五十餘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土地到支持中共政權，輸入馬列主義損害中國，也反對美國基於美利堅合衆國的利益，實現其全球抗俄的戰略，而使中國大陸與台灣陷入美國內政延續。他去大陸與中共首腦談話，在各地旅遊、演講，許多方面，我應該在此向外界作一說明與澄清，以恢復胡先生訪問中國的本來面貌。

禮貌的對話，節制的對抗

胡先生和全國政協主席李先念先生與已故周恩來總理的夫人鄧穎超女士在人民大會堂的會談，我與隨行之人都在旁陪坐。我形容當時胡先生的氣概是「一介書生，不讓權勢」，他慷慨而談，毫不退縮。但是作爲來訪的客人，不可能一直數落中共的不是，而對中共過去稍有建樹的地方，如國防工業，予以稱讚，是合於賓主之誼的。

李先念說「一國兩制」，胡秋原認爲應該「一國一制」，應召開海內外人才集中，包括「中國之春」的政治協商會議；議定新憲法。李先念說「四個堅持」，胡秋原反對「四個堅持」，而代以「堅持中國人走自己的路子」；李先念說「過去的事不用再提」，胡秋原說「過去的事選應加以檢討」。在大會堂福建廳內

彼此針鋒相對，但是氣氛是和善的。兩個八十歲的同鄉老人，在不同的陣營內對抗了半個世紀，我們還寄望他們站起來打一架嗎？

鄧穎超是一位果決的共產黨員，當年重慶時代在參政會內與胡秋原同是參政員。她說對台灣，以葉劍英九條來說已經是很寬了。胡秋原說過去國民黨大，共產黨小，政治協商時國民黨一時不能相讓，而打了起來，今天局勢已變，國民黨小，共產黨大，應以大讓小，還可讓得更多。鄧穎超並未否定，只說考慮。對於四老宣言，胡秋原的意思是希望上一代的政治家，台灣的陳立夫、張群，大陸上的鄧穎超、陸定一，來呼籲兩岸的和解，進一步坐下來協商中國的憲法，這個意思是善的，有無作用尚在其次。

在北京以及大陸各地，爲了推展他的和平、民主、統一中國理念，胡秋原處處表現得很禮貌、很節制。在我這麼一個鷹派的後輩來看，他是鴿派，但是必須同意鷹鴿應該都有活動的空間。

以三點原則作為統一基礎

胡秋原說希望在二十一世紀之內奠定統一的基礎，他並不是一個昧於現實的機械統一論者。在北京以及各地的歡迎會與座談會上，他提出三點統一的原則：

一、政治民主化。所謂民主，是多黨制下的民主，肯定人民結社、出版、言論種種自由。爲了達到這一點，在今日中國兩套憲法的情形下，必須集合海內外中國人才共同協商新憲法，制定政府規模與議會功能。

二、軍隊國家化。這是中國自辛亥革命以後一直未解決的根本問題；槍桿子出政權，是

各派人士信奉的真理。未來中國的統一，沒有國家化的軍隊，民主政治仍無保障。

三、經濟混和化。純粹的資本主義與極端的社會主義證明都行不通，二者的混合是目前世界的趨勢，至於混合的原則與比例，應是值得研究的。

胡先生在各處都說明這三個原則。在北大時，一位同學站起來問胡先生的聯合政府主張與統一三原則是不是能得到國共雙方的同意？胡先生回答：「只要我們認爲是對的，那麼大家一起來宣揚、來推動，全國老百姓大部份都認爲是對的，形成公意，國共雙方基於民意，就必得同意。」

讚揚深圳是鼓勵改革

胡秋原不主張再革命，他主張和平漸進，這是他的中心思想。故他願意見到中共改革的成功。一路上，我們所見中國的大部分地方還很落後，胡先生的私人朋友、親人、我的親人，以及所遇到的人，許多人傳達給我們一個清楚的信息，中共並沒有把中國搞好，有些地方比解放前還差。但是解鈴還須繫鈴人，目前中國大陸這個難子，有十億平均素質不高的人口，要怎麼辦？當務之急，還是先促進中共在經濟、政治、思想上逐步的改革開放。這促進的因素，有內有外，胡秋原是憑藉民族主義與和平民主統一的運動來推動這個過程。無疑我們還要承認國民黨、民進黨；香港、海外都在扮演不同的角色，也有不同的功能。

當我們到了深圳，看到當初只有十幾萬人的破落漁村，文革後大量中國人從此處游水逃往香港，八年之後的今天變成一個明亮的新城市，胡秋原內心十分激動，認爲如果中共能將

深圳的經驗推廣全國，則大陸能在七、八年內趕上台灣。外界對胡秋原這句話頗多批評，但是這是他歷經二〇年代以後內憂外患的中國，目睹民族的苦難，長年內心悲憤，在他晚年看到深圳的一點新希望，而發抒出對中國未來的一種期許，也是對中共的一種鼓勵。但是，誰也知道深圳當然有潛在的一些問題。

胡秋原走過的路

胡秋原在中國大陸，就我所目睹所受的歡迎遠遠超過所渲染的中共官方的招待。胡秋原是一個很堅持原則但是不拘泥立場的人，當年自我期許爲自由的馬克思主義者，後和中共論戰，爲抗日參加福建政府（閩變），到莫斯科與王明、康生共事，離開共產國際，七七抗日戰爭一起，立刻束裝回國共赴國難，任參政員，辦報紙，抗日勝利前反對中蘇條約而被蔣介石撤除一切職務，去復旦、暨南教書，到台灣任立法委員，辦「中華雜誌」，爲雷震下獄說話，爲美麗島事件勸告當局從輕處理。他並不只是一個關在書房裡製造自己觀念的人，他和時代脫節，只是他走過的路太長，他的意見並不只爲一時一地而發而已。因爲他的經歷，他的朋友與慕名者極多，桃李滿天下，同時他的敵人也不少。

結果在各大城市，來見他的人多如潮水，有的老朋友或老友的老後人爲求見一面，遠從千里之外搭火車、搭飛機來。有的是老國民黨人，有的是民主黨派人士，有的是老共產黨人，他們和胡秋原都有話要說，這些人和胡秋原見面時，四十年恍如隔世，彼此真情流露，時而傷心流淚，時而歡喜大笑，述說老友紛紛返歸道山時又沉靜不言，真是十分感人的場面。他

他們中的許多對於胡秋原八十歲再回故國要求民主，重新復興中國的理想真的是極爲佩服，這麼多年來，他們走過很難淡的日子。

胡秋原的主張在大陸各處引起很深的共鳴，因爲這是中國目前真正需要的。外界許多人批評胡秋原的「重開政治協商」主張。但是在大陸，我遇到一位政協委員私下告訴我，胡老這一個主張非常厲害，中共很難招架。可見在大陸內部與在大陸以外，對事情的看法不會一致。

而胡秋原這一代人的心胸之寬，格局之大，實在不是我這一代人所能及的。我個人在大陸上所見，許多不合理的現象，幾乎不能容忍，他都寬容下來，並且勸我心平氣和，尋求解決的辦法，並且表示我將來要走的的路還很長，不能如此憤慨行事。

我想胡秋原的主張，有一些人不能贊同，但是他以八十高齡親赴大陸與意見不同，彼此抗爭幾十年的人坐下來平心靜氣的討論中國的未來，這種道德的勇氣與無私的善意是應該獲得尊重的。

至於在湯一介先生主持的文化書院座談會上，外界許多人引用當時一些話來批評胡秋原的中國文化論，我要說明幾點：

第一、當時在場中批評傳統文化，主張全盤西化、全方位開放的人態度很堅決，王若水就坐在我右邊，但是隨後一位研究生站起來說：「今天大家反傳統，我看都是反現體制。」第二、王若水、梁從誠等先生批評孟子的「民爲貴」，不是「民爲主」，我們隨行一起來「中華雜誌」的曾祥鐸教授起來說，在兩千多年前孟子的「民爲貴」還要批評，那麼中國文化簡直一無是處了，而西方孟德斯鳩的類似主張還是最近幾百年的事。

第三、當時討論很熱烈，但明顯不是針對胡先生，而是反對中共不民主的體制。近來有關「河殤」的討論也是糾纏在傳統與現體制上。

第四、有關中國傳統與西化的爭論，從清末已經開始。這是近代中國人的大問題，不是那一個個別人的問題，而且胡秋原一向主張超越傳統、西化、俄化前進，並不是一個絕對的傳統主義者。

結 論

自從國民黨在今年九月二十一日開除胡秋原黨籍以後，「胡秋原事件」逐漸演變成近代中國史上一個題目，台灣掀起了相當激烈的統獨之爭，在大陸上也引起了政治協商走向更民主、更擴大討論，海外則議論紛紛。而胡秋原在大陸上走了這麼多地方，見了這麼多人，說了這麼多話，中共對外披載的不過十分之一而已。到底這件事今後會有什麼影響？還不是目前可以定論的。

但是中國的問題總是要解決的，這段期間，許多人的努力會成爲決定性的因素，有些人的做法只能成爲間接推動的力量。不論如何，我個人以爲，讓每一種樂器都能適當的發出聲音，才能奏出豐富的民主合唱。我們這一行，也只是說了一些話，走了一些地方，外界反應激烈，我們自己身爲戲台上的唱角，胡先生是主角，我只是跑龍套的，也真不知道自己唱的如何？表演的怎麼樣？好像觀眾的反應不太齊一；然而望下一看，座無虛席，希望值回票價。下一回登台的不知道是哪一位了。在大陸上我和一位統戰部的幹部說：「人生如戲，不能太認真的。」但是戲中也有真實嚴肅的成份，不是嗎？

請您訂閱 中國之春 月刊

姓名：英文 _____ 中文 _____
地址： _____
訂 費 (每年)
寄 達 地 區
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區 (港、澳地區)
機 關：60美元 200 港元
普 通 訂 戶：24美元 110 港元
學 生 訂 戶：20美元 90 港元

寄上 _____ 幣 _____ 元，訂閱由 _____ 年 _____ 月 (第 _____ 期) 開始

北美地區：P.O.Box 701400 Trainsmeadow Station
Flushing, NY 11370-9998

香港及世界其他地區：3-7710410
：香港九龍旺角郵箱 79047 號

支票抬頭請寫：CHINA SPRING BOOK STORE

另加郵費
航空：加拿大 U.S.\$15
中美洲 U.S.\$25
歐洲 南美洲 U.S.\$35
亞洲 澳洲 U.S.\$45

國內參考消息

黎音

中共為糧食問題大傷腦筋

中國大陸自八五年以來，已連續四年沒有完成糧食生產計劃，尤其是去年農業嚴重欠收，造成了吃糧恐慌，不僅百姓心中沒有底，連中共上層也亂了「陣腳」。

據來自北京的可靠消息說：陳雲就糧食問題去年秋曾專門給中央寫了信，信的內容主要是呼籲中央應高度重視農業生產。他說：「改革也好，開放也好，我看頭等大事還是十億人的吃飯問題。」

消息來源說：中顧委去年三季度以來曾多次召開會議討論糧食欠收問題。去年十一月下旬的一次中顧委常委會議上，薄一波叫得最歡，他說：「中央的主導思想是農業問題，鄧小平同志不知講過多少次，其他老同志也一再過問。農村的萬元戶究竟有多少是靠種糧發家的？都說現在是經濟過熱，我說不是過熱，是發昏，頭腦發昏，再這麼下去，十億人又要集體餓飯！」他還講：「不抓農業就是不務正業。」

趙紫陽為批准方勵之出國承擔責任

由於方勵之教授在去年出國訪問期間的言論引起鄧小平等中共高層領導的不滿，所以黨內傾保守的勢力常常借機向批准方勵之出國的趙紫陽發難。

據瞭解北京上層動態的人士反映：去年十二月中旬，趙紫陽在與中宣部、總政治部負責人的談話時，首次以自我批評的口氣講道：

「我批准方勵之出國還是從全局考慮的。方在國外到處講話，他的一些講話不僅老同志不滿意，國內許多其他同志也不滿意。是我批准他出去的，如果說責任，我當然要負，我過高地估計了他。」

可靠消息證實：中共為降低和消除方勵之的影響，有關方面已做出決定，採取「三不」措施：（一）不許方勵之在近期內出國，尤其不許去美國和台灣；（二）不許國內的報刊雜誌，特別是中央大報刊登有關方勵之活動的報道；（三）對海外聲援方勵之的活動和言論、文章不表態，不理睬。

王震為鄧樸方撐腰打氣

自中共開展整頓「官倒」公司以來，鄧樸芳遭到了來自海內外輿論抨擊的壓力，日子頗為難過。王震聽到北京流傳的「整治官倒爺，先斃鄧半截」的說法之後，非常氣憤。十一月中旬他曾兩次給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打電話，要求公安部對鄧樸芳的安全負責。王震在電話中說：「現在有人借整頓康華公司，把矛頭指向鄧樸芳，實際上他們反對的是鄧小平同志，我們要和這般勢力做鬥爭。」王震還給鄧樸芳去電話，安慰鄧樸芳，王震對他說：「不行的話，你到我家來住。」據北京公安方面知情人士透露：王震去年末曾對公安部的人說：「誰想反了共產黨的天，我還是那句老話，用火炮噴射器，用高射機關槍對付他。不要怕得

罪人，得罪了個把人沒有什麼了不起，我們保護的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眾。」王震還在一些場合說過：「該對話的要對話，該談判的要談判，但不能軟弱，我們掌握着政權，掌握着槍桿子，緬甸的局勢為什麼平靜了？還不是大炮解決了問題。」

又據來自王震身邊的消息說：鄧小平不久前曾對王震講：「康華的問題，你不要講話。」

中共加強僑務工作採取

「八面出擊」策略

去年十一月份中共派出一個代表團到日本，該團名為出版「廖承志文選」代表團，實際是根據統戰部工作的需要而派出的僑務統戰工作組織。該團成員來日後，幾乎每天深入到在日華僑中進行「工作」。

據知情人透露：中共中央要求廖輝採取「八面出擊」的策略做好新時期國內外的僑務工作。工作的重點是右派，團結中間派。鄧小平批示給廖輝：「不能只在左派圈子裡打轉轉。」「不要怕右派，罵的越兇，越要做工作。」根據鄧的指示精神，中央決定於春節前後由國家僑委及國務院僑辦派出「慰問團」，八面出擊，分赴世界各地去搞統戰。

據悉鄧小平還指示廖輝：中國的統一問題，不單是共產黨、國民黨兩黨的事，華僑的力量不可低估，要借助這股力量，促成與台北的對話。

鄧小平談對台問題

據中共中央統戰部傳出的消息說：去年十一月上旬召開的第二次統戰理論工作會議，重點研究了對台工作、海外華僑工作、國內歸僑

工作等等，中心議題是對台工作。鄧小平在此次會議期間，針對台灣問題講了以下的话：

台灣上下對「統戰」這個字眼很反感，有些人也會向中央，向我建議不要提「統戰」兩個字，我也覺得這兩個字有過時感。但是用什麼詞來取代？大家可以從理論上議一議。

現在的台北政府既不是抗日戰爭時期的南京國民政府，也不是五八年我們炮轟國民黨時的國民黨政府，老實說，我們的對手既是老對手，也是新對手。又頑固，又脆弱。

鄧小平又說：中國的統一問題舉世矚目，操之過急恐怕不行，總這麼拖也不行。不僅我們不答應，國民黨內也有人不同意。

鄧小平還批評了近年來的統戰工作，他說：我們對蔣經國、李登輝有些估計不足，台灣搞了個開放探親，一下搞得我們有些同志緊張、被動。

鄧小平還提到：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能放棄用軍事手段，用武力解決中國的統一問題。我們主張兩黨心平氣和地坐下來談統一問題，如果人家就是堅持「三不」，堅持「三不」實際上就是堅持不統一，堅持國家長期分裂，堅持與全民族為敵，怎麼辦？到那個時候用什麼法子解決問題的主動權，在我們手裡。

鄧小平又說：美國人表面上是和事佬，實際上他們袒護國民黨，支持台灣與我們對立的政策。我們要和美國人打招呼，中國的統一問題是大局，是我們今後對美政策的立足點。

據悉這是近年來鄧小平關於台灣問題最嚴厲、最長的一次談話，在座的除有黨中央政治局主管統戰工作的領導外，還有軍方高級將領。在會議期間，還放映了海軍作戰、登陸演習、新式武器裝備以及台胞赴大陸探親、介紹台灣目前狀況的紀錄新片。

陳雲不贊成為鄧小平「宣揚個人」

為紀念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三十週年及百色起義五十週年，廣西電視台和廣西電影製片廠聯合拍攝了以頌揚鄧小平為主題的「鄧小平在廣西」大型文獻紀錄片。

早在去年下半年，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領導在北京期間曾征求中央對拍攝「鄧小平在廣西」的意見，薄一波在報告上批示：「這是一件大好事」；胡啓立批示：「贊成自治區黨委的意見」；王震聞訊後，面召自治區黨委幾位領導，指示：「只許拍好，不許拍壞」。當被召見的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談到正在籌措拍攝經費時，王震說：「錢的問題好辦，我是國家副主席，我還有這麼一點權力吧！拍好鄧小平在廣西，不僅是你們自治區的大事，也是我們黨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於是王震分三次批給拍片經費九百八十萬元人民幣的巨款，同時，他還擔任了拍攝這部影片的總顧問並親筆題寫了片名。

據可靠消息來源說，陳雲知道此事後曾明確表示：「我不贊成宣揚個人，突出個人。」他還辛辣地講道：「過去雲南有雲南王，廣西有土皇帝，我們共產黨人既不能當王，也不能稱帝。」他還說：「鄧小平同志領導了百色起義，但是前委不是鄧小平同志一個人。這都是我們黨的歷史。」

瞭解中共上層內情的人都清楚，王震與陳雲的關係近年來一直很緊張。王震在擔任國家副主席之前，陳雲就曾表示不同意他擔任此職，王震始終耿耿於懷。所以當王震聽到陳雲的不滿之後，便不以為然地在公開場合對廣播電影電視部和文化部的負責人說：「你們是不是

組織力量為陳雲同志也排一部片子，我也擁護。不過拍陳雲同志在什麼地方呀？」語氣中流露出對陳雲的明顯輕蔑與嘲諷。

李鵬對非洲留學生與中國學生的衝突非常憂慮

最近由北京上層傳來的消息證實：去年十二月末聖誕節期間發生的非洲留學生與中國大學生之間的衝突，使國務院總理李鵬相當憂慮。他親自聽取了有關方面對上述事件的詳細分析彙報。李鵬在聽彙報的過程中指示：一、查清責任，公諸於世；二、就事論事，不要挑起國際種族糾紛；三、注意嚴防「黑手」介入；四、採取有力措施，維護校園安定。

消息來源說：李鵬為上述事件還曾緊急給李鐵映打電話，他說：「我們的大學生與黑人留學生之間歷來有些隔閡，但從國際關係着眼，應當教育我們的學生顧大局，能克制。如果事態鬧大，就不只是學生之間的事了。」

趙紫陽「拆台」李鵬不滿

當前，趙紫陽與李鵬意見不合，明爭暗鬥，已為人所皆知的事實。

據北京國務院機關大院流傳的消息說，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李鵬結束對泰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三國出訪，回到北京時，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本來安排了一個龐大的接機人員名單，意圖造成聲勢浩大的熱烈而隆重的場面。但趙紫陽非但本人未去機場，他還借故大筆一揮將接機名單的人員勾掉一多半，主要官員只有姚依林到了機場。事後，李鵬從親信那裡得知事情真相，面帶慍色連聲說：「太不像話，太不像話！」

戈爾巴喬夫：

「我們犯了錯誤，

受到懲罰」

廖天琪譯



戈爾巴喬夫同工人談話

譯者前言

當前社會主義陣營的兩個大國——中國與蘇聯都在進行改革，此事決非偶然。中蘇兩國在以往超過一甲子的歲月中，都經過對共產主義探索、狂熱、懷疑、恐怖和幻滅的階段。近年來主觀、客觀現實的轉變，使得兩國人民大夢初醒，意識到自己有權利在精神和物質上生活得更有尊嚴。逝者已矣，來者可追，關鍵在於領導人物的覺悟、膽識和魄力。他們將帶領民衆走向何方？中國大陸的改革已有十年功夫，然而在重大問題上換湯不換藥，致使改革四面觸礁。蘇聯共黨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走馬上任不過數年功夫，他以現代彼得大帝自許，提出改革和開放蘇聯的方案，以沉毅和機智，步步為營，排除黨內保守反動力量，取得內政上的制主權。不同於中國大陸的，他不但主張對社會主義進行政治、經濟改革，同時也決心推行民主化，進行法制改革，剷除官僚主義，宣佈新聞自由、思想自由的新生。在外交上，他力主裁軍，和平互利，逐漸贏得歐洲為主的國家

的信任，經濟和科技的交流援助源源不斷。在過去四年功夫，已得到各國總數八十億美元的貸款，九、十月間又陸續有西歐、日本各國九十億美元的貸款流入蘇聯，為他們精力衰竭的國民經濟注了一劑強心針。

為配合總理科爾十月訪蘇，西德鏡報（DER SPIEGEL）週刊編輯 FRITJOF MEYER 對戈爾巴喬夫作了書面採訪，就蘇聯的政治、經濟和法制的改革，以及裁軍問題提出尖銳的問題，戈氏的回答透視了許多敏感的問題，頗值中國改革者借鑑。今得鏡報特許，譯全文如下。

問：您的改革政策進行得如何？取得了什麼成果？

戈：最大的成果是社會上產生了一種新的精神和道德面貌。人民覺醒了，因為我們把人的利益移作整個公衆生活的重心。

問：這一切是如何開始的？

戈：我們從政治和社會經濟學角度進行一個不帶偏見，但具批評性的分析。這項分析得出的結論是，蘇聯的社會必須在各個領域進行深刻的改造。我們認識到，事情雖然做了不少，但也不乏敗筆，老百姓的許多期望都無法兌現。我們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出了許多差錯，毛病和畸形現象。若要改正就得建立新的民主化標準，一切事務要公開且具透明度。現在的口號是：更多的社會主義。重要的是通過民主化把社會主義制度的潛力發揮到極限。

問：經濟也包括在此範圍嗎？

戈：是的，我們也以此原則作為經濟的起點，務必經由改變經濟運作的方式來達成經濟的民主化，讓人成為生產過程的重點，而當家作主。授權給集體公營事業，讓他們自選主管人。

問：這樣做能消除命令式經濟嗎？

戈：大家怎麼工作，就怎麼過活，權利和義務應該平衡。我們瞭解，不進行政治改革，上述的改造就不可能深入地推展，因此在政治制度上我們提出了改革。用它來克服自斯大林時代和經濟蕭條時代就已形成的行政上的命令式制度。許多民衆由於沒法參與政治生活，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狀態就因此產生。在社會生活正常運作情況下，人們該得到的東西，我們這兒的人都得不到，平行式經濟就代之而起，這就是所謂的影子經濟。它在群衆心理和道德方面起了相當負面的作用。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即是重振道德人心。

問：改革政策面臨了怎樣的阻力？

戈：困難真不少，我們的瞭解很不全面。但最重要的是，這個選擇是正確的，沒有人能提出更好的方針。我們聽到的批評，矛頭所指的是改革政策的瓶頸，改良性建議紛紛出籠，這不是很正常嗎？政治是個生氣勃勃的過程，在與生活接觸時，它得到不斷的修正和豐富。人民欣賞並擁護這個政策，民主化過程及公開化催化了新的督導力量，為改革提供了保證。改革政策的進行有時順利，有時受挫，各地快慢不一而足。但它會繼續下去的，雖然我們還需多年的時間，並且困難還真多，尤其是這兩三年，三、四年。這是一場充滿矛盾、多種形式的深刻變革。這可不是美容，我們不是在房屋裡粉刷和張貼壁紙，而是在改造屋子的結構。

在政治上尋求一條能配合現實情況的解決之道是不容易的。不過我們已找到了它，在廣大群衆和社會中已得到共鳴。它不僅僅是個政治理論，它也觸及每個人的實際生活。這就使得整個運動錯綜複雜了。以往我們在思想上已

習慣於固定的模式，物質上即使產品質量差，不合工作要求，我們也無動於衷。改革就該扭轉這些怪現象。

問：官僚主義對改革起怎樣的遏阻作用？

戈：國內外，尤其是國外都對改革政策起了阻。但也不盡然，最大的阻力來自各階層都存在的保守勢力。農業方面所實行的租賃制度，有人以為是簡單的事，「土地分配到戶，就顯顯身手吧，你們不是引頸期待著這一天的來到嗎？」另外，企業管理方面的自主權也開放了，這也是許多人一直所嚮往的，現在一旦開放，他們反而慢吞吞的了。我們的人得學學如何分擔責任，因為別無妙法。不負責任，不盡義務，權利由何而來？

問：改革的程序需要多少時間？

戈：需要很長的時間。我們的中程目標也會有所改變，但照理說，會繼續下去的，因此別急於現在就下評語和結論。最重要又令人高興的是，全國已面向一個富建設性的目標，在起着變化。

問：改革政策對蘇聯的外交有何影響？

戈：這方面也很有進展，雖然最終目的還未達到，當初我們開始推行開放政策時，全世界都毫不留情地觀察著我們。情況相當特殊，因為世界雖然變了，許多新的現實情況出現了，但是國際間的關係還維持著戰後的冷戰狀態。人們的既定思想還是老樣子，這方面似乎也有改革的必要。在這方面，我們有另外一個新名詞，叫「新思想」。我認為在今日的現況下，人們對於「和平共存」以及「自由選擇社會制度」這些觀念應該重新進行思考。雖然你我不同，但都是宇宙天地所包涵的文明之一部份。世界這個有機體，複雜而充滿矛盾，但人類的命運却息息相關，不該因彼此（制度）不同

，而形成軍事對壘，相反地，它應成爲激發我們互相交流、競爭和比較的動力。

我是樂觀主義者，希望二〇〇〇年時能見到一個無核武器的世界，至少大家要嚴肅地開始銷毀核武器，我不相信核裁軍談判條約只是紙上談兵。人類應當充份地發揮理性。

問：改革政策的長期保證是什麼？貴國的法治改革在此扮演何種角色？

戈：這涉及到走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道路這個關鍵問題，通過人民的支持，我們要堅決地排除權力的失控和濫用之可能性。憲法上明文規定，國民的權利和自由應得到保障。我們想就這點在憲法上加以補充，使之更臻完美。要遵行既定法規，以確保社會主義的法治國家。歷史不止一次地昭示我們，個人只可在法律規定的限期內操權在手。另外，權力絕對不能落入一個不配使用它的人之手，這說來容易做來難。但我們必須全力以赴，特別是通過向選民解說彙報的方式來實行選賢與能，要保證做到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這是不言而喻的。

另外，權力不能集中在一小撮人的手裡。我們反對把黨與行政、立法、司法的職權機械地分開。爲配合民主化的新需求，這四個領域都得改革。我們稱之爲政治制度的改革，其實這是法律體制的改革。

對刑法、民法及其它的法規我們進行革新，最核心的是每個國民的人格、尊嚴、財產和住所應受到絕對的保護，免於受到侵犯。思想自由應有保證。

總之，沒有法治，就不可能有人民政權。我們的改革程序，複雜而困難，在某種意義上又是痛苦的。新制度不會一夜之間來到，法律是人制訂的，去侵犯、肢解法律的也是人自己。

問：開放會有限度嗎？

戈：法律和理性爲它劃定了界綫。我們的道德準則對社會秩序安定的要求和選擇了走社會主義道路，這三點就爲開放厘定了界綫。畢竟我們擁有固有傳統，它跟舊俄時代，跟國民性及俄羅斯思想裡好壞的標準都有關係。這些標準雖是人性普遍準則的一部份，但差別還是存在的。

今日開放的程度還是最終目的，它連中程目標都算不上。通過民主的教育以及我們政治文化的發展，開放也將會有這樣那樣的差別和重點區分，這是好現象。

從過去的僵化、單調過渡到今後社會主義的多元化，此一過程不論多麼險峻，我黨也絕不走回頭路。不開放就不可能有民主化，沒有民主化，那麼將更新我們社會和秩序的改革政策就不可能成功。我們決心破釜沉舟，開放前在某些雙重道德和非法制的翼卵下產生的「綠洲」以及鞭長莫及的「禁區」，都將被剷除。我們正在制定一套有關新聞自由的法律和規章，務必使所有國民都能享受到第一手新聞訊息。我們很清楚，光制定法律還不夠，要點在於確保它的執行，要學會尊重（個人）權利，同時也要讓權利與義務結合。

問：今後蘇聯共產黨在國家和社會上將扮演與以前不同的角色嗎？

戈：俄共黨中也在進行改革、整頓。黨負擔了許多經濟和行政工作，問題是沒有好好去做，國家機構荒疏了職守。黨的第二十七屆大會及第十九次黨會產生出來的代表，彼此取得協調，要改革黨的角色和做事方法。改革政治方面，將從改變黨的素質上着手，更新、恢復以前的純潔性，每句話、每件事都要切實合法，這樣才能成爲社會的政治主導力量。

莫斯科民眾聚在卡里尼那廣場聽領導人演說



我再次重新強調，法律將由議會通過，政府（只）行使行政權，判決權聽命於法律。這一切並非一蹴可就。有些地方對這樣的新陳代謝會踟躕不前。要挑大目標下手，就得有多方面的準備，不論何人都不能抑制長河奔流之勢。我們敢於投身急流中，因爲知道有個

彼岸，我們必須到達彼岸。

問：目前蘇聯的民生供應有燃眉之急，這是從何而來？

戈：您的問題裡帶有一種對我國情況過於陰暗的估計。不錯，這兒有很大的供應問題，但也不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我們毫不留情地去追究癥結所在，也知道該如何糾正錯誤，我們有此能力。想當年馬克思就說過，一個社會若停止工作，就會滅亡。因此，當前要務是以新方式、腳踏實地的去工作，爲此，許多事得先改變，這兒也的確着手去改了。

爲克服過去沙皇時代農奴主制及資本主義制度留下來的包袱，爭取自由、平等、博愛，我們在革命的大前提下，徹底地實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從社會福利角度看，我們社會中，個人受到很好的保護，自然這只是問題的一個層面。

另一面的情況是：行政方面實行了命令制，以前低估了從物質及道德上去刺激人們工作慾的可能性，造成了社會上多年來的諸多不良現象，譬如被動性、平均主義思想、寄生蟲心態，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心理，以及過河拆橋的精神狀態。

現在我們痛下決心，要在全國各地克服這些現象。我們可以通过出租生產資料及自負盈虧制並且經由合作社制，結合個人及社會的利益這兩個辯證力量。換句話說，要擴大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可能性和營利方式。就常理來看，只有開關科技的新領域，才能達到經濟上的高水準，這就促使我們改變原有的政治結構及優先排除制。

在食品供應、消費物資方面，以及房屋建造、醫藥保健的改善和國民教育等，我們將毫

無疑問地給予優先。

問：蘇聯會拒絕一項改良性的「馬歇爾計劃」嗎？

戈：大家都眾議紛云地談論為蘇聯提供「馬歇爾計劃」。我認為這源於某些人慣有的傲慢心理，覺得蘇聯的經濟若得不到資本主義火車頭的拉扯，就上不了山頂。長話短說：我們確知自己有能力解決自己的問題，但也願充分利用外界給予的機會。我們不期待別人的「援助」，利益總是互相的。你們跟我們一樣願意擺脫軍備的負擔，跟我們一樣希望擴展彼此經濟、科技的聯繫。西方國家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世界經貿貸款及科技方面的思想包袱，就如同軍備競賽一樣，不但給我們，也給你們自己帶來諸多問題。必得用新方法來處理這些事，才能有效益。今後彼此以何種具體方式合作，還是次要的問題。

問：蘇聯和聯邦德國的貿易最近四年已縮減了百分之四十，怎樣能讓它重新增長？蘇聯今後準備以何種商品向世界貿易進軍？成立合股企業目前有什麼困難？一九九二年以後對歐洲經濟共同體的關係如何？

戈：事實上我國與大部份國家的貿易都很不如理想，這一方面本身犯了錯，坐失良機，自食惡果，另一方面也是許多外國伙伴那種狹窄的營利思想之過。他們只要蘇聯購買他們的成品，從而獲得我們的能源和原料，雙方都得到了教訓，現在得看看，那一邊學乖了。蘇聯認識到必須在對外經貿的機構上徹底革新。企業、機關、合作社都可獨立地與世界市場溝通，這意味着，若在某件事上失敗，就不能再把錯誤往別人頭上推了。你們今後也許還會回到以往我們某些外貿機構辦事不力，缺乏遠見，又不靈光，白白浪費了國家的財力。

我們還打算在出口貨物上，提高有研究成果及科技的产品比重。當然也出售原料，重要的是，不單單賣原料，更不大量而無節制地賣。

做買賣是嚴肅又有風險的事，誰敢冒險，才能賺錢。誰把對蘇貿易看成富有潛力而長遠的事，而不是來圖一次暴利，才真有前途。

西方國家有些地方很惱人，像在貸款和高科技的出售方面，常以蘇聯的「軍事威脅」為藉口，人為而名目繁多的關稅限制和保護主義，都是障礙。

問：如果改革成功，蘇聯會成為許多國家的典範，您是否估計美國方面有些力量會來阻礙你們？

戈：美國方面是有一些從情感上和意念上都很有反動的力量。但近年來沒有跡象顯示它們十分強大，這是時代的一個特徵。這些反動力量當然不希望我們有所改變，他們在各國都有同路人，包括貴國在內。但我們的改革政策是從戰略上、政治上和經濟的現狀上滋生出來的，新的政治思想之所以有力量，就在於它是紮根於現實的。己所欲，亦施於人，如果人人能這樣，世界會更美好。

問：您把人類普遍的利益放在階級利益之前，甚至有傳言，您將採用社會民主派的經驗，您同西德社會民主黨的關係如何？

戈：共產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的思想不同，這是不爭的事實。近年來彼此之間的關係也有重要而肯定的改善。認識教訓，才能克服過去。創立共產黨及社會民主黨運動的兩位德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是第一個提出把人的利益放在首位的。在有派系爭論時，俄國的社會民主黨人列寧是極力擁護這種看法的。列寧在革命勝利的第二天起草了關於和平的歷史法令。第

一次世界大戰的可怕經驗證明了普天下人的價值對人類文明有舉足輕重的意義，這亦促使列寧於一九二二年在熱那亞會議上提出在國際的嚴格監督下，進行徹底裁軍，這是社會主義理想在世界政治年鑑上繪下的第一筆。在當前階段，我們試着因應新的現實，在國際關係上以言、行繼續這個事業。

問：蘇聯共產黨跟西德社會民主黨有什麼特殊關係？

戈：我覺得「特殊」一詞用在兩黨的關係上很不恰當。因為這帶有輕視我黨與其它西德政黨之間關係的意味。我寧願說我們之間的關係是「實事求是，互相尊重，互利的」。貴國社會民主黨與蘇聯共產黨各自獨立地代表今日世界上兩種重要政治思潮，彼此能夠開誠佈公，有創造性地互換意見，切磋討論。

環球汽車修理行

地址：112-21 Roosevelt Ave.
Corona NY, 11368

電話：(718)429-1400
(718)429-1442

華人經營

精修各種引擎、線路、
板金、噴漆、換油、保
養、舊車買賣、歡迎比
價。

小閻主持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上午八時至下午七時

改革在重寫

匈牙利的歷史

傑克森·戴爾

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目前正着手於一系列的政治改革，以便使自己的政治體制適應於國際競爭的形勢。

本月末，匈牙利立法機關有望通過兩條「民主法款」，這兩條法款將對匈牙利以深遠的影響，給人們帶來個人的政治上的自由，那就是：集會自由，新聞自由，宗教自由，勞動工會獨立以及組織獨立的非共產黨的政治團體。

在兩年內，議會和掌權的共產黨領導人由於完成了新憲法的修改工作，因此，大多數黨的領導人相信會同意恢復在匈牙利實行多黨制的政治體制，非共產黨派組織，將像雨後春筍一樣蓬勃發展，雖然共產黨仍然不允許他們控制政府大權，可是同意他們在一九九〇年與共產黨競爭選票。

共產黨高級官員所起草的「民主法款」是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的政治綱領，這是自一九六八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後，又一次民主嘗試，它在許多方面遠遠地超過了一九八〇年的波蘭團結工會運動。匈牙利共產黨的領導人對此滿懷信心，他們判斷，由於蘇聯已在戈爾巴喬夫的領導下進行改革，因此他

們的這項改革也是可能會成功的。而這些改革過去却是無一不遭到蘇聯軍隊的干涉。

匈牙利的政治局勢標誌着匈牙利的歷史已進入了轉折點，更顯示了匈共領導人開始用資本主義市場來重新認識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他們的認識雖然遲了些，但總算肯定了西方民主主義的形式。當局今秋還要着手進行主要的市場經濟的引進——包括擴大私人企業和外國投資，甚至開拓股票市場。

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卡羅利·格羅茨對改革具有深刻的認識，他曾目睹了一九五六年蘇聯的血腥侵略，使匈牙利的民主運動慘遭鎮壓。他明確地表示做改革的推動者，也就是說，用開明的形象以使黨的政權不致在改革中失去。格羅茨和其他的黨的領導人一方面強調改革，但另一方面，他們又告誡正在全國興起的新的政治勢力，一定要同共產黨合作，不可以向當局的權力挑戰，或做過於激進的要求。

鑒於在此之前的團結工會和布拉格之春運動的失敗，格羅茨說，在建立民主和個人自由與保持共產黨最高權力之間，存在着複雜的也許是相互尖銳對立的矛盾。他再三警告人民不



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

要全面地去實踐。「起步時應有一段時間的和解和妥協，在這一段時間內，新的政治團體要注意約束自己，允許共產黨保持原有的政權。」這位高級共產黨官員說：「否則的話，把共產黨全部掃地出門，却不會有任何一股政治勢力來替換這個黨，這只會帶來混亂和矛盾的激化。」

在波蘭，共產黨與社會民間團體的妥協已證明是不可能取得的，而在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六八年的嘗試被蘇聯坦克軍而毀滅，由於有這個經歷，致使許多東歐的改革家們懷疑：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改革是否有意義？改革程序是否能有條不紊地進行？然而當今匈牙利政治形勢顯示了民主法款比以往歷次的運動都有更有利和成功的機會。

布達佩斯街頭廣告充滿資本主義色彩



儘管匈牙利目前改革的勢頭猛烈，但和激進的波蘭團結工會與「布拉格之春」的革命熱情相比，他們要顯得冷靜的多。有人說格羅茨的領導集團正在小心翼翼地、平緩地前進，雖然他們也有自由派、溫和派和保守派之分，但大多數都明顯地站在溫和派的立場上，向當局表示調解的姿勢。

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東歐一陣大動亂之後，布達佩斯相對的安定氣氛成爲匈牙利改革的一個良好的因素，它的和緩的形勢易爲克林姆林

宮所接受。從原則上來說，莫斯科好像並不贊成這種具有根本意義的改革。戈爾巴喬夫已排除了在蘇聯成立多黨制的建議，他的外交政策的代表人雅克夫羅夫在最近的講話裡，就公開地嘲諷過這種觀念。

然而對於匈牙利要通過的民主法，蘇聯當局或報刊並沒有進行批評，匈牙利高級官員對此表示他們有信心，因爲他們一旦認爲莫斯科不再是障礙，就什麼障礙都容易克服了。「我認爲不會再有什麼障礙出現。」一個匈牙利的高級官方人員說道。

威脅此綱領的主要因素是多年來匈牙利人對經濟停滯不前和生活水平下降所帶來的不滿情緒。

然而與波蘭的局勢相比較，匈牙利的藍領工人在政治改革中起了有歷史意義的作用，他們沒有像團結工會以前所發生的，把獨立的勞工工會轉變爲群眾對立的運動。

相反，這裡的政治領導人明顯地希望，通過工人合法和平的抗議行爲，他們可以在未來的二至三年內，把工人對失業率以及生活水平的下降所帶來的不滿情緒瓦解到最低點。

胸懷不滿情緒的工人和知識份子不是像以前在波蘭所發生的一樣，採取和政府敵對的手段，而是利用這個政體，促進這個政體的民主變更。「匈牙利利用不着我們去組織國家難民委員會，」一個高級官員這樣說道：「相反，它使我們得到了一個統一意見的機會。」

還在半年以前，這種統一意見似乎根本不可能達成，因爲高齡的共產黨領導人雅諾斯·卡達爾強有力地反對非共產黨的政治團體的出現，他拒絕考慮成立多元化的體系，或者全面政治多元化思想。然而，自格羅茨替換了卡達爾以後，去年春大面積重新整頓黨的政治局，把

領導人不由自主地推到了參加改革的行列裡，有利地維護了政治上的安定，滿足了社會上對力量成立非共產黨政治團體的要求。

一個正幫助設計改革藍圖的黨的高級官員說：「我的觀點是保證政治不滿情緒不要超越改革程序的發展。」

在向改革目標行進時，新綱領的第一步就是擬出法律草案：即從法律上承認獨立政治團體以及公開示威遊行的合法性。由國家議會頒佈的新的「協會法」，將在本月內使匈牙利成爲第一個允許非共產黨的政治團體的存在。社會主義國家，新的自由集會法允許任何團體舉行公開的示威遊行，只要提前三天通知警察即可。如要阻止抗議遊行，警察當局必需在法庭上拿出證據以證明示威者有計劃使用暴力或其它犯罪行爲。

這些步驟將使匈牙利成爲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改革的先鋒隊，因爲他們提出的改革方案，與共產黨的一黨獨裁徹底絕裂，更重要的，當局還答應在來年內通過更爲激進的律條，包括允許獨立勞工工會組織的存在，還要保證罷工權力，結束國家控制出版權，允許團體在不審查原文的基礎上出版報刊和書籍。

民主法款還將通過的，就是法庭要比以往更獨立，並允許教堂的自主權——包括教堂有組織和成立宗教學校的自主權。同時，也要製定新的政治運作系統，譬如：公民投票選舉的程序以及市民控告官員舞弊情況的委員會。

當然，還有一點值得注意，所有的這些政治條款並非一帆風順，在過去幾週內，一直籠罩在烏雲之中，對於匈牙利是否要實行多元化的政治體系，一直存在着尖銳的辯論。雖然東歐其他國家從外表上看已有非共產黨的團體產生，而這裡所爭論的焦點却是成立真正的以西

方國家為模式的獨立的政黨團體，這些政黨團體則要在政府議會體系下合法地長期地與共產黨競爭。

司法部長卡爾曼·庫爾薩說：「協會法」將允許成立對立政黨，然而現在指導國家行動和權力運作的法則的有效期要到一九九〇年，等到那時新憲法製訂後才能變更。卡爾曼·庫爾薩說，按他的想法任何黨團組織必需和共產黨議會相配合或至少得承認共產黨的最高統治權。

但不是所有的領導人都贊成這個嚴格的概念，官員們已認識到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都為了獨立黨派在鬧分歧。可不管怎麼說，改革的大趨勢已使共產黨不自主地傾向多元化領導制。上個星期，格羅茨已明白宣稱，他已接受「我們應向多元化方向前進的意見。」

在某些方面，共產黨的大膽步驟和主張已得到了和他們政治對立的組織的支持，僅在十五個月，二十多個獨立的政治團體，還有兩個獨立工會宣告成立，其中最大的、最有名的、最集中的是「匈牙利民主論壇」，宣稱在這個擁有一千萬人口的國家裡，它已有八千成員。另外重要的團體是：「自由民主同盟會」和一個叫「民主青年團」的獨立學生組織，這兩個團體共有成員一千到二千人。

雖然主要的獨立團體都贊成多元化制度和自由選舉，但對大多數團體來說他們願意在新的一年裡以合法「協會」開始工作，然後慢慢地為成立政治黨派而建立基礎。「我們相信以循序漸進的發展，而不是以突發暴烈的形式，情況要好得多。」薩巴·基斯——「民主論壇」的領導人說。他認為「重建的體系不可能就通過那麼一個激烈的起義而形成。」

最初政治統一是否可能得到鞏固和維持？

政治家們認為，將部份取決於新的獨立團體以多快的速度和時間去爭取更多的成員以及聲勢浩大的民主運動將建立在什麼樣的綱領上。同樣，共產黨領導人要克服黨內所產生的對民主法的對立思想，直到新法律的自由主義思想貫徹到實踐中去。

政治活動家們認為，對於現在無論是對共產黨或非共產黨的政治團體，漠不關心是一個

政治笑話……

(四) 一位大學教授打電話給市紀律檢查委員會主任，要告黨委抵制改革的罪狀。紀委主任熱情邀他去自己家裡密談：

「你走到八〇八號後，用手肘把門鈕擰開，再用腳把門踢開，進門後再用肩頂上門。」教授很是不解，問：「為什麼要用肘、腳開門呢？」

紀委主任反問道：「難道你是空着手來嗎？」

(五) 冤假錯案復查小組的幹部把老趙叫到辦公室問：「你的案子已經復查查清楚，是一起重大冤案，當時你在什麼條件下承認自己強姦了前來抄家的那個女紅衛兵？」

老趙回答：「因為我承認強姦了她以後，她就再也沒臉面去抄別人的家了，這可以替無辜的人除去一個禍害。」

讓人焦慮的信號。「我們有些社會問題有可能會轉為政治問題」，「自由民主同盟會」的領導人弗倫斯·柯斯澤格說道：「如果政治運動沒有新鮮血液來補充，不代表工人群眾，那將要受到嚴重的考驗。」

譯自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五日
「華盛頓日報」(朱焱譯)

(六) 為配合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在省報當編輯的老李已是一個星期沒離開過報社了。這天他回家時，鄰居老太太對她說：「你回來啦。真該謝謝你們的報紙，我那兩個孫兒不聽話，幸虧你們的省報幫了大忙。」

老李聽了有點興奮，急忙問：「是哪篇文章？」

老太太回答：「不是文章，是我把一個星期來的報紙捲起來，結結實實地打了他們一頓。」



(七) 上海音樂學院的一個學生，暑假去北京旅遊。在火車上看樂譜時，被同車的一位公安便衣人員懷疑有問題。於是，這位學生被帶往當地的公安局。這位學生抗議說：「那不過是巴赫的『逃亡曲』罷了。」公安人員仔細分析了五綫譜，什麼密碼也沒尋找出來。於是，八個小時以後對該學生說：「你還是老實坦白吧！巴赫已經什麼都承認了，你現在承認還來得及。」

早安，古巴



錢輝怡

喬治·馬斯於一九六〇年抵達美國，成爲上百萬個由於費德爾·卡斯特羅掌權而逃抵的避難者之一。他在邁阿密做裝卸工，與十幾個難民合住一房一廳的公寓。第二年他加入流亡者組成的軍隊並入侵古巴豬灘。軍隊在豬灘被擊潰，馬斯僥倖活着返回邁阿密。他成爲鞋子推銷員爾後做製奶工。

一九七〇年他在一家建築公司找到一個工作。一年後，在銀行貸款資助下他買下了這家公司。不久他經營起有四百名員工，一年二十萬生意的企業。他和妻子歐瑪過着舒適的生活並且成爲美國公民。馬斯從與新近抵達的古巴人交談中驚奇地發現他們對外部世界所發生的事情都不知道。他們不知道人類登陸月球及斯大林女兒避難的事情。卡斯特羅只讓人民知道合他心意的事情。馬斯從此得出結論，一個以美國爲基地傳播世界和古巴真實情況的廣播電台是多麼重要。他在古巴移民社區尋求支持，他說：「如果我們不能用坦克解救古巴，那麼就用真理轟炸它，獨裁政權唯一抵擋不住的是真理的聲音。」馬斯和他的朋友們同意廣播電台命名爲「馬蒂電台」以紀念古巴反抗西班牙

獨立戰爭中的英雄馬蒂。

馬斯寫信給一百位參眾議員要求會見，得到十幾個回覆，於是飛往華盛頓，在那裡他向參眾議員們指出「自由歐洲之聲」向蘇俄及其集團國家播音，而沒有一個電台向離美國海岸僅九十哩的共產黨獨裁國家播音。

古巴人感興趣的新聞只佔用西班牙語播音的「美國之音」節目中的很少一部分。馬斯最艱巨的戰鬥之一是與他的極端保守的流亡同胞。他們要求馬斯只與保守的美國參眾議員合作。馬斯告訴他們：「這樣我們永遠贏不了。我們必須同時也和溫和派、自由派合作。」最後，他使他們相信他是對的。一開始，馬斯贏得了邁阿密兩名民主黨眾議員 DANTE FASCETTI 和 CLAUDE PEPPAR 的支持。其它登上「馬蒂電台」宣傳車的佛羅里達州議員們注意到古巴籍美國人是一個有潛在力的政治力量。馬斯成爲國會山莊的常客。多名議員會見並傾聽這位年輕避難者訴說廣播電台的必要性。他懇求地說，「這是一場我們必定能打敗共產世界的戰鬥。」卡斯特羅震怒地聽到「馬蒂電台」要建立的消息。多年來，他不停地對拉美化宣傳，却不許別人對他廣播。他對「馬蒂

電台」建立的反應是建設兩座強大的發射台，每台有五十萬瓦功力，比南半球最大的電台要大十倍。他揚言要對「馬蒂電台」開展電子戰。計劃中的「馬蒂電台」將使用一〇四〇千周，這也是愛荷華 W H O 電台使用的頻率。從佛羅里達播音的「馬蒂電台」將不會對 W H O 帶來干擾，然而卡斯特羅有強力發射台對准一〇四〇千周，有一次發淫威顯示他有能力完全干擾「馬蒂電台」和嚴重干擾 W H O 節目的播出。由於這一現實的威脅，強有力的全國廣播協會企圖阻止「馬蒂電台」使用一〇四〇千周。

一九八一年雷根總統上任後，他指定一個委員會來研究「馬蒂電台」的問題，馬斯是委員會的成員之一。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在馬斯奮戰了十一年後，授權設立「馬蒂電台」的立法送交參議員表決。由於擔心對 W H O 報復，內布拉斯加州民主黨議員 EDWARD ZONINSKY 和愛荷華共和黨籍議員 CHAVTES GRASLEY 發起阻撓議事。在兩位議員控制場面的痛苦的兩天兩夜裡，馬斯一直坐在議會走廊裡，最後，他們贏了，立法沒有表決。馬斯咬着牙齒對支持者們說，「我們將從頭開始。」馬斯和他的議會朋友制定了一份使大家都滿意的法案。爲了安撫 W H O 和其它廣播電台，「馬蒂電台」將使用「美國之音」正在使用的一一八〇千周。但是康州的共和黨議員 COWELL WELCKER 表示擔心「馬蒂電台」會落入極端的流亡者手中用來作宣傳之用。所以新的法案置電台於「美國之音」控制，從而根據法律，將客觀地播出新聞。

一九八三年，三十二位參議員聯名提議立法設立「馬蒂電台」。這次兩院立即就通過，雷根總統於一九八三年十月四日簽字立法通過。但是一年過去了，什麼都沒進行。馬斯獲悉

三位行政官員掌管此事，國務卿喬治·舒爾茲、國家安全委員會顧問麥克法蘭和助理波恩斯特。他們害怕卡斯特羅以電子戰報復，而美國將面臨要退却或就是武力反擊的局面。較簡單的方法是無限期地推遲「馬蒂電台」計劃。看來「馬蒂電台」計劃已遭受到沉重打擊。就在這時，美國新聞交流署的 CHAVLES WICK 主任接管了這個計劃。他宣佈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日，古巴獨立日，「馬蒂電台」將開始廣播。

國務卿舒爾茲和其他人把這件事告訴了總統。就在預計播音的前幾天，會議在白宮召開。新聞交流署的 WICK 對總統說，「總統先生，國會通過了法案，我們將開始播音，除非您說不。」舒爾茲插嘴說，「我們沒有準備與卡斯特羅打電子戰，他建造了強力發射台干擾我們的廣播。」雷根回答說，「喬治，我知道你會說我僵化，但是決定「馬蒂電台」開始廣播的人坐在這個會議室裡，而不是在古巴。」三天後的清晨五時三十分，一位播音員在華盛頓走向麥克風說，「早安，古巴。」在播音室，歐瑪緊握她丈夫的手。自從首次走訪華盛頓以來，幾乎十四年已過去了，他和幾百位議員交談過，花費了他自己成千上萬的錢，現在夢想實現了。「馬蒂電台」現在辦得十分成功，在古巴已成爲家喻戶曉。卡斯特羅雖然恨得要命，但却不敢貿然使用干擾台，因爲那個老人（指雷根）會送過口信，如果他要干擾，美國將以空襲把它幹掉。由於「馬蒂電台」的成功，在華盛頓支持的人越來越多，現正計劃建立「馬蒂電視台」。現任電台諮詢局主席的馬斯說：「自由世界的人們低估了真實報導世界所發生的一切對生活在極權社會裡的人的重要性。」習慣於自由的人們也低估了在民主社會裡一個個人所能做的，如像喬治·馬斯所做的。■

李鵬訪澳觸了暗礁

芸芸

中國總理李鵬於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四日至二十日訪問澳大利亞，在中共及李鵬看來此行十分了得：此係其人當上總理後第一次出國訪問，又是代表中國去慶祝澳洲立國二百周年，再給幾個中共自己都稱爲「水到渠成」的條約簽字，就可「功成名就」而返了。

但從澳洲朝野及一般民衆對李鵬此行的反應却是平平淡淡，澳洲新聞媒介一方面對李鵬一週的活動不做報導評論，有時還大唱反調，令李總理之行十分掃興，現僅舉以下事例：

一、卡市華商大字報。

在李鵬到達悉尼前幾天，悉尼的華裔聚居區卡拉瑪打市出現華裔大字報，呼籲該地許多當年被中共支持下的越共、赤柬害得家破人亡，投奔怒海後被澳洲政府人道收容的華裔不要好了傷疤忘了疼，不要去參加某些僑團組織的歡迎李鵬的宴會。此大字報在悉尼華人中廣爲流傳，李總理人還未到就被喝了倒彩。

二、澳洲新聞界同情，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

十一月十七號李鵬到達澳首都堪培拉，在機場及其舉行記者招待會場門口，均遇到以澳洲「民主中國」爲代表的中國留學生抗議示威、其大幅標語口號是「中國需要人權」，要求「言論、集社、信仰自由」、「立即釋放民主人士魏京生、楊巍」等。另有一些西藏人在高喊支持宗教領袖達賴喇嘛等口號。上述二項發生在李鵬到達澳首都的抗議示威活動，澳洲首都「堪培拉電視台」及首都報紙「堪培拉時報」都做了報導，而且該報是將示威者舉着「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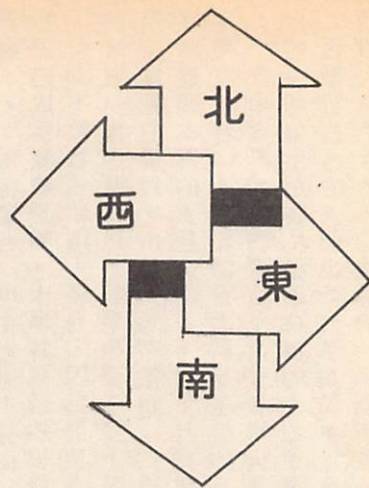
國需要人權」標語的大幅照片放在一版之首，其下方才是李鵬舉行記者招待會的報導及其本人照片，此一褒一貶，意味深長，令中國大使館大光其火，但也毫無辦法對付。

三、澳洲報界乘李鵬訪澳之機爲方勵之爭人權。

十一月十八號澳洲「華聲報」發表「致李鵬公開信」（署名一群澳籍華裔），該信沒談別的，一上來就大讚幾個月之前的方勵之澳洲之行，說方教授的淵博學問，高超品德和愛國熱情，給在澳華人印象深刻，聞其歸國後反因其在澳、港言論「獲罪」於中共，又是要對其起訴，又是不准其出國。信中說，方在澳、港說了什麼見智見仁的另一回事，問題是他有說話的權利。如果中共至今仍「以言治罪」，則將再次失信於天下，因中共自訂的憲法中也寫着「言論自由」。此信有理有據言簡意賅，獲讀者一片稱頌。

與此同時，悉尼主要報紙「悉尼晨鋒報」也在十一月十七日「國際版」首頁發表該報記者在北京對方勵之的訪問記，介紹了方教授爲堅持自己的信仰在文革中坐牢、兩次被開除出黨，至今仍被控制受打擊的情況，題目是「中國的首位持不同政見者還要說下去」。

從以上事例中，可以看出澳洲主持正義的新聞界及當地華人對李總理及中國民運持什麼態度，這也是歷史的必然，「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自稱「像太陽」、「照到那裡裡亮」的中共，統治中國近四十年了，把中國搞成了什麼樣子，有目共睹，難以叫人有好感；何況澳洲與中國有本質的區別即社會制度，在澳洲這種民主國家裡，人們是比較自由表達自己的見解的，所以李鵬的澳洲之行難免被塗上不愉快的色彩。■



留學生周報絕食抗議中共

▲威斯康星州的大陸留學生周報決定在春節前夕在中國駐美大使館門前舉行絕食示威，以抗議中共當局一再拒絕他妻子女兒前來美國探親的申請。周報說他已在沉默中渡過了許許多多的不眠之夜，受思念之苦的折磨。他再也不準備沉默了，他要向輿論界申訴，將在示威現場展示他妻子女兒的照片並播放其女兒周芳舟的錄音。

史坦福留學生向中央提建議書

▲史坦福大學一群關心中國大陸改革的大陸留學生元月十六日向趙紫陽提交長達十餘頁紙的建議書，極力主張實行國有財產私有化。建議書由訪問學者李運奇主筆，並附有十多個大陸留學生聯署，並參考了該校弗里德曼、劉尊義、麥金能等多位知名教授的意見。建議書指出了大陸經濟改革的趨勢和方案選擇，並強調實行私有制是改革的唯一出路。

呼籲釋放魏京生

▲今年三月二十九日是魏京生被捕十週年紀念日。在法國的一些華人組織及國際大赦委員會、國際人權同盟起草了一份「呼籲書」，呼籲全世界各地關心中國的人士舉行各種活動，向中國的政治犯致意。要求中國政府盡快釋放魏京生、劉青、徐文立、王希哲等人士。同時，他們也要求所有支持這一活動的組織，以組織名義在此呼籲書上署名。在今年二月或三月初，將在報刊上發表聯合呼籲書。凡願意參加這一署名活動的組織可與中國之春編輯部聯繫。

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頒獎

▲在美國加州成立的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宣佈：一九八八年傑出民族人士得獎者為香港的司徒華、大陸的劉再復、古華和謝晉。該會定四月初在舊金山頒獎，得獎者各獲獎牌和獎金一千元。

該會一九八六年的得獎人為：魏京生、王若水、劉賓雁。八七年得獎人為：方勵之、王若望、李柱銘和費希平。

台灣正式通過黨團法

▲台灣立法院一月二十日三讀通過「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使國民黨開放黨禁的承諾法律化。台灣已正式進入政黨政治時代。此法規定政黨的設立只要向中央主管機關報備，便具有合法的政黨地位，不須經由申請

、審核、許可的程序。此法另外規定，人民團體或政黨的組織與活動「不得違背憲法或主張共產主義，或主張分裂國土。」

至一九八六年宣佈解嚴前後，以迄今天，台灣已有十八個新的政黨成立，包括民進黨、工黨等。

「大中華憲法」醞釀中

主張允許反對黨存在

據香港明報報導，大陸學者正在研究制定「大中華憲法」，有些學者主張「大中華憲法」中應允許反對黨存在，甚且提出應讓國民黨在大陸公開存在，發展黨員，參與中央政權，他們認為目前只有國民黨才有力量監督共產黨。目前中共官方對大陸學者研究「大中華憲法」還未表態。

大陸知名法學專家于浩成以「修改憲法」為課題，主持「大中華憲法」研究工作，其目的是解決現行「憲法」在面對一國兩制、台灣問題時出現的種種矛盾，為實現真正的民主政制建立法律依據。于浩成表示，由他擔任顧問並主持研究的「中國法制與社會發展研究所」，還準備邀請台灣法學家共同討論、研究「大中華憲法」。

這筆帳怎麼算？

▲千家駒近在香港「信報」撰文指出，中共年年利用「文字遊戲」壓縮赤字。例如不把債務列為赤字，反作為「純收入」，國營企業每年的虧損亦在預算中列入「收入」。他還指出近年赤字維持在一百億之下，只是由於「領導人」講過「赤字不要超過兩位數」的話。■

關於 D W & C 事務所廣告的聲明

中國之春雜誌一九八八年十一月號（總第六十六期）封三刊登過一篇所謂 D W & C 事務所的廣告。該廣告稱 D W & C 事務所「承辦」— 1 簽證留美問題，由「前美國司法部大律師審理」，「每案收費 \$ 1 7 0 0，負責到底」等等。

這篇廣告是王炳章（民聯常委）擬定的。開設 D W & C 事務所純系王炳章個人所為，無論是事前和事後都未經民聯總部的同意，因此和民聯毫無組織關係。在將此廣告交中國之春雜誌刊登時，王炳章向編輯部謊稱該事務所系確有律師的業已注冊的合法機構。編輯部出於對身為民聯常委的王炳章的信任，未作進一步查實，遂在雜誌上原文刊發。

在廣告登出之後，我們接到許多電話，反映該公司無人接電話，還有人親自跑到華盛頓，但按該地址找不到該事務所，而只有一個信箱。鑒於這種情況，本編輯部對該事務所進行了調查。

現發現，所謂 D W & C 事務所的廣告內容多有不實。並無所謂「前美國司法部大律師審理」，至於該事務所本身是否曾在有關部門登記注冊，王炳章一直拒絕對本雜誌作出回答。其它文字也多不真。

為對廣大讀者負責，本刊特作此聲明。還需說明的是，所謂 D W & C 事務所和民聯及中國之春雜誌也無任何財務關係。

中國民聯聯絡站遍佈全美

紐約總部、編輯部信箱改爲：

P.O. BOX 701400 TRAINSMEADOW STATION
FLUSHING, NY 11370-9998

馬塞諸塞州聯絡站

CENTRAL ST APT#5
WALTHAM MA 02154

康納迪克州聯絡站

U-145 STORRS
CT 06269

美國肯塔基州聯絡站：

3385-OTTER CREEK DR
LEXINGTON, KY 40502

芝加哥西北大學聯絡站

DEPT OF MATERI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ORTH
WESTERN UNIV.
EVANSTON IL 60208

美國舊金山聯絡站：

P.O. BOX 146446
SAN FRANCISCO,
CA 94114-6446

美國內布拉斯加州聯絡站：

P.O. BOX 80082
LINCOLN, NE 68501

印地安那州聯絡站

P.O. BOX 3561
MOSCOW ID 83843-0477

美國洛杉磯聯絡站：

P.O. BOX 565
MONTEREY PARK
CA 91754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聯絡站：

P.O. BOX 19427
BATON ROUGE, LA 70893

威斯康星州聯絡站

5152 ANTON DR, #207
MADISON WI 53719

美國華盛頓聯絡站：

P.O. BOX 4558
ARLINGTON, VA 22204

美國西雅圖聯絡站：

P.O. BOX 95802
SEATTLE, WA 98145-2802

達拉斯聯絡站

SMU. P.O. BOX 1701
DALLAS TX 75275

美國休斯頓聯絡站：

P.O. BOX 710784
HOUSTON, TX 77271

美國芝加哥聯絡站：

P.O. BOX 16061
CHICAGO, IL 60616-0061

佛羅里達聯絡站

3000 S.W. 69TH AVE
MIAMI FL 33155

美國夏威夷聯絡站：

P.O. BOX 8718
HONOLULU, HI 96815

美國匹茲堡聯絡站：

P.O. BOX 7122
PITTSBURGH,
PA 15213

■ 主辦：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CHINESE ALLIANCE FOR DEMOCRACY)

■ 編輯：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NY 11370-9998

■ 通訊處：(美洲) BOX 701400 TRAINSMEADOW STATION, FLUSHING,

(香港) 香港九龍旺角郵政信箱 79047 號

(日本) 日本東京都小金井市郵便局

(歐洲) ALLIANCE CHINOISE POUR LA DEMO

B.P. 169 77315 MARNE LA VALLÉE

(澳洲) G.P.O. BOX 376F MELBOURNE (3001)

■ 電話：(美洲) (718) 429-6777; (718) 507-4739

■ 零售價：(美) 2.50 美元 (加) 3.00 加幣 (港) 10.00 港幣

SECOND CLASS
POSTAGE PAID
FLUSHING N.Y.
ISSN 0735-8237

T.P. Lee # 8097 70-81 (F)
Parkview Tower 1109
701 W. Gate Ave.
St. Louis, MO 63130 5

POSTMASTER: Please send address change to CHINA SPRING 74-14 Woodside Ave. Elmhurst, NY, 11373